

東海大學  
日本語言文化學系碩士班  
碩士論文

The seal of Donghai University is a circular emblem with a scalloped outer edge. It features the university's name in Chinese characters '東海大學' at the top and 'DONGHAI UNIVERSITY' in English at the bottom. The year '1955' is inscribed at the very bottom. In the center, there are three interlocking rings and a stylized building or tower.

黃寶桃〈感情〉：  
主角太郎之心理症狀

指導教授：蕭幸君 助理教授

研究生：黃姿萍

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黃氏寶桃「感情」—主人公の精神症狀—

黃寶桃〈感情〉：主角太郎之心理症狀

Discuss the Psychological Symptoms of the  
Character—Tarou in “Complex<sup>1</sup>” by Bau-Tau  
Huang



研究生：黃姿萍

指導教授：蕭幸君 助理教授

東海大學日本語言文化學系 碩士論文

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

<sup>1</sup>此小說無英譯本，筆者不使用音譯，使用意譯。藉此，直接表達此小說的「情結複雜」之意涵。

碩士論文題目：

黃氏寶桃「感情」—主人公の精神症狀—

黃寶桃〈感情〉：主角太郎之心理症狀

Discuss the Psychological Symptoms of the  
Character—Tarou in “Complex” by Bau-Tau  
Huang

研究生：

指導教授： (簽章)

審查教授： (簽章)

(簽章)

(簽章)

東海大學日本語言文化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中華民國 年 月

### 謝誌

三年的日子終於熬過來了。曾經喜悅過、也曾經後悔過，這段日子對我而言是生命中很大的轉折。上天在這三年中集結了我所該面對的很多割捨，考驗著我是否能轉變，很多聲音督促著我必須認清與學習成長為更好的人。在這三年我了解到自己的無知與脆弱，感謝很多力量輔佐著，遇見這些人總是提點著我前進與改變的必要，才能由出口再進入下一站入口。感謝從大學以來教導過我的東海日本語言文化學系所有老師，特別感謝我的指導教授蕭幸君老師，沒有她的聆聽與陪伴，我無法走完這三年。感謝遇見很棒的兩位口試委員，丁鳳珍老師與鍾正道老師，沒有您們接受我的不足，我是無法畢業的。感謝所有研究所的同學與學長姐們，每位幫助過我的你們我都非常感恩。也想感謝學校工讀所認識的師長與夥伴，因為您們的教導，使我提前體驗社會人的感受。謝謝我的朋友們，在這三年來陪我的吃喝玩樂，解壓與散心過後才能擁有滿滿的動力。最後，感謝我的家人，這三年變化很大，一直無法有能力賺錢的自己對於他們充滿愧疚，忍受著我脾氣與無理的家人真的是我永遠的避風港。最後想對自己說，黃姿萍，終於，你畢業了！

## 摘要

本研究以日治時期台灣文學作家黃寶桃於 1936 年所發表的小說〈感情〉為文本，不同於以往之女性角度來觀看，發現此作品新的價值：殖民地心理、單親家庭兒童心理、混血兒心理一起述說才能解析的台灣日治時期複雜心理現象。第一章「緒論」，透過資料顯示，台灣日治時期內台人結合之正當婚姻不多，反倒無法律保障的同居關係較多的情況下，如同故事人物太郎屬於「單親家庭之台日混血兒」可能普遍存在，發現作家黃寶桃創造此小說人物的動機及其研究價值。黃寶桃〈感情〉焦點於「情感」，以佛洛伊德之精神分析手法深入探究一位故事人物的心理，感受「日治時期單親家庭之台日混血兒」的「感情」緣由。第二章「母親與太郎的關係」，透過分析小說中另一個角色母親，引導出對於本研究人物的影響力與「戀母情結」。第三章「從佛洛伊德思維看太郎」，透過佛洛伊德理論解析主角人物之心理症狀：「雙重依戀」、「矛盾與抑鬱」、「自愛與戀物」，且詳細論述角色於人格結構內發生的心理與防衛機制的運作，整理出台灣殖民地心理的一種心理構圖方式。第四章「結論」，敘述本研究雖單純研究一位故事人物，卻延伸出台灣殖民地文學新的研究方向—日治時期單親家庭之台日混血兒，展現由小看大的效果。並且，使用結合精神分析的方式，推展出台灣殖民地文學領域裡更多研究的可能性與潛在的意義。

**關鍵詞：**日治時期、台日混血兒、單親兒童、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心理症狀

## 概要

本研究では、一九三六年に出版された台湾の日本統治時代に於ける台湾人作家黄氏寶桃の短篇小説〈感情〉により、従来の女性視点と異なる研究動向から見れば、作品に新しい価値が発見される。それが三つの心理状態(植民地心理、ひとり親家庭の児童心理、ハーフの子供の心理)をミックスするだけしか解説られる台湾における日本植民地時代の複雑な心理状態である。第一章「はじめに」では、考察した資料を通して、実は台湾の日本統治時代に内地人と本島人との結婚数量が少数であり、法律によって律せられない同居関係のほうが多い。なので、主人公「太郎」と同じように、「一人親家庭の日台混血児」が少なくない。作家黄氏寶桃が〈感情〉の主人公「太郎」を作られたという動機と「太郎」の研究価値は明かに現れる。〈感情〉のポイントはテーマから見ればわかるべきである。彼らは一体どういう感情を持つだろう。わかるために、フロイト理論を結び付け、有名な精神分析理論を応用し、人物の隠されている深層心理が解析する。第二章「母親と太郎の関係」では、作品において、主人公に影響するキャラクターとしての母親を分析し、「エディプス-コンプレックス」という概念が出てくる。第三章「フロイト的観点からの太郎」では、フロイト理論により、主人公がある精神症状を見つける。それが、「二つの愛着」、「アンビバレンスと抑鬱」、「自己愛とフェティシズム」という主人公の心理発展を論じる。そして、人間の精神構造から症状の形成された過程を詳しく解析しながら、いくつ使う防衛機構も紹介する。そうすると、台湾では様々な植民地心理で一つの心理的な構図が整理する。第四章「結論」では、本研究の希望、或いは未来の発展を述べる。ただ一人のキャラクターを分析するけれど、台湾の植民地文学における新しい研究の議題(日本統治時代に於ける一人親家庭の日台混血児)を提出する。小さい事から大が生まれるという効果である。そして、精神分析学を主体にした作品分析は行いながら、他の価値と可能性が広がっていく。

キーワード：台湾の日本統治時代、日台混血児、一人親家庭、フロイト精神分析、精神症状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8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8
一、研究動機	8
二、研究目的	15
第二節 先行研究	18
一、〈感情〉作者黃寶桃	18
二、〈感情〉相關研究	20
第三節 主角太郎相關心理背景	23
一、殖民地台灣心理	23
二、日治時期台日混血兒心理	26
三、單親無父男童心理	31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	34
第二章 母親與太郎的關係	37
第一節 為愛犧牲自己的母親	38
第二節 面對「太郎」的母親心理	42
第三節 母親對「太郎」的影響力	45
第四節 小結	47
第三章 從佛洛伊德思維看太郎	49
第一節 佛洛伊德之「人格結構」與「自我防衛機制」	49
一、人格結構:「自我」「本我」「超我」	49
二、自我防衛機制	53
第二節 以佛洛伊德解析主角心理症狀	55
一、失衡的愛引起的「雙重依戀」	57
二、尋求平衡過程的「矛盾與抑鬱」	61
三、啟動自我保護的「自愛與戀物」	66
第三節 由主角的心理症狀看運作的「人格結構」與「自我防衛機制」	69
一、「雙重依戀」中的「人格結構」與「自我防衛機制」	70
二、「自愛與戀物」中的「人格結構」與「自我防衛機制」	72
第四節 小結	74
第四章 結論	76
參考文獻	79
附錄	83

精神分析所能做的工作，就是找尋藝術家個人生活的印象，他的機遇經驗，以及他的著作之間的相互關係，從而導出該作者在創造時所有的思維和動機——換句話說，及找出他與全人類共有的一部分來。<sup>2</sup>

—佛洛伊德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 一、研究動機

1936年，期刊《台灣文藝》五月號裡，刊登台灣作家黃寶桃所創作的小說〈感情〉裡面，出現夾雜了台日混血兒與單親家庭的議題。屬於日治時期台灣小說文學之日語作品選集裡一則較為短篇的文章，故事中角色構造簡單明瞭，只有對母親和兒子太郎的刻畫。即便如此，筆者認為它所透露出的情感卻是細膩深摯，小說內的意義更是值得進一步思索探究。筆者發現，根據黃寶桃筆下短短的內容裡面，帶著描繪出當時代真實的心境課題：日治時期底下存在於台灣社會裡面普遍的小家庭(單親家庭)所會發生之複雜心理現象。

其實，針對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台灣，內台共婚問題、混血兒身分認同一直是許多學者們研究的方向，也豐富了當時內地人與本島人之間所擁有的交流印記。而這之中卻還有著許多可探究的議題，如同〈感情〉一文內描述的太郎一般，作為一位「日治時期單親家庭裡的台日混血兒」，剛出生就面臨內地<sup>3</sup>父親拋棄他們母子二人不在身邊的情況，如此背景的人物們則還未有人正視看待過他們的存在。但從以下資料的根據查證，筆者推斷當時並未有實際婚姻關係，絕大部分反倒是以同居的方式進而產下孩子的狀況居多，這也顯示出黃寶桃筆下的太郎雖然純屬虛構性人物，但卻是一位能反映台灣日治時期當時現況的角色。

首先，先從所謂的「內台共婚」的制度了解的話，根據廖苑純(2011)於〈異族婚姻的法制與文化調適：以日治時期「內台共婚」案例分析為中心〉<sup>4</sup>論文之第二章內，說明法治的調適下內台共婚的「合法化」過程之中，其所作的詳細整理與介紹來看，了解1919年以前內台共婚都還未被承認，1920年至1932年則是處在法令模糊階段，仍然無法確立台灣戶籍制度，直至1933年共婚法才正式實施。而與本研究太郎與母親的角色背景相關性較高的議題，正是所謂的內緣妻<sup>5</sup>與私生子<sup>6</sup>的部分。依據廖苑純(2011)的說法，他們的身分也是於1933年後才能在法律上獲得應有的承認與保障。從戶籍法下去著墨的話，根據廖苑純(2011)以下此段對於「內台共婚」問題之論述，我們可以得知日治時期的戶籍制度不完善是造就內地人與本島人雙方相互關係無法保障的緣

<sup>2</sup>佛洛伊德，《佛洛伊德傳》，廖運範譯，台北：志文出版社，1993，頁74。

<sup>3</sup>台灣日治時期，日本人稱作內地人；台灣人稱作本島人。

<sup>4</sup>廖苑純，〈異族婚姻的法制與文化調適：以日治時期「內台共婚」案例分析為中心〉，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1。

<sup>5</sup>未依法結婚登記但同居男方戶內之子女。

2013年4月27日，取自嘉義縣竹崎鄉戶政事務所-便民服務-日治時期稱謂用語  
<http://jhuci-hro.cyhg.gov.tw/content/index.asp?Parser=1,5,24>

<sup>6</sup>女性戶長非婚生子女。

2013年4月27日，取自嘉義縣竹崎鄉戶政事務所-便民服務-日治時期稱謂用語  
<http://jhuci-hro.cyhg.gov.tw/content/index.asp?Parser=1,5,24>

由。廖苑純(2011)其論文內依據戶口規則第三條<sup>7</sup>規定，表示出因為戶籍制度的關係，所造成的內台共婚問題。

由於台灣並未實施戶籍制度，來到台灣的內地人不僅無法將戶籍移動到台灣，有關戶籍的問題也都要回到日本解決。如此一來，便出現有戶籍的內地人與沒有戶籍地本島人之間，包含婚姻關係等民法親屬繼承篇所規定之身分關係無法成立的問題，此即所謂的「內台共婚」問題。<sup>8</sup>

對於日治時期台灣戶籍法的問題，根據許進發學者彙集於《臺灣重要歷史文件選編(1895-1945)》<sup>9</sup>一書中的史料裡，記載著台灣舊慣調查的紀錄中，收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之〈台灣經營上舊慣制度の調査を必要とする意見〉(〈台灣經營方面舊慣制度調査為必要之意見〉) 此篇文章由論述內可以見得台灣沒有戶籍制度的狀況，正好是成為區隔內地人與台灣人的標準。例如，以下其文內所舉列之法律條文。

一、内地人ト本島人トヲ區別スルナ標準ハ本島ニ於ケル戶籍ノ有無ニ依ル即チ内地人ハ未ダ其本籍ヲ臺灣ニ移スコトガ出来ヌ故ニ臺灣ニ本籍ノナイ者ハ内地人トシ、否ラサル者ハ本島人トスルノデア  
ル<sup>10</sup>

一、内地人與本島人的區別標準在於有無本島戶籍。即，內地人尚未能將其戶籍移入台灣。因此，無持有台灣本籍者即為內地人，反之則為本島人。<sup>11</sup>

並且，《台灣慣習記事》<sup>12</sup>之記載，對於台灣戶籍法的不足問題也提出以下說明。

● 本島戶籍法に關する調査

本島に於ける現在の戶籍なるものは、警察の調査を基礎とし、保甲及街庄長の調査を參酌したるものに過ぎず、隨て人口調査に重きを置き、肝要なる親族關係に至りては極めて不精確なれば、本島に適當なる戶籍法を定むるの必要は夙に當局の認むる所なりしが、近年地方街庄長も大に事務に練達し來り之をして戶籍を取扱はしむるも甚しき支障なきまでに進みなれば、本島の事情に適合する規定を設け、街庄長を一種の戶籍吏とし、廳、支廳に於て充分監督すること、せんとの意見當局者間に起り、目下右に就き種々取調中なりと云ふ<sup>13</sup>

<sup>7</sup>「戶口規則」第三條：「此規則以本島人住要住所為本居，本居外住所為寄留。本島人雖在本島內無助要住所，然而本島內決定本居地而提出申報時，視同本居地。內地人、朝鮮人、支那人之住所則視為寄留。」

<sup>8</sup>廖苑純，〈異族婚姻的法制與文化調適：以日治時期「內台共婚」案例分析為中心〉，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1，頁13。

<sup>9</sup>許進發，《臺灣重要歷史文件選編(1895-1945)一》，臺北縣：國史館，2004。

<sup>10</sup>許進發，《臺灣重要歷史文件選編(1895-1945)一》，臺北縣：國史館，2004，頁355。

<sup>11</sup>因無中文版本，此處為筆者自行翻譯處理。

<sup>12</sup>臺灣慣習研究會編，《臺灣慣習記事》，臺北市：臺灣總督府臺灣慣習研究會。

<sup>13</sup>臺灣慣習研究會編，《臺灣慣習記事》，臺北市：臺灣總督府臺灣慣習研究會，第參卷上，第五號，頁493。

- 有關本島戶籍法之調查

本島現在之戶籍，以警察之調查為基礎，只是再參酌保甲及街庄長之調查者。故置人口調查為重點，至於重要的親族關係，則極為缺乏精確，實有必要制定本島適當的戶籍法，乃夙為當局所關係者。近來街庄長亦極練達事務，使其承辦戶籍事務，亦無甚障礙。設置適合本島情事之規定，以街庄長作為一種戶籍吏，在廳、支廳充分監督之下辦理的意見起於當局者之間，目前就此問題正在進行調查中云。<sup>14</sup>

- 戶籍法の不備に就て

本島には未だ戸籍法の實施なき爲め、内地人本島人との間に親族關係と結ぶこと能はざる場合尠からず、然れども内地人と本島人間に涉れる法律行為をなすには、律令の示す如く、勿論民法の適用を受くべき規程なれば、内地人が本島人を妻とし、若くは入夫を受け、及ぶ養子を貰受くる場合は、一切内地人の本籍地に於て戸籍登録をなし得るを以て、婚姻、養子、縁組の條件さへ缺くる所なければ有効に親族關係を結び得るも、之れに反して本島人が内地人を妻とし、入夫を受け及び養子縁組をなさんとするには、他の條件悉く具備するも、戸籍登録を缺けば法律上何等の効力なく、隨て單に事實上の妻たり夫たり、若くは養子たるに止まり、法律上の親族として認むることなし、是れ本島に戸籍法の不備なるより来る結果なり、然るに右の如き事實續々として現はるゝに至りては、何とか之が規程を設くるの要わるべく、當局にては人事舊慣調査の結了を待ちて勿々戸籍法を實施せらるべしといふ<sup>15</sup>

- 關於戶籍法之不逮

臺灣因尚未實施戶籍法，故臺、日人之間無法結成親屬關係之情況不少，儘管如此，牽涉日人與臺人間的法律行為時，則一如律令所示。當然若依民法之規定，日人娶台人為妻，或招贅，或收養子時，因均得在日人的本籍地登記戶籍，故只要具備婚姻、養子之條件，即可有效地結成親屬關係。反之，若臺人娶日人為妻、招贅或收養子時，即使其他條件均具備，若缺戶籍登記，則無任何法律效力，不過是實際上之妻、贅夫或養子罷了，未被認為是法律上之親屬，此乃在台灣因戶籍法之不逮所致。然而，若上述事實陸續出現，則有必要制訂一些規程。就當局而言，待人事舊慣調查完成，即宜儘速實施戶籍法。<sup>16</sup>

由以上文獻的記錄描述，內台人之間的婚姻紀錄，因無具體系統的戶籍法律規定，故無法有極正確性數據，也以及於即使登記結婚，也無法入籍的狀況。即便當時日治時期的政府對於戶籍

<sup>14</sup>江慶林著，《臺灣慣習記事(中譯本)》第參卷上，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譯，1984-，頁265-266。

<sup>15</sup>臺灣慣習研究會編，《臺灣慣習記事》，臺北市：臺灣總督府臺灣慣習研究會，第參卷下，第九號，頁887。

<sup>16</sup>江慶林著，《臺灣慣習記事(中譯本)》第參卷下，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譯，1984-，頁157。

問題所產生的通婚問題有所警戒，但還是直至 1933 年後才有「共婚法」的保障。太晚推行「共婚法」的結果，其實也影響到官方實際所能統計的結婚數據，或後來乾脆不選擇處理入籍問題的現象。

關於婚姻統計數據方面，從德田幸惠(2007)於〈日本統治下台灣的「內台共婚」—日本與台灣的「家」制度的衝突和交流〉研究裡，從研究共婚者的數據裡頭來做觀察以後所敘述的內台共婚的狀態來看，德田幸惠(2007)提及以下幾點問題：例如，「而在初期通婚者並不多，大都是日本男性與台灣女性為主，<sup>17</sup>……(略)……」<sup>18</sup>「日治時期整體來看，台灣男性和日本女性的夫妻比日本男性與台灣女性的夫妻多。<sup>18</sup>」「雖然日本人與台灣人的通婚合法化，但因日本母國與殖民地台灣的戶籍體制不同而使日本女性與台灣男性之間無法成立實際上的婚姻關係。<sup>19</sup>」等，皆透露出少數的內台共婚狀況。德田幸惠(2007)其論文的結論裡，有著以下敘述：

**日本在其殖民地採用同化政策，鼓勵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通婚，但在日本殖民國間通婚案例在整體台灣結婚案例中一直是少數，普及率不高，到了 1944 年於台灣大約只有 800 組左右。<sup>20</sup>**

因此，透過以上描述可知，台灣直至日治時期的尾聲，內台共婚也還是呈現出極為不普遍之數據。下面表格乃由德田幸惠(2007)依據邱純惠基於台灣總督府出版的《台灣人口動態統計明治 42 年-昭和 17 年》作成的表，再作整理的日本人與臺灣人通婚狀況。筆者在此引用的為德田幸惠(2007)所整理的簡易版本。

表一、「內台共婚」人數

	日本男性與台灣女性	台灣男性與日本女性
1909-1910 年	0	0
1916-1920 年	7	0
1916-1920 年	3	0
1921-1925 年	8	24
1926-1930 年	19	39
1931-1935 年	21	107
1936-1940 年	38	107
1941-1942 年	19	64
合計	115	341

〈另外有 10 對日本人與原住民的通婚案例。基於台灣總督府出版的《台灣人口動態統計明治 42 年-昭和 17 年》由邱純惠作成表，德田幸惠再整理。〉<sup>21</sup>

<sup>17</sup>德田幸惠，〈日本統治下台灣的「內台共婚」—日本與台灣的「家」制度的衝突和交流〉，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7，頁 8。

<sup>18</sup>德田幸惠，〈日本統治下台灣的「內台共婚」—日本與台灣的「家」制度的衝突和交流〉，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7，頁 19。

<sup>19</sup>德田幸惠，〈日本統治下台灣的「內台共婚」—日本與台灣的「家」制度的衝突和交流〉，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7，於摘要處所論述。

<sup>20</sup>德田幸惠，〈日本統治下台灣的「內台共婚」—日本與台灣的「家」制度的衝突和交流〉，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7，頁 83。

<sup>21</sup>轉引自德田幸惠，〈日本統治下台灣的「內台共婚」—日本與台灣的「家」制度的衝突和交流〉，淡江大學

由戶籍法的認知，再到內台共婚的數據統計，了解當時如上表格所列出之內台結婚夫妻，其實皆因台灣戶籍法不完善的情形，造成即使雙方已舉辦婚禮、登記結婚，卻依然在法律上被視為無親屬的狀況般看待。既然如此，正當婚姻登記對於雙方來說都無法得到法律上真正的保障時，何嘗需要多此一舉去額外取得無法被承認的婚姻登記關係之想法出現，轉而選擇過著看似共婚的同居生活。如此看來，即不去登記結婚的情形，故於台灣日治時期的階段裡應該存在更多才是。透過台灣總督府以下數據顯示即可反映台灣日治時期同居關係較多的現象。

從 1912 年台灣總督府對於台灣之正當婚姻關係與同居關係的調查<sup>22</sup>顯示出，內地人夫配本島人妻的組合裡，正當婚姻 12 對，同居關係 147 對，子女數分別為 32 位與 127 位；本島人夫配內地人妻的組合裡，正當婚姻 0 對，同居關係 38 對，子女數分別為 0 位與 24 位；內地人夫配生番人妻<sup>23</sup>的組合裡，正當婚姻 0 對，同居關係 21 對，子女數分別為 0 位與 14 位。可以得知 1912 年同居關係的情形遠比正當婚姻來得多，同居關係的子女數也相對較高。

另外像是 1919 年台灣總督府對於夫妻關係的調查<sup>24</sup>也顯示出同居關係還是明顯多於正當婚姻的數量。內地人夫配本島人妻的組合裡，正當婚姻 12 對，同居關係 78 對，子女數分別為 36 位與 74 位；本島人夫配內地人妻的組合裡，正當婚姻 1 對，同居關係 26 對，子女數分別為 3 位與 24 位；內地人夫配生番人妻<sup>25</sup>的組合裡，正當婚姻 2 對，同居關係 18 對，子女數分別為 6 位與 22 位。因此，根據 1912 年與 1919 年的正當婚姻與同居關係的數據情形顯示，不分內地人與本島人的狀況加總下，1912 年所統計的正當婚姻有 12 對，正當婚姻中的子女數有 32 位；同居關係則有 112 對，同居關係的子女數則有 136 位。1919 年所統計的正當婚姻有 62 對，正當婚姻中的子女數 68 位；同居關係則有 122 對，同居關係的子女數則有 130 位。

此外，根據台灣總督府於 1929 年對台灣之內蕃人與內台人之間的通婚狀況調查<sup>26</sup>顯示，內地人夫配本島人妻的組合裡，正當婚姻 53 對，同居關係 106 對，子女數分別為 97 位與 219 位；本島人夫配內地人妻的組合裡，正當婚姻 88 對，同居關係 122 對，子女數分別為 173 位與 144 位；內地人夫配生番人妻<sup>27</sup>的組合裡，正當婚姻 4 對，同居關係 81 對，子女數分別為 13 位與 60 位；生番人夫<sup>28</sup>配內地人妻的組合裡，正當婚姻 3 對，同居關係 1 對，子女數分別為 2 位與 0 位。此時期有增加的趨勢，一樣單看正當婚姻與同居關係的加總數據的話，正當婚姻共 148 對，正當婚姻中的子女數共有 285 位；同居關係則共 370 對，同居關係的子女數則共有 423 位。

由以上台灣總督府的數據可以顯示出，同居關係的數量與所含有之子女數皆比起正當婚姻關係方面來得多，這與戶籍法尚未周全有關。因此，1933 年前「共婚法」還未制定之下的內台共

---

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7，表五。

<sup>22</sup> 〈內地人对本島人又ハ蕃人ノ縁事關係並本島人对内地人ノ縁事關係調査表〉，《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5449-2，1912 年 4 月 1 日。參見自廖苑純，〈異族婚姻的法制與文化調適：以日治時期「內台共婚」案例分析為中心〉，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1，頁 28-29，表二。

<sup>23</sup> 為了保留原著作之寫法，筆者此處並未有歧視意味，在此澄清。

<sup>24</sup> 〈內地人对本島人又ハ蕃人ノ縁事關係並本島人对内地人ノ縁事關係調査表〉，《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6665-13，1919 年 1 月 1 日。參見自廖苑純，〈異族婚姻的法制與文化調適：以日治時期「內台共婚」案例分析為中心〉，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1，頁 31，表四。

<sup>25</sup> 為了保留原著作之寫法，筆者此處並未有歧視意味，在此澄清。

<sup>26</sup> 〈昭和七年內台人間、內蕃人間共婚者二關スル件〉，《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11165-10，1929 年 1 月 1 日。參見自廖苑純，〈異族婚姻的法制與文化調適：以日治時期「內台共婚」案例分析為中心〉，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1，頁 36，表七。

<sup>27</sup> 為了保留原著作之寫法，筆者此處並未有歧視意味，在此澄清。

<sup>28</sup> 為了保留原著作之寫法，筆者此處並未有歧視意味，在此澄清。

婚之婚姻關係以及同居關係，其實都屬於處在未被法律認可無保障的狀態。除此之外，若納入官方政府無法完確調查出當時社會底下所存在的內台人戀愛關係與私自同居關係數據之考量，台灣長達 50 年的日本統治時期之內，故對於當時代無精確的統計裡是無法詳查得知的情況下，未知的內台交往關係比例有極高的存在可能。

透過以上論述，不論是 1933 年前之婚姻關係或是日治時期所存在的大量同居關係，皆有著無法被保障的危機。如同根據《流轉家族：泰雅公主媽媽、日本警察爸爸和我的故事》<sup>29</sup>書中口述記錄裡寫道的所謂政略婚姻中其實就是因為無須入戶籍的狀態，因此導致可以隨時拋棄妻子。

**原來父親和母親的婚姻，是五年理蕃計畫下的政略婚姻。總督府理蕃課和父親訂「娶蕃邦公主三年內致力理蕃事業後，隨時可以拋棄妻子」之約。……(略)……所簽之約中，沒有寫出政略婚姻被拋棄的公主和其子女要如何善後。<sup>30</sup>**

書中的描述更使得筆者聯想到本研究文本中，相似於拋棄太郎母親的內地人丈夫之情形。因為未入戶籍關係的緣故，存在於 1933 年以前內台共婚處在屬於無保障的婚姻關係以及大多數只屬於同居關係的情形之下，導致內地人丈夫離棄本島人妻子的可能性提高。其實這些內地警察往往沒有以台灣作為久居的打算，且大多不願將台灣的妻兒帶回內地共同生活，故通常不會辦理入籍手續。既然未曾進行入籍登記，其婚姻於法律上自然不具效力。不論是否為政略婚姻的性質，日治時期之婚姻關係與同居關係，或是一般的交際往來之下都會發生離棄、分手、拋棄之狀況。對於未打算久留於台灣的內地人，是隨時有可能拋棄在台的一切回到內地生活，因為沒有戶籍關係的他們是無需承擔婚姻責任。最後，若是再以台灣殖民時期結束後，即所有移民來台的內地人皆於 1945 年開始禁止定居於台灣而遣返回日本的狀況<sup>31</sup>來思考的話，是否潛在更多返日之後所影響的內台人交往關係(同居關係斷絕)。套用至本研究〈感情〉一文的故事，如太郎與母親相依為命的情形，單親扶養兒女之狀態，可能性不也將大為提高。

黃寶桃〈感情〉一文之著作日期為 1936 年，角色太郎於故事中年紀正值十七歲，推測來說，黃寶桃所述太郎母親被拋棄的時間點，大概也是處於戶籍沒有保障的階段。如同太郎與母親一般，被拋棄的妻子與沒有父親的兒子，就會如同廖苑純(2011)以下所言，一般只能以「私生子」的冠名納入母親的戶籍之內。

**而在這種不被法律承認的婚姻關係中所誕生的下一代，自然也無法受到法律的保障，往往只能以「私生子」的名義登記在母親的戶籍中，如此一來便不具「嫡子」之身分，也就無法繼承父方之家產。為解決此一問題，有些共婚家庭會由父親以「收養」的方式，將被視為「私生子」的子女登記於父親的戶口調查簿中，然而這畢竟只是一變通性的措施，非根本的解決之策。<sup>32</sup>**

<sup>29</sup>下山一自述；下山操子譯寫，《流轉家族：泰雅公主媽媽、日本警察爸爸和我的故事》，臺北市：遠流，2011。

<sup>30</sup>下山一自述；下山操子譯寫，《流轉家族：泰雅公主媽媽、日本警察爸爸和我的故事》，臺北市：遠流，2011，頁 231。

<sup>31</sup>林呈蓉，《日本人的臺灣經驗—日治時期的移民村》，台北：台灣歷史學會，2004。

張素珍，《臺灣的日本農業移民——以官營移民為中心（1909-1945）》，新店：國史館，2001。

<sup>32</sup>廖苑純，〈異族婚姻的法制與文化調適：以日治時期「內台共婚」案例分析為中心〉，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碩

廖苑純(2011)其研究論文內，還引用《台灣實業界》所刊登的一則於1921年在東京結婚後而回台灣居住的一對夫妻，本島人男性律師陳增福與內地人女性妻子百合的故事，透露出法令不完備的情況之下，內台共婚所承受的外在環境壓力比起同民族間的婚姻關係來的沉重，身分關係的問題對於內台共婚的家庭是很困擾的。廖苑純(2011)舉出這對內台共婚的例子，說明當時代所謂的內緣妻與私生子的身分是一種無法被承認的狀態與他們有苦難言的心酸。

「自己只能夠屈居於被法律枷鎖所束縛住的內緣妻地位。(女兒)愛子健康的長大，卻因為(在法律上)無法確認父親的身分，而陷入了卑微的私生子命運！……(略)……這是何等苦悶的命運。」<sup>33</sup>

根據百合子夫人的採訪口述下，我們的確能感受到她面對自己的身分與孩子的身分時，那無能為力的情緒。日治時期裡不僅僅有著內台之間婚姻關係不被法律保障的問題，還有著多數同居關係的存在，或是交往關係裡所造成的後續可能性的問題。包含與本研究相關之拋棄的行為、內緣妻的處境、私生子的心境，都引導出筆者所將探討的「日治時期單親家庭裡的台日混血兒」現象。因此，透過以上所述，筆者在此歸納出日治時期的幾個狀況：

- ✓ 統計數據：內台共婚屬於少量
- ✓ 統計數據：同居關係多於婚姻關係
- ✓ 因日治時期台灣戶籍未完備，婚姻關係並非等同於擁有法律保障
- ✓ 同居關係與內台男女之交往關係存在之比例有更高的可能
- ✓ 不論是內台共婚、同居關係或交往狀態，未有法律保障所生下的台日混血兒相對處於多數（因1933年後婚姻關係才有法律保障）
- ✓ 拋棄與離棄的狀態也是無法預料的數據，使孩童易於單親家庭下成長（因無戶籍規範的緣故，無需承擔法律責任，關係容易解除）
- ✓ 日本移民問題（之前大量移入，到了1945年全數離台…）

藉此，殖民地人民、單親家庭兒童或是混血兒的這三者心理狀態是被作為個別研究的常見主題，雖從未被結合於一體一起探討過，但從以上資料顯示，筆者認為此三項心理狀態理應作綜合性的研究。畢竟在如此眾多線索的驗證下，於日治時期的台灣，生長於單親家庭下的台日混血兒應該會是最普遍的狀態。

套用至〈感情〉一文中太郎這個角色，他從小所面臨的狀態，即使是內台共婚下所生的孩子，卻因父親拋棄母親，而成為於單親家庭下被扶養長大的小孩，被迫作為日治時期底下台日混血的單親兒童之一，造成太郎的心境曲折多揣。前述筆者提及到，考慮到黃寶桃創作此小說年代為1936年，角色太郎為十七歲，雖文章中無法給予確切的年代線索，但至少應當是作者歷經的過去時間，傳遞之故事背景應該不會設定於創作時間之後的年份。由此預測，太郎文章中的年紀往前推算的話，太郎的母親與所謂的內地丈夫結合的時期，應該極大的可能落在1919年以前共婚不被承認與不被保障的時期，筆者才能推敲出內地丈夫之所以能夠拋棄她一去不回的原由。由此見得，黃寶桃〈感情〉中的母親被內地丈夫拋棄獨立扶養兒子太郎長大的故事背景，與當時時代

---

士論文，2011，頁56。

<sup>33</sup> 〈共婚之美談：穎川家を創立した辯護士陳增福君〉，《台灣實業界》，1930年4月，頁14-15。轉引自廖苑純，〈異族婚姻的法制與文化調適：以日治時期「內台共婚」案例分析為中心〉，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1，頁57。

現況是密切結合的。這促使筆者選擇探究此主題的動機，並提高此篇文學作品研究的價值。

## 二、研究目的

文學、作家、經驗、社會…等，這些皆為環環相扣的，正如同筆者此篇論文欲引用的心理學之父佛洛伊德即認為運用「精神分析」來看作家筆下的文學作品的因由，是希望從中發現作家本人更多意圖與他人關聯的一部分<sup>34</sup>。因此，既然知道黃寶桃〈感情〉此小說還未完待延伸之重要性，也知道太郎此角色的普遍性的話，當時如同這樣廣泛的心理現象應需被了解。故為了能解析人類心理的手法，筆者需要藉由精神分析始祖佛洛伊德所提出之「人格結構」、「防衛機制」的分析基礎來看，先了解人格結構的本我、自我、超我之間的作用與互動關係，理解其造成人的心理矛盾現象，引發舒緩內心的防衛機制作用，透過以上精神心理層次運作的起因與過程，使角色內心轉折與鬱悶的癥結能被了解。如同西方文學、藝術裡面常透過佛洛伊德來解剖一般，它不僅可以表達出更深層的內在情緒衝動的流動，還能使此作者與作品更加富有想像的空間與另一層可能性的意義。《精神分析與文學》<sup>35</sup>一書中，作者王溢嘉在自序中寫道：

**精神分析和文學都在從事「探索人類心靈」的工作，只是途徑不一，  
精神分析以「分析」為主，而文學則以「直覺」為主。但兩者實殊途而同  
歸，在探索人類心靈這方面精神分析學家和文學家可以說是「黑暗中的兄  
弟」。**<sup>36</sup>

透過此描述下，使筆者感受到文學與心理學所擦出的火花是自由多變且富具彈性，正是因為它的想像空間才發展出趣味，更使兩者可互相輔佐、合作無間。戲劇、藝術與文學，皆可透過精神分析來展現，從中延伸並發掘角色的心理層次。透過角色的動作、情緒甚至是故事情節，都可以讓精神分析家推測創作下孕育製造出的人物之代表意義與心靈意涵，並使之更鮮明也賦予另一股生命力。異曲同工之妙的是，法國精神分析學家克莉絲蒂娃（Julia Kristeva）在《Proust and the sense of time》<sup>37</sup>一書中也提及：

**Things come to have meaning when the I of the writer rediscovers  
the sensations underlying them, which are always linked together  
in at least a series of two.**<sup>38</sup>

筆者相當同意此理念，任何事物下所賦予潛藏於內的意義，在作者重新詮釋下跳脫出來，並可從中找尋各種相關的連結性。本研究，也是希望藉由心理與精神分析的方式來檢視作者黃寶桃〈感情〉所塑造的角色，尋找到作品表象下所存在的深層意義與相關的可能性。如同國內學者王溢嘉論述精神分析與文學之間的交流價值時也清楚表明精神分析對於作者與作品是有強化與延

<sup>34</sup>佛洛伊德：「精神分析所能做的工作，就是找尋藝術家個人生活的印象，他的機遇經驗，以及他的著作之間的相互關係，從而導出該作者在創造時所有的思維和動機——換句話說，及找出他與全人類共有的一部分來。」

佛洛伊德，《佛洛伊德傳》，廖運範譯，台北：志文出版社，1993，頁74。

<sup>35</sup>王溢嘉，《精神分析與文學》，臺北縣中和市：野鵝出版，1978。

<sup>36</sup>王溢嘉，《精神分析與文學》，臺北縣中和市：野鵝出版，1978，頁3。

<sup>37</sup>Julia Kristeva，《Proust and the sense of tim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

<sup>38</sup>Julia Kristeva，《Proust and the sense of tim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頁5。

伸的關聯。

### 精神分析與文學批評相互影響

愛恩斯特·瓊斯在「哈姆雷特與伊底帕斯」這篇論文集裡，認為精神分析學家將哈姆雷特視為活生生的人物並無不妥，因為文學批評家本身也這麼做。

……(略)……但可以確定的是，精神分析與文學批評的相互交流是與日俱增，較敏銳的精神分析學家已經放棄他們先輩試圖用「科學方式」來研究文學的虛矯態度，這樣做只有好處沒有壞處，譬如第六章所提法蘭茲·亞歷山大對莎劇「亨利四世」的分析，他已不再誇口說要「解決」什麼問題，而只試圖去闡釋它的主題。像這一類型的分析雖沒有什麼「偉大的發現」，也許只是將大家都已看到的指出來，並予以公式化罷了，但它並不排斥其他的意義，其本身在文學批評的領域裏仍有相當的價值。

而文學批評家也應該承認，文學所富含的曖昧性，顯義與隱義間的交互作用，作者的動機等，都因精神分析的理論而獲得加強，使他們在從事批評工作時，多了一項可用的工具。

### 尋找更多同情作者的餘地

對讀者來說，精神分析理論可以使他在欣賞一部文學作品時，更留心其可能的「內在含意」及作者的「潛在動機」。當然，讀者必須了解，精神分析解釋作品的創作動機並非在揭露作者不可告人的隱私(譬如伊底帕斯情結、同性戀、性無能等)，或者侷限作品的意義，相反的，是要尋找同情作者的餘地，並增加作品可能的意義。<sup>39</sup>

已逝的日本作家廚川白村於書中《苦悶的象徵》<sup>40</sup>裡，說明了他對於文藝的獨特看法，書中也闡述了佛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論的重要性。

……(略)……平心而論，精神分析學的思想極其特殊和富於暗示性，在變態心理、兒童心理、性慾心理等研究中開拓了一個新的境地，這的確是事實。尤其最近幾年，這學說不但影響了精神病學，更影響了教育學和社會問題的研究者。又因為佛洛伊德對於機智、夢、傳說、文藝創作的心理賦予了一種新的解釋，所以，今日的文藝批評家中有很多人應用這學說。……(略)……<sup>41</sup>

透過以上學者支持精神分析與文學結合之作法，看出它非凡的價值與地位，增強了筆者對此篇研究作法的決心意念，希望也能運用日漸普及的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之文本解析手法，帶進較

<sup>39</sup>王溢嘉，《精神分析與文學》，臺北縣中和市：野鵝出版，1978，頁213-214。

<sup>40</sup>廚川白村，《苦悶的象徵》，顧寧譯，臺中市：晨星，1988。

<sup>41</sup>廚川白村，《苦悶的象徵》，顧寧譯，臺中市：晨星，1988，頁19-20。

少被如此研究分析的台灣殖民地時期所誕生之文學作品。社會文化研究學者劉紀蕙於《心的變異：現代性的精神形式》<sup>42</sup>書中，敘述了佛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論難以觸及與滲入台灣的現象：

我們在台灣七〇年代所看到的，似乎也不出實證心理學界，人本主義心理學派，以及左翼激進批判三種脈絡，而且，此三種脈絡明顯地影響台灣七〇年代的文化論述。實證心理學持續批評佛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神秘色彩」，及其不可驗證性。……(略)……今日回顧台灣七〇年代現代主義論戰之中的反精神分析論述，正好呈現了此實證心理學、人本心理學與左翼路線的合流。實證心理學以台灣心理學界的主流位置，完全否認精神分析的有效性或是可檢驗性，對於台灣文化的認知模式，有相當普遍的影響。但是，人本主義心理學派所強調的浪漫個人主義式的自我實踐與自我接受，以及左翼以批判佛洛伊德精神分析所透露出的中產階級保守心態的立場，對於台灣的整體文化與知識構成，留下了更明顯而深刻的痕跡。<sup>43</sup>

台灣的文學領域，或許如同上述狀態般被設限，影響台灣文學以精神分析當作中心論述的發展較為緩慢與稀少的因由。不僅如此，學者劉紀蕙提及1914年中國雜誌裡出現了介紹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論述中，雖對「無意識」之議題有所認知但卻也顯示了對於「性」之話題的尷尬<sup>44</sup>來看，「保守的觀念」對於佛洛伊德精神分析的不諳解。學者劉紀蕙於《心的變異：現代性的精神形式》書中介紹，湯澄波學者批評許多學者駁論「關於性慾」之理論為「太偏」之駁者議論，正是反映了「……(略)……持續反覆出現在中文傳統對於精神分析的接收態度；在台灣的現代化過程之中，亦然。<sup>45</sup>」，以及說明學者朱光潛的理論時所言：「朱光潛的觀察分析，直接指出了中國人無法面對自己不那麼潔淨的部分所呈現的否認動作。<sup>46</sup>」。如上透過學者劉紀蕙所述，皆可以見得，台灣與中國的狀況相似，皆對於佛洛伊德之精神分析處在抗拒的狀態。學者劉紀蕙更詳細論述出精神分析受阻的因素：

……(略)……中國三〇年代的精神分析論述已經充分被實證的行為主義立場所滲染。而且，這些對於「無意識」、「欲力」、「壓抑」等概念化的單純化，批判其「神秘玄妙」、「玄虛」，難脫「哲學的羈絆」、「不合科學邏輯」、「不能從直接經驗得來」。無法取得「證據」，都不離二〇年代玄學與科學論爭之範疇，也說明了中文傳統之下論者持續抗拒精神分析的主要癥結所在。<sup>47</sup>

筆者認為，保守的傳統思考下以至於精神分析受限於文學裡活用的話，屬於非常可惜的事。保留「傳統」固然重要，但卻不該是設限突破的原因。筆者的觀念，或可以說是本研究的理念中，認為「找尋可能」是「驗證的前奏」，因為無法驗證而不去嘗試搜索、接納的話，是會流失掉很多可能性的研究價值。渴望身於不斷追求突破與創新的現代社會裡，應該擺脫既有思想的局限找

<sup>42</sup>劉紀蕙，《心的變異：現代性的精神形式》，台北市：麥田出版：城邦文化發行，2004。

<sup>43</sup>劉紀蕙，《心的變異：現代性的精神形式》，台北市：麥田出版：城邦文化發行，2004，頁153-155。

<sup>44</sup>劉紀蕙，《心的變異：現代性的精神形式》，台北市：麥田出版：城邦文化發行，2004，頁135。

<sup>45</sup>劉紀蕙，《心的變異：現代性的精神形式》，台北市：麥田出版：城邦文化發行，2004，頁138。

<sup>46</sup>劉紀蕙，《心的變異：現代性的精神形式》，台北市：麥田出版：城邦文化發行，2004，頁138。

<sup>47</sup>劉紀蕙，《心的變異：現代性的精神形式》，台北市：麥田出版：城邦文化發行，2004，頁147。

出「不可能中的可能」。因此，本研究的目的試圖找出黃寶桃〈感情〉小說中的也許與未知，對於黃寶桃作家所研究的方向能夠在女性地位與種族議題之外尋找其他價值，那一直被女權議題所覆蓋住的角色太郎，可因此讓大眾發現黃寶桃藉由他間接地傳遞了另一層日治時期普遍存在卻未被發掘的心理狀態，它就如同社會基層平民一樣如此廣大與重要，應該值得被真正重視。透過心理學分析與解構日治時期台灣作家黃寶桃〈感情〉筆下一位被遺忘而該被認識注意的人物，他或許是黃寶桃想提及的日治時期底下單親台日混血兒之心理寫照。跟隨此意念並且效法類似分析法，結合心理學之中的深層分析，挖掘一位故事人物太郎。甚至我們可以說故事人物等同於現實中人類的投射，若無使用精神分析是很難理解真正潛藏於他們內心的喜怒哀樂，得知帶給他們情感上波動的理由。錯失了作者塑造角色的意涵，淪為表面上能理解的狀態與說明，將會是非常可惜的事。

太郎身為單一撫養下的單親兒童，從小陪伴著並且賴以為生的是台灣籍母親，生長於日本統治下所屬的殖民地台灣，擁有著雙重血液的內台混血，腦中有位只是母親口中所提卻未曾見過面之日本帝國籍父親，那位參雜理想與幻想所交織成的完美人物。藉由文本中的角色的敘述與背景塑造，以佛洛伊德相關心理分析理論推測與解釋太郎此內心糾葛的角色所建構的「自己」有何種心理症狀。並且，是在佛洛伊德所謂的「人格結構理論」之「自我」、「本我」、「超我」中如何循序漸進底下擦撞衝擊而成的，面對種種因素干擾的他，產生何種「心理防衛機制」(defense mechanism)來調節保護自己。最後，透過解構太郎的感情，渴望發現台灣日治時期普遍存在此複雜身分下不一樣的心靈空間。藉此，拓展嶄新的研究支線與殖民地心理狀態，進一步地，台灣殖民地時期文學作品能以使用心理學之精神分析的概念去達到擴展人物角色的成效，產生更深入一層的張力。

## 第二節 先行研究

### 一、〈感情〉作者黃寶桃

日治時期台灣作家黃寶桃的身世背景是不明的，論說黃寶桃的資料也非常的稀少。著名的其餘創作裡，包含1935年出版的〈秋天的女人聲音〉、〈人生〉與1936年出版的〈憶起〉、〈離別〉、〈故鄉〉等。由此可見，1930年代是黃寶桃活躍創作的年代。1930年代日治時期的台灣正處於蠢蠢欲動的思想興起階段，已經不再是激烈的抗日運動。西方文化鼎盛流入與帝國主義的皇民化運動的相互影響之中牴觸，走向的是一種緩和性的社會運動。包含自發性的意識性社團或是開始發行的台灣刊物，例如《台灣文藝》、《台灣新文學》等，皆成為台灣知識分子發聲的管道。何義麟(2009)於學報中刊登〈1930年代台灣人的國族認同—以台中「東亞共榮協會」之發展為中心〉<sup>48</sup>一文所論述當時台灣社會團體的興衰狀況，也說明1930年代時期處於被統治者的台灣知識份子們，雖設限處於皇民化時期的階段，但還是有著表達思考與發言的空間。

一般而言，台灣社會進入戰時體制可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31年滿洲事變之後，台灣人所受到的壓迫是政治社會運動遭到打壓而已，知識分子還有一定的發言空間；第二階段是1937年「日中戰爭」爆發後，此

<sup>48</sup>何義麟，〈1930年代台灣人的國族認同—以台中「東亞共榮協會」之發展為中心〉，《文史台灣學報》第一期，2009年11月，頁222-241。

時是漢民族台灣人最為尷尬的時期，被要求隨時展現對國家的忠誠的言行；……(略)……本文所探討的1930年代的前半段，此時還在暴風雨來臨的前夕，台灣人知識分子具有充分批判思考能力，也還能充分表達了自己的想法，因此面對殖民統治政策的轉換期，還得以成立東亞共榮協會，表達自己的理想與有關國族認同的傾向。<sup>49</sup>

在這樣的社會運動盛行的時期，黃寶桃在對《台灣新文學》創刊之際，也難得留下對話紀錄。

井の中の蛙故別に意見などありません。唯從來文藝の大衆的發表機關といふもの、なかつた臺灣に、斯る盛舉を見ることは、これが本島に於ける新文學の發展の兆とでも言ひませう。眞に欣喜に堪えない所であります。私もこの機に乗じて微力乍ら弱筆を捧げ、臺灣新文學の爲一意専心盡し度いと思つてゐます先は御指導の程を……御隆盛の程を重ねて御祈り申します。<sup>50</sup>

我是井底之蛙，所以沒什麼特別意見。不過在一向沒有大眾文藝機構的台灣看到這樣的盛舉，可以說是新文學在本島發展的徵兆。我真是欣喜若狂，也想趁機獻上微薄之力，不揣淺陋，為台灣新文學盡一分心意。今後還請多多指教……謹祝鴻圖大展。<sup>51</sup>

黃寶桃幾乎像是謎樣性人物，關於黃寶桃的性別是男或女，至今還是有許多疑慮。雖然現今被冠上日治時期女性作家的稱謂，但翁聖峰教授(2010)卻提出「……(略)……黃寶桃之名雖為女性名稱，但仍可能不脫是出自男性之筆……(略)……」<sup>52</sup>這說詞。以下，即為翁聖峰教授(2010)於論文的註解中所整理出諸多學者的意見與論證，對此所做的評斷。

楊千鶴女士在〈殷切期待更慎重的研究態度〉一文中則說：「我記得賴氏雪紅是我所認識的一位日本男士的筆名。」「依我瞭解當時的情形，可以說並不是真正有一位名為賴雪紅的台灣女作家存在。(此外，在《民俗台灣》上，也有另一位我認識的日本男性以李氏杏花為筆名。)總之，當時有些男性曾以台灣女性的名字寫作。」若依楊千鶴女士的說法，則連黃寶桃與張氏碧華的女性作家身份都受到質疑。(丁鳳珍，1996：緒論)又羊子喬(1982：199)詩人簡介，稱黃寶桃：「基隆人，是一位男性詩人。」2009年8月29日於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經研究者詢問羊子喬先生關於詩人簡介的出處，羊子喬稱是得自黃得時、林芳年的說法。《徘徊於私語與秩序之間——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女性創作研究》未完全注意女性作者姓名與實況的落差，直接將黃寶桃、賴雪紅作品視為女性之作，值得再加商

<sup>49</sup>何義麟，〈1930年代台灣人的國族認同——以台中「東亞共榮協會」之發展為中心〉，《文史台灣學報》第一期，2009年11月，頁241。

<sup>50</sup>《台灣新文學》，新年創刊號，1936，頁46，收錄於《台灣新文學雜誌叢刊》，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81年復刻版，第十一冊。

<sup>51</sup>黃英哲主編；王惠珍等譯，《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臺南市：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頁323。

<sup>52</sup>翁聖峰，〈日治時期職業婦女題材文學的變遷及女性地位〉，《台灣學誌》創刊號，2010年4月，頁20。

權。(呂明純, 2007: 305-312) 而李元貞由陳梅溪、吳濁流、郭水潭對黃寶桃的稱謂, 認為黃寶桃是女作家, (李元貞, 2005: 261) 然而陳梅溪、吳濁流、郭水潭是認識黃寶桃本人? 還是僅由作者的姓名推論其為「女士」、「女性作家」? 關於此點似乎仍須再加考證。<sup>53</sup>

由此看來, 筆者在此處也應當不妄加定義黃寶桃的性別, 對於本研究重心傾向單純論述分析一名人物男孩太郎的心理狀態而言, 若將作者的性別納入考量或假設, 會趨向較不平衡的狀態。不論是以男性作家或是女性作家的視點來看, 依小說底下的人物性別也會容易被冠上因作者為男或女, 所以導致偏向「男或女的觀點」, 或是出現以「男性來寫女性」、「女性來寫男性」、「男性來寫男性」、「女性來寫女性」等諸如此類的刻板印象問題, 將會導致筆者較無法客觀的論及人物判斷的評論。對此, 本研究排除任何黃寶桃性別議題下所會影響本論文走向的猜測, 希望以跳脫鎖定女權問題的方式來看待黃寶桃的作品。

## 二、〈感情〉相關研究

對於黃寶桃的作品, 葉石濤先生曾說到「……(略)……特別是黃氏寶桃的小說, 左派思想濃厚, 把普遍人權和女權結合起來, 替弱勢人群的窮困生活有強烈的抗議。<sup>54</sup>……(略)……」之評價。後來學者以黃寶桃的作品為研究中心的也鮮少, 大多是以眾多文學作品之中參雜黃寶桃的著作下去探討研究主題。例如翁聖峰(2010)〈日治時期職業婦女題材文學的變遷及女性地位〉<sup>55</sup>引用〈人生〉、〈故鄉〉與星名宏修(2007)〈從一九三〇年代之貧困描寫閱讀複數的現代性〉<sup>56</sup>引用〈人生〉。對於本研究所要研究的〈感情〉一文, 尚未有獨立詳述此文本的分析研究。筆者只於呂明純學者(2003)《徘徊於私語與秩序之間: 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女性創作研究》<sup>57</sup>、〈潛抑與放逐——黃寶桃作品研究〉<sup>58</sup>與中國女性文學研究室網站內發現關於〈感情〉之相關解析。

〈感情〉的故事情節, 是關於一位小男孩太郎對於自己的父親是內地人而母親是本島人所結合生下孩子一事在生長環境下感到許多受挫。他的願望也是希望有朝一日能與自己遠在內地的父親相聚。而獨自扶養太郎的母親因忍受不了孤寂, 決定再婚。尋求兒子答應的她, 歡喜的得到兒子的祝福, 卻突然因希望兒子換下內地服飾一事, 造成故事的最終走向兩人感情的衝突, 爆發出濃濃的無奈傷感。呂明純學者(2003)的研究裡認為這篇作品主要處理的是內台結合的種族議題。她與筆者的想法相似之處在於認為先從題目觀察此篇作者所想要表達的正是「感情」這主線, 它正是〈感情〉的主旨。不同的是, 她分析裡渴望的目的是希望讀出黃寶桃這位作家於其中所要呈現的性別議題。她最後的結論裡解析了黃寶桃於〈感情〉一文的意念:

**透過細緻的心理描寫, 黃寶桃在政治正確的題材中寓託了性別議題,**

<sup>53</sup>翁聖峰,〈日治時期職業婦女題材文學的變遷及女性地位〉,《台灣學誌》創刊號, 2010年4月, 頁20, 註15。

<sup>54</sup>葉石濤,《台灣文學集》, 高雄市:春暉, 1996, 頁2。

<sup>55</sup>翁聖峰,〈日治時期職業婦女題材文學的變遷及女性地位〉,《台灣學誌》創刊號, 2010年4月, 頁1-31。

<sup>56</sup>星名宏修,〈從1930年代之貧困描寫閱讀複數的現代性〉,《臺灣文學學報》第10期, 2007年6月, 頁111-129。

<sup>57</sup>呂明純,《徘徊於私語與秩序之間: 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女性創作研究》, 台北市:台灣學生書局, 2007年10月01日。

<sup>58</sup>呂明純,〈潛抑與放逐——黃寶桃作品研究〉, 范銘如主編,《挑撥新趨勢: 第二屆中國女性書寫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台北市:台灣學生書局, 2003年2月。(書與論文所論及的內容一樣, 本研究就以論文為對照)

用一種隱約、歪斜的方式，說出女人的感情在強大家國論述下被消音、被犧牲的實況。同樣關懷國計民生、同樣重視在小說中呈現當代社會問題，黃氏寶桃的切入點卻和男作家們不一樣。延續女性寫實創作中對於感情和愛的重視，黃寶桃在書寫種族認同題材時念念不忘的還是感情，為女性情感在家國論述上的弱勢地位抱屈。

從職場女工的性議題到家庭女性的性剝削，再到種族認同問題對於人性的感情傷害，黃寶桃的獨樹一格的書寫模式已逐漸明朗：在小說創作題材上，黃寶桃不向個人化路線的女性寫實靠攏，而走具有人道關懷和社會使命的批判寫實創作路線。但在結合當代問題、具體呈現社會各階層的苦難時，黃寶桃的性別身份，卻又讓她對於台灣女性在種族、性別、階級上的多重劣勢有更多的體認和同情。不同於其他女作家們對於個人小我的強調，她把對於性別層面的關懷，拓展到日據女性和當時社會的互動。因此她在小說中所表現出的、無論是對社會結構的強烈批判，或是對種族認同議題的探討，都格外點明了台灣女性在這些議題中所居的多種劣勢。尤其她對性別議題的關注，讓她能夠針對尖銳的性剝削議題提出強烈的抗議，相對於男性作家於此的偏頗和侷限，黃寶桃可說以女性角度，矯正了批判寫實主義於「性別迫害」一事的盲點之所在。<sup>59</sup>

對此，筆者認為，如同介紹作者部分有提及到黃寶桃的身分還有待商榷的論點納入的話，排除遭受質疑的部分，不直接以她作為女性作家來看待，不考慮既有的設定性別，黃寶桃所要抒發的〈感情〉小說裡，富有著更多可能性。也許，正因為黃寶桃的身分不明才能給予我們後世人研究下更多想像的空間，不單單只因女性主義或性別種族議題而聚焦於本文章中，使得研究方向容易因為如此因素而牽動走向分析文章中的母親角色，傾向描述黃寶桃如何抒發一位女性被壓抑的無力。反之，本研究也並非是因主角為男性就以男性為中心來論述，而強化小說年代底下與佛洛伊德理論裡帶有的父權主義思想。筆者只是選擇以客觀分析角色的態度來描述主角，發現主角太郎未被注意的心理症狀。回歸〈感情〉內容，雖以第三人稱書寫，但可以見得兒子太郎為小說中的第一主角，故事內容走向也以太郎為出發論述鋪成，他所被黃寶桃塑造出的意義是否該重新審視。〈感情〉一文中，母子的互動到各自生活上感情的傷痛和矛盾都應當被探討。但可惜的是，對於〈感情〉中太郎這位富有研究價值的故事人物卻還沒有被深入探究，此角色在此作品中竟然默默地成為配角，母親角色的存在反而淡化掉他被創造的價值。對太郎的解說，淡江大學中國女性文學研究室對於〈感情〉一文的分析，則有了從母親議題部分延伸至太郎感情問題的描述……

其實，「感情」這篇小說裡，作者所賦予真正有行動、思想的角色只有兩個人——即母親和太郎。中間所穿插的是一些不僅臉孔連性格都十分模糊的配角——太郎的父親、母親的叔叔，及欲娶母親的台灣人。如此簡單的架構，甚至可以說是生硬拗口的詞彙，讓人讀起來卻別有一種細膩的感動。作者透過日台認同議題來偷渡性別意識問題，這一點在文本中是很容易就

<sup>59</sup> 呂明純，〈潛抑與放逐——黃寶桃作品研究〉，范銘如主編，《挑撥新趨勢：第二屆中國女性書寫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市：台灣學生書局，2003年2月，頁221。

找得到線索的。文本中母親是被拋棄者，卻有一種應該感到光榮且理所當然的心情。且太郎在文本中是個強勢者，儼然是母親的「法定監護人」。母親徵求太郎穿台灣衫時的態度竟是「好似罪人接受審判一樣的態度」充分的顯示台灣女性在這事件的處理上是多麼的弱勢。若以作者的寫作背景來尋找線索的話，那文本中的母親就好比台灣，父親則像日本，而太郎正是象徵在日本殖民體制下出生成長的台灣人，並且接受殖民政策教育培養下的台灣知識份子。他們在文化上、意識上對日本政府的認同，已然成為對新思想的接受者與傳播者。而情感上、血緣上的歸依，又使他們念念不忘這位台灣母親。這其間的感情寄託是複雜又矛盾的。<sup>60</sup>

這裡點出太郎角色的感情是極為複雜與矛盾的，卻感受不到太郎內心糾葛的來龍去脈。筆者認為還是少了從文本裡細說，因此只能從大方向下去思索與解釋，單方面的歸納出太郎的行為是夾雜在台日思維與情緒之下導致感情寄託失衡。藉由作品來理解作者所要傳遞的理念來思索，是否讓此角色有更多被發掘的可能，如同筆者於動機與目的所表達解釋下，太郎或許是社會現實小家庭的投影，而這或許也是他被黃寶桃所創造出的意義。從角色所在的殖民時期台灣、本身的混血身分問題再到單親家庭的小孩，作家黃寶桃所會構思出這主角人物也是受當時社會寫實狀況所影響而來的靈感，筆下傳遞的訊息成為讀者所能夠拼貼的歷史裂痕。對於當時代特殊的氛圍下，這樣與太郎相同背景的人—日治時期既是台日混血兒又是單親的孩童，應該比起時常被論及的內台通婚家庭下的小孩來得多，（如同筆者在研究目的所提到的數字顯示般）。

若假定這是作者黃寶桃創作〈感情〉時，所想要呈現的台灣日治時期背景下平凡小家庭中的影像，那〈感情〉此小說太郎的「感情」是否表象著很多人的「感情」，他的矛盾是否理當應該去被著墨了解。這也是筆者與先行研究中其餘學者選擇不同研究方向的原因，因為黃寶桃的研究裡，聚焦於女性弱勢議題的趨勢下，筆者認為已經使得這塊領域呈現近乎飽和與完好的狀態。筆者希望作出不同於研究黃寶桃的既有路線，展現黃寶桃於文章中另外所想傳遞的社會狀態之可能。為了補足與豐富黃寶桃〈感情〉的研究，以太郎為中心下去探討他在文章中感情的問題與情緒心理的發展，了解日據時代的台灣所普遍存在的糾結又矛盾的「心理感情狀態」。

如前述筆者所言，要明白它存在的起因，創始悠久的精神分析理論中所帶有的普遍人格細膩分析就是本篇研究沿用的重要依據。筆者參照此作法來表現文學，前面論述之研究的動機與目的中，已經理解文學與精神分析之結合與利用已經是西方諸多的文學，甚至到電影創作所會涵蓋的元素，另一方面，中文文學裡面，雖說起初發展受到保守思維的因素，導致排斥的現象，但直至二十一世紀的今日走向來看，國內研究文學或是藝術裡，其實佛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手法接受度已經大幅增加並且漸漸開始普及化。例如像是鐘秀敏(2004)〈惡與善：綠野仙蹤、女巫及和平女巫中的女巫形象〉<sup>61</sup>其論文裡就出現了引用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中的「人格結構：本我、自我、超我」來了解文本內隱藏的涵義。還有，2012年出版的《佛洛伊德讀張愛玲》<sup>62</sup>一書裡，作者鍾正道教授也以此做法來解析張愛玲的小說，從佛洛伊德的觀點來閱讀張愛玲其人其作，還分為夢

<sup>60</sup>2013年4月1日，取自中國女性文學研究室  
[http://studentclub.tku.edu.tw/~tkuwl/a2\\_tai\\_1.htm](http://studentclub.tku.edu.tw/~tkuwl/a2_tai_1.htm)

<sup>61</sup>鐘秀敏，〈惡與善：綠野仙蹤、女巫及和平女巫中的女巫形象〉，靜宜大學碩士論文，2004。

<sup>62</sup>鍾正道，《佛洛伊德讀張愛玲》，台北：萬卷樓，2012年08月31日。

境歇斯底里、伊底帕斯情結、自戀、戀物五個單元來分析張愛玲小說中的人物特性，與筆者研究的手法方向極其相似。另外，如同社會文化研究學者劉紀蕙，於創作《孤兒·女神·負面書寫：文化符號的徵狀式閱讀》<sup>63</sup>一書中所提及的「徵狀式閱讀」，即是運用佛洛伊德的理論所思考而來<sup>64</sup>。

由以上學者們的作法可以發現，若要解析細膩的心理，代表精神分析理論的創始人佛洛伊德是時常被提及的，其有助患者調解心態、克服自身的壓力與精神疾病之精神分析理論畢竟是可以幫助我們更深層的探究並且察覺心理障礙，藉此重建心理創傷的依據。因此，分析黃寶桃〈感情〉裡的太郎，筆者也將先從與太郎有著密切感情關聯的母親來解析，連結佛洛伊德提及的天生擁有之「戀母情結」當作開端，再進入解析太郎個體的心理症狀，從中理解他的「人格結構」與「防衛機制」運作，發展出不一樣的黃寶桃〈感情〉研究。既然如此，首先有必要先從太郎此人物的各個相關背景下去摸索。

### 第三節 主角太郎相關心理背景

佛洛伊德說：在出生後五年裡發生的事情，對我們後來行為有決定性的力量。當世界對兒童還是一個完全新奇的經驗時，這些體驗會持續在潛意識中形成一股強大的力量存在著，雖然意識上並不知道自己在收集儲存。而這些或清楚或模糊或細微或重大的童年人、事、物，多半影響成長後的生活方式。它們決定了我們長大後是一個懦弱或勇敢；退縮或進取；愛人或自私的人。<sup>65</sup>

- 《佛洛伊德無所不在》

#### 一、殖民地台灣心理

黃寶桃於1936年創作〈感情〉一文，台灣時代背景正值日治時期，被殖民的台灣與殖民者日本之間漸漸產生一種微妙的區隔，或者是說台灣人種與日本人種產生了高低的心理差異。從角色太郎對於內地父親的崇拜與房間內的日本國旗甚至他所穿的衣服和使用的語言來看，即使生長於台灣有著半個本島人身分的他，在面對學校的群體壓力的日本人優越心理影響下所產生的自卑以及劣等人種的思想，正與誕生環境所塑造的風氣息息相關。

學校でも彼だけが、内地語と台灣語の持主だった。で、同級生達からの  
け者にされて、何時でも偶の方に一人ぼっちで置かれた。<sup>66</sup>

在學校裡唯有他才會講內地話（日本人）和台灣話。因此，被同學排擠，

<sup>63</sup>劉紀蕙，《孤兒·女神·負面書寫：文化符號的徵狀式閱讀》，台北：立緒出版社，2000。

<sup>64</sup>劉紀蕙：「由以上的討論，我們了解如何從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來理解與創作行為有關的活動，例如遊戲、表演以及藝術創作等等，也就是說，我們要藉由佛洛伊德對於夢思想與夢的工作的討論，以及他對於無意識系統的後設心理學理論的發展，進入文學與藝術作品，思考創作者如何以極大精力投注某一些經過變形而作為替代物的文化符號，展演種種個人化的內在衝突，也就是所謂的「徵狀式閱讀」。

劉紀蕙，〈視覺圖像與文化場域的精神分析詮釋模式〉，《孤兒·女神·負面書寫：文化符號的徵狀式閱讀》，台北：立緒出版社，2000，頁49。

<sup>65</sup>張秀琴，《佛洛伊德無所不在》，臺中市：好讀，2004，頁38。

<sup>66</sup>黃氏寶桃，〈感情〉，《台灣文藝》，第三卷第四五期，1936年4月20日，頁22，收錄於《台灣新文學雜誌叢刊》，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81年復刻版，第十冊。

時常獨自一個人在某個角落裡躲著。<sup>67</sup>

本島人とさえ見ればリイヤと言って、劣等人種である様に思っているこの邊りの人達から逃れて行きたく<sup>68</sup>

這出自於他要逃避只要是就叫「リイヤ（你呀）」而當作劣等人種的周遭的人的念頭<sup>69</sup>

在許多日治時期的小說內，也常見到作家們為了提醒民族意識與反諷那些崇洋媚外的心思，也都創造了一些人物來表述日據時代社會中對於日本存在著異常附和的心理現象。作家吳濁流也曾於書中提及自己的父親也常嘆息「臺灣人已成籠中鳥，日本憲警所說的話，除了唯唯諾諾之外沒有別的辦法了。<sup>70</sup>」權力掌握於手的日本，對於所佔領的土地台灣開始進行管理與調教。將台灣人民試圖改造成日本國民般看待，將台灣納為真正與之步調相合的殖民地。政治大學李仁芳教授曾說道的一句話：「人看／讀什麼也會像什麼（You are what you see/read.）」<sup>71</sup>，此句話也適用於日治時期的台灣人民。連空氣皆充斥著與日本相關的環境，在這樣的潛移默化下，台灣人民的心理開始有了矛盾與困惑，自身所存有的台灣意識與潛意識渴望轉化為屬於日本人的身分所會擁有的那優越意識，這兩種意識開始產生衝擊。如同河南師範大學學報裡頭，宋淑芳(2009)所刊登的文章之描述下相似，論述對映著白人底下作為「他者」的黑人，正因為其文化的無根性來自於長期受到歧視的黑人產生強烈的自卑感，使他們對本民族文化產生嚴重的拒斥心理，種族歧視的影響下，既無法認同本民族文化，也不被白人文化所接受，成為兩種文化的「他者」，這種兩難處境使黑人遭受著人格分裂的慘痛。將自己「白人化」或者戴上「白面具」是黑人在面對本民族文化和白人主流文化的兩種典型反應<sup>72</sup>。

《黑皮膚，白面具》一書中，法農認為「然而我們會看到，黑人的異化並不是個體的問題。在種系發生和個體發生之外，還有社會發生(sociogénie)<sup>73</sup>。」台灣正如同於法農所述之黑人的立足點一般，當時代社會下演變出台灣人與日本人明顯的種族優劣心理，台灣意識與種族認同遭到打壓，面對日本文化開始有種崇拜與效法。這也正是孫妮(2006)於安徽大學學報所提及之「殖民教育和文化侵略是產生模仿和模仿者的根源所在<sup>74</sup>」的證明。對自己姓名的否定進而否定台灣自身文化傳統、包含自我的身分，成一個虛幻的無根之人，環境的逼迫與規範下，把日本人的主流文化當成自己的文化來認同，即使如此卻還是得到差別待遇，日本人的心理還是無法完全認同和接納台灣人。因此，身心面臨了雙重的抉擇，對於日本有種跟隨與膜拜的情愫，但現實中當受到挫折時，自身的台灣民族意識將有著蠢蠢欲動的反抗慾望，但卻又會被強烈的無形制約與壓抑住，因而導致心理逐漸造成失衡狀態。自己也沉淪於這樣心態內的吳濁流先生表示對殖民地型的

<sup>67</sup>葉石濤，《葉石濤全集 22，翻譯卷二》，高雄市：高市文化局；台南市：國立台灣文學館，2006-，頁 181。

<sup>68</sup>黃氏寶桃，〈感情〉，《台灣文藝》，第三卷第四五期，1936 年 4 月 20 日，頁 22，收錄於《台灣新文學雜誌叢刊》，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81 年復刻版，第十冊。

<sup>69</sup>葉石濤，《葉石濤全集 22，翻譯卷二》，高雄市：高市文化局；台南市：國立台灣文學館，2006-，頁 182。

<sup>70</sup>吳濁流，《台灣連翹》，台北：前衛出版社，1995，頁 24。

<sup>71</sup>李仁芳，〈崩敗中的電視內容產業？〉，《今周刊》，第 852 期，2013 年 4 月。

<sup>72</sup>宋淑芳，〈“他者”黑人—奧尼爾筆下黑人形象的文化與心理阐释〉，《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6 卷 5 期，2009 年 9 月 10 日，頁 172-175。

<sup>73</sup>弗朗茲·法農，《黑皮膚·白面具》，陳瑞樺譯，台北：心靈工坊，2005，頁 68。

<sup>74</sup>孫妮，〈V. S. 奈保爾 74《模仿者》的多重主題解讀〉，《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34 卷 1 期，2006 年 1 月，頁 48-53。

性格感到痛苦與矛盾，他自言道：

……(略)……我決不是有意與之妥協，那時候，我對日本人的橫暴與不正，做為一個本島人，不曾感悟有抗議的義務。只是心中憤慨，對應當如何去做的事，一點也沒去動腦筋。尤其因我是首席訓導，應該站在本島人這一邊，對於學校的不正當的處置，應當推動家長會，提出抗議才對，可是，為什麼這樣的想法，一點也不曾興起呢？我確實在性格上有奴隸性，在意識中承認日本人的不法行為，彷彿去勢了的人一樣，被捏造成了方便日本的殖民地統治的人物了。<sup>75</sup>

佛洛伊德曾論述過民族性所帶有的無意識群體現象，其實表示出台灣族群意識早就已經在無意識中深根：

我們的有意識的行為是某種無意識的基質引起的；這種無意識的基質主要是由遺傳影響在心裡中形成，經由無數代代相傳，积淀成了構成無意識基質的共同特徵。而正是這些特徵，形成了一個種族的的天賦資質。<sup>76</sup>

所以在面臨突如其來的政治上與經濟上對殖民地實行控制和掠奪，同時又利用文化教育對被殖民者進行心理滲透，殖民地的心理被異化（自我身分的喪失）造成嚴重分裂的情感，將陷入「我應該作哪種人？」的疑問。台灣人在被殖民下，日本人為了管制方便施行的同化制度，希望使原本日本與台灣這兩個群體變為同一群體心理狀況，而如此一來台灣人即可以日本為中心，順從日本治理。如同政治大學講師張惠珍(2007)以下所述：

……(略)……殖民政權對被殖民的臺灣人實施所謂的「同化教育」，被殖民者被迫改以殖民者的語言為國語，殖民政權開始假現代化教育之名，行扭曲民族人格與認同的「殖民教育」之實，並隨著殖民時間的推移，逐漸矮化、弱化進而奴化。<sup>77</sup>

面對日本語的學習和改名等制度下，周遭人對於日本人與台灣人區別化的想法，感染性<sup>78</sup>的力量開始蔓延於台灣。它就像是佛洛伊德引用了麥克杜洛爾所言下的「情緒直接誘導原則」一般。

這一情緒的直接誘導原則是經過原始的交感反應，也就是我們早已熟知的情緒感染而發揮作用的。事實上，對某種情感狀態徵象的感知和理解很可能會自動的計算下來，並在感知他們的主體內心造成同樣的情感。同時，可以觀察到的具有這種效應的群體成員數目越大，這種自動生成的強迫現象就越強烈。個人完全喪失了批判能力，最終使自己陷入同樣的情感

<sup>75</sup>吳濁流，《台灣連翹》，台北：前衛出版社，1995，頁30。

<sup>76</sup>佛洛伊德，《論文明》，譯者徐洋、何桂全、張敦福，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10月，頁152。

<sup>77</sup>張惠珍，〈紀實與虛構：吳濁流、鍾理和的中國之旅與原鄉認同〉，臺北大學中文學報，第3期，2007年9月，頁39。

<sup>78</sup>佛洛伊德：「它的存在很容易確定，但解釋起來卻並不那麼輕而易舉。它肯定屬於催眠這一類的現象，對此我們將要在以後簡短地研究。在一個群體裡面，每一種情感、每一個行為都具有感染性，這種感染性甚至能使一個人心甘情願地犧牲個人私利來保全集體利益。」

佛洛伊德，《論文明》，譯者徐洋、何桂全、張敦福，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10月，頁153。

漩渦之中。不過，在這樣做的過程中，個人也激發了其他人的情感，使別人更加興奮，而他們也曾給他個人施加過影響。這樣一來，人們彼此之間的相互影響就會使個人的情感負荷大大增加。在這種強迫自己仿效別人做法的現象裡，確定無疑地有某種東西在發揮作用，使自己和眾人保持和諧一致。在這種過程中，情感衝動越是粗野和素樸簡單，在一個群體中的傳播感染越容易通過這種方式進行。<sup>79</sup>

因此，身為台灣人的根，卻想長成日本人的樹，這樣詭譎的心態就成了此社會背景下，心理歸屬的一大問題。

## 二、日治時期台日混血兒心理

殖民地台灣的社會風氣下，對於雙親為日本人與台灣人結合的小孩而言，自我身分認同問題應該是最常困擾他們。體內的血緣流動與外界所接觸的人事物產生摩擦，影響自身心理的情緒。《流轉家族》一書中記錄了日據時代下一對台日混血兒兄妹的心情表述，他們以血淋淋的自身體悟的遭遇，透過最寫實的口述方式訴說了他們的故事。他們的父親是內地人警察，母親是泰雅公主，這政略結婚所造就的家族故事有著最真實的辛酸過程。此本書其實是由混血兒林香蘭(下山操子)與林光明(下山一)根據父親口述寫成。日治時代初期，因為台灣總督府為了統治方便，欲儘快征服住在深山中兇悍難以訓服的原住民，於是總督府施行了政略婚姻，即所謂安排管理蕃人的警察與原住民頭目的女兒(公主)結婚。而出現頭目公主穿上和服的詭譎情形。後代因為混種的關係導致受盡族裡其他人嘲笑諷刺的經歷，皆是他們所背負的擾人困境。混血兒兒子林光明(下山一)被欺負的情形在書中內展現：

世人最現實，冷酷無情。我和阿宏突然變成同學欺侮的對象，罵我們混血兒、雜種、私生子、被父親遺棄的可憐人、蕃人之子、黥面人之子……(略)……。常常故意打我們，推倒我們，用腳絆倒我們，用石頭丟傷我們。<sup>80</sup>

中國時報報導專訪中，混血兒女兒林香蘭(下山操子)她回憶小時候的情景裡也能感受出作為一位台日混血兒心境上的波折，對於族國認同的掙扎與困惑，其中又包含著對於父母雙親的真情無法割捨。

她說家裡窮得跟乞丐差不多，又因在日本化的家庭長大，老被同學欺負謾罵：「日本鬼子！」每次回家哭訴，爸媽便告訴她「要忍耐」。自認屬於日本的她，四十四歲才首度踏上日本。「當時坐船開進日本下關碼頭，我站在甲板上，忍不住淚流滿面，因為這就是簽訂《馬關條約》的地方，如果不是《馬關條約》，日本不會殖民台灣，就不會有爸爸這個政略婚姻之子，沒有爸爸，就沒有我們。」現在，她早已認同自己是台灣人，「我

<sup>79</sup>佛洛伊德，《論文明》，譯者徐洋、何桂全、張敦福，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10月，頁159。

<sup>80</sup>下山一自述；下山操子譯寫，《流轉家族：泰雅公主媽媽、日本警察爸爸和我的故事》，臺北市：遠流，2011，頁165-168。

生在台灣、長在台灣，台灣是我的故鄉。」<sup>81</sup>

對於父母親之國籍屬於殖民與被殖民間的不對等關係，導致兩方交雜的孩子們矛盾在於不知該如何選擇皆為自身一部分根源的血淚心情，就如此書的推薦序裡，台灣史、日本近代史學者吳密察所道：

……(略)……到底，像下山一這樣的日本「理蕃」警察與原住民女子結婚所生的孩子，是日本人還是台灣人？他們的父親和母親，在戰後是否會有一樣的選擇？如果父親與母親的選擇不同，他們到底將追隨父親還是母親的選擇？他們是應該回到幾乎不知父祖之地為何物的日本，還是留在母親的故鄉台灣山地？而這當中又有多少由得了他們自由選擇的餘裕？是他們可以自由選擇，還是他們要被迫地進行選擇，甚至被時代或他人所選擇？山地征服、政略婚姻、殖民統治、戰爭，樣樣都那麼激烈地左右他們的人生！<sup>82</sup>

另外，族群史、區域研究學者，現任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副所長詹素娟所言表示因為世局的變遷轉移下，造成後代孩子不知所屬的心情，可見台日混血兒在殖民時期與殖民後都無奈地需要面臨自己該是誰這種尷尬的局面。

……(略)……然而，這對異族夫妻在殘酷的統治政略中，建立了愛情、親情具備的家庭，誕育了延續生命的子女，並聯繫起台、日兩地牽扯不斷的情緣，卻也讓下山一在戰後成為卡在日本國、中華民國之間，不知歸屬何方的「亡國奴」。<sup>83</sup>

小說內所塑造的人物裡，也能看得出作者描述筆下的台日混血兒本身對自我所擁有的台灣人血統有著排斥的行為。筆者以下列舉台日混血兒的幾篇相關研究論文，展現學者們對於台日混血兒的心理狀態之描述。

林慧君(2006)於台灣文學學報裡，及刊登了一篇研究坂口零子之小說的文章裡，就分析論述到〈時計草〉裡的台日混血者-山川純之角色。故事中，山川純是理蕃政策時，臺灣原住民母親鐵瓦斯魯道與日本人父親山川玄太郎所生下的混血兒，後來父親也是拋棄原住民妻子離去，山川純於歷經人生的體驗中，逐漸產生了血統與意識下掙扎的心態，在思索自我的拔河裡，隱隱地產生了許多憂愁。林慧君(2006)的一段話裡寫到了山川純對於自己面對母親與自身一半是原住民血統的事實的矛盾心情。

#### 面對母親三十年了仍顯得笨拙的坐姿，純有種極似脫離血緣關係的衝

<sup>81</sup>林欣誼 專訪，〈父親道盡委屈 林香蘭邊寫邊哭〉，中國時報，2011年7月2日。

2013年3月3日，取自奇摩新聞網

<http://tw.news.yahoo.com/%E7%88%B6%E8%A6%AA%E9%81%93%E7%9B%A1%E5%A7%94%E5%B1%88-%E6%9E%97%E9%A6%99%E8%98%AD%E9%82%8A%E5%AF%AB%E9%82%8A%E5%93%AD-183952945.html>

<sup>82</sup>下山一自述；下山操子譯寫，《流轉家族：泰雅公主媽媽、日本警察爸爸和我的故事》，臺北市：遠流，2011，推薦序一，頁11。

<sup>83</sup>下山一自述；下山操子譯寫，《流轉家族：泰雅公主媽媽、日本警察爸爸和我的故事》，臺北市：遠流，2011，推薦序二，頁13-14。

動。母親謙遜的用語、卑屈的態度，有時令純感到氣憤，內心質疑母親當年為何要嫁給內地人的父親，然而在實際言行上又努力做到不傷害母親。當純八歲時，父親未清楚交代，即將母親與兄妹三人留在山上返回日本。之後又娶了內地女性為妻，並育有三女，這些都加深了純在身分認同上的陰影與矛盾。在身分認同的曖昧中，只有面對大自然的山林，純才能感受到身心安頓，熱愛原住民與生長土地的純，厭惡來到山裡的旅客那滿足慾望的獵奇式眼光，內心吶喊著「高砂族，我的骨肉至親」。<sup>84</sup>

台日混血兒山川純面臨自己的血緣，受到大環境的影響以及耳濡目染下，他產生偏見的思維進而間接導致自己出現破洞的心。山川純對於自身原住民的身分感到自卑與低等，而也因這潛意識下的抗拒與厭惡，反倒傷害了自己與所愛的母親。

另外，從《陳夫人》小說裡的台日混血兒-清子的描述中也能看出台日混血兒的心情，清子的父親為台灣人，母親卻是日本人，其心裡的矛盾也在於身分認同下的搖擺間產生。清子一段話語充分表達出她對於自己身分混雜的厭惡，筆者認為話中也深深地嗅出一股辛酸的自我貶責情緒。

自分は内地人であり臺灣人だ。といふことはそのどつちでもないことではないか。この二つのものは下手に繪具をとかしたやうに、どうしてもさつぱりとしたい、色にはならない。<sup>85</sup>

我既是日本人，又是台灣人；這等於我不是日本人，也不是台灣人。這兩者像拙於調和的水彩顏料一樣，總是無法調配出清爽的好顏色。<sup>86</sup>

學者張春華(2008)其〈庄司總一《陳夫人》身份認同研究〉論文中，對於清子上述的一番言論作出了解析：

……(略)……對清子來說，不管自己的身分是屬於哪一種人都一樣醜陋，因為不純粹的血就像不清不白的顏色一般，無法呈現乾淨明快的俐落感。混血兒清子對所背負的不純粹血的原罪發出悲鳴，只能默默承受孤獨的宿命。<sup>87</sup>

前述學者廖苑純(2011)其〈異族婚姻的法制與文化調適：以日治時期「內台共婚」案例分析為中心〉論文內，對此段情節也有了以下評論：

內台共婚的家庭子女在其成長的歷程中，往往必須承受著他人對於自身民族身分的異樣眼光，因而無法融入「純內地人」或是「純台灣人」的社交圈中，甚至對於自我的民族定位無所適從。<sup>88</sup>

<sup>84</sup>林慧君，〈坂口（零）子小說人物的身分認同—以〈鄭一家〉、〈時計草〉為中心〉，臺灣文學學報，第8期，2006年6月1日，頁140。

<sup>85</sup>庄司總一，《陳夫人》，第二部，山下武監修，東京都：大空社，2000，頁252。

<sup>86</sup>庄司總一，《陳夫人》，黃玉燕譯，臺北市：文經出版社，2012，頁399。

<sup>87</sup>張春華，〈庄司總一《陳夫人》身份認同研究〉，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8，頁140。

<sup>88</sup>廖苑純，〈異族婚姻的法制與文化調適：以日治時期「內台共婚」案例分析為中心〉，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碩

廖苑純(2011)其論文也闡述了《陳夫人》小說中的清子，身為殖民與被殖民間的雙重身分下，混血兒的矛盾處境與不知歸屬何處的自我認同問題。針對清子於慶祝生日的場合中，選擇服裝時她的心情掙扎寫照的情境<sup>89</sup>，作出以下論述：

由於日本人與台灣人之間，存在著一條「支配者—被支配者」的殖民統治界線，在雙方地位不平等的情形下，混血兒究竟該選擇繼承父方或是母方的文化？自我認同的問題，深深困擾著許多共婚家庭的子女。<sup>90</sup>

不僅如此，廖苑純(2011)〈異族婚姻的法制與文化調適：以日治時期「內台共婚」案例分析為中心〉其論文內所列舉了幾位日治時期底下作為混血兒的母親們，訴說著她們看著心疼骨肉遇到困境的寫實記錄。

如果要說內台結婚有甚麼煩惱的話，最大的問題應該就是小孩的教育問題了吧。即使已經在幼稚園讀了三年，到現在還是沒有朋友。……(略)……他不是一個人沙丘玩堆土，就是一個人站在柱子後面看其他小朋友開心的遊戲著。……(略)……即使主動去邀請其他小朋友一起玩，其他人也會說：「你是台灣人，我們不跟你玩。」我為這樣的情況而感到不捨和心痛不已。<sup>91</sup>

我的孩子因為被其他人取笑為「リーヤ」而哭著跑回來了！  
「媽媽，我絕對不是「リーヤ」對不對！」  
沒錯！你是堂堂正正的日本人。  
那麼為什麼大家都要取笑我是「リーヤ」呢？我的孩子一邊流著不甘心的眼淚，一邊這樣問我……(略)……。<sup>92</sup>

其中，中間秀子女士的經歷裡，「リーヤ」一詞，也恰好出現在筆者所研究的小說〈感情〉

---

士論文，2011，頁70。

<sup>89</sup>「私は自分のかほ嫌いよ。鼻が短くて、輪廓は丸くて……。いやだなあ、支那服なんか」

口ではさう云ったが、支那服を着たときいちばんはつきりと自分の個性が出ることを清子は知ってるた。もし彼女が内地人であつたら、わけなく着たであらう。その場合、それは一つの慰みであり趣味であり、あるひは氣紛れともなう。だが、清子の場合では、臺灣服を着るといふことが、本来的に個性に合致するのならまだ簡単だが、半分は合ひ半分は合はないといふやうな中途半端な觀念の下に、妙に重苦しい偏見や混迷があるのだった。和服においても同じことが云へるのである。

庄司總一，《陳夫人》，第二部，山下武監修，東京都：大空社，2000，頁244。

「我不喜歡自己的臉，鼻子短，輪廓圓……我不喜歡穿旗袍。」

清子的嘴雖然這樣說，但她知道穿旗袍最能清楚地顯露出自己的個性。如果她是日本人，她會穿，這種情形，其中之一是欣慰和趣味，或改變一下的心情。但現在的情形是，穿旗袍和她本來的個性一致沒話說，可是在她自己覺得一半適合一半不適合的觀念下，穿旗袍顯得有一點愚蠢或迷混，同樣地，穿和服的感覺也可以說是這樣的。

庄司總一，《陳夫人》，黃玉燕譯，臺北市：文經出版社，2012，頁393-394。

<sup>90</sup>廖苑純，〈異族婚姻的法制與文化調適：以日治時期「內台共婚」案例分析為中心〉，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1，頁71。

<sup>91</sup>林英子，〈共婚者の悩み：幼い子供のためを〉，《台灣婦人界》，1936年10月，頁48-50。轉引自廖苑純，〈異族婚姻的法制與文化調適：以日治時期「內台共婚」案例分析為中心〉，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1，頁69。

<sup>92</sup>中間秀子，〈共婚者の悩み：茨の路も〉，《台灣婦人界》，1936年10月，頁51-52。轉引自廖苑純，〈異族婚姻的法制與文化調適：以日治時期「內台共婚」案例分析為中心〉，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1，頁68。

裡，故事裡太郎也對於「リイヤ」的字眼極度厭惡，由此得知這種帶有貶低意味的詞彙，在日治時期內地人對於本島人的稱謂方式應是很普遍的用語。

本島人とさえ見ればリイヤと言って、劣等人種である様に思っている  
この邊りの人達から逃れて行きたくもあり<sup>93</sup>……(略)……

這出自於他要逃避只要是本島人就叫「リイヤ(你呀)」而當作劣等人種  
的周遭的人的念頭<sup>94</sup>……(略)……

透過引用以上學者的論述，可感受到台日混血兒當時被嘲弄的處境。歧視的言語與視線投射下存有的鄙視眼神，加上同儕互動之間所釋放的精神壓力與引發的排擠效應，會使得台日混血兒於團體中無法得到快樂與滿足，反倒使孤獨感加深，那是一種被孤立的恐慌。《恐懼》<sup>95</sup>一書中所提及到「所謂社會排斥，現在表現為情感欺辱，也被解釋為帶來痛苦最多的一類欺辱的現象，正是兒童發展社交技能和培養自信過程中常見的困難<sup>96</sup>」，〈感情〉中遭遇同儕排斥的太郎就是如此。我們看見對於台日混血兒而言，自身的半個被殖民者的身分被擴大，台灣人的影子被唾棄。需要自尊與價值的他們，體內開始強烈訴求並且需要孕化有著證明自身為驕傲血統日本人的行動。

《生活中的心理學》<sup>97</sup>著作裡，描述阿倫森和奧舍羅(Aronson and Osherow)兩位心理學家於1980年所作的一個實驗案例，名為「藍眼珠好還是棕黃眼珠好?」。

學生聽老師他們的老師講，有棕黃眼珠的智力較高，是“更好”的人。老師給棕黃眼珠的孩子一些特權，比如坐在教室的前排。兩組孩子的行為都變了；藍眼珠的孩子出現自尊降低、情緒抑鬱的跡象，而且功課也做得差了。而棕黃眼珠的孩子則對他們的“低級同伴”吹毛求疵，咄咄逼人。幾天之後，老師說他錯了，藍眼珠的孩子才是更優秀的，行為樣式很快顛倒了，棕黃眼珠的孩子變得抑鬱起來。當然，實驗結束之後，要給孩子們解釋一下這個研究。<sup>98</sup>

日治時期的教育下，差別化的台灣人與日本人，不也是這樣的顯現嗎？淪落成如棕黃眼珠與藍眼珠的小孩在被區分為智力較低的一群時他們所面臨的情緒狀況相似，本島人當時被劃分為低一等的族群時的低落，也因為無法納入社會定義的優秀族群內地人一員而抑鬱自卑。不僅如此，也會感受到另一群人驕傲的自傲心理建設下所帶來的強烈打壓與污辱。這樣環境下所成長的兒童怎能不憂鬱困惑。

對於台日混血兒而言，不僅要面臨自我身分歸屬問題，心理上還需要受到外界的質疑與批判，心理上尋求慰藉的方式，則是不斷說服他人與自我的認同感。在找尋「自己的我」是誰的方向漸漸越來越不知所從。因為即使面對外界日本與台灣差別化的他們，尋求不被傷害的安全途徑時，還是得面對血緣的牽繫之下無法抹滅的兩難境界。本研究的角色太郎正是於這樣的殖民時期裡受

<sup>93</sup>黃氏寶桃，〈感情〉，《台灣文藝》，第三卷第四五期，1936年4月20日，頁22，收錄於《台灣新文學雜誌叢刊》，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81年復刻版，第十冊。

<sup>94</sup>葉石濤，《葉石濤全集22，翻譯卷二》，高雄市：高市文化局；台南市：國立台灣文學館，2006-，頁182。

<sup>95</sup>弗蘭克·富里迪，《恐懼》，方軍、張淑文、呂靜蓮譯，南京市：江蘇人民，2004。

<sup>96</sup>弗蘭克·富里迪，《恐懼》，方軍、張淑文、呂靜蓮譯，南京市：江蘇人民，2004，頁69。

<sup>97</sup>巴特勒；麥克馬納斯，《生活中的心理學》，韓邦凱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9。

<sup>98</sup>巴特勒；麥克馬納斯，《生活中的心理學》，韓邦凱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9，頁114。

折磨的台日混血兒之一。

内臺人の間に出来た児である事は、少なからず彼の自尊心を傷付けた。

99

他是內台人結合才會生下來的東西，這多少傷了他的自尊心。<sup>100</sup>

### 三、單親無父男童心理

縮小自本研究的角色中所涉及的另一個議題，正是單親家庭下孩童的心理。根據以下 1986 年埃里克森「人類發展的階段理論」(The Developmental Stages of Erik Erikson)的發展論，說明人的一生之各個階段性，都隨著環境的變化與接觸中，有著需要應付的社會心理危機，與人的互動關係也是門重要的課題。尤其父母對孩子的影響更是重要，不論是初期的黃金時間點，或是未來的陪伴時間來看，父母不僅是孩子的創造者也是成長中無時無刻陪伴的重要角色。因此，兒童若在出生至成長初期這段發展的心智建立之階段，少了父母的陪伴下，是否就會失去了埃里克森所列出的有利結果呢。

表二、人類發展的階段理論 The Developmental Stages of Erik Erikson

階段	心理社會危機	主要活動	有意義的關係	有利的結果
1 歲	信任/不信任	持續、穩定的關愛	主要的護理者	信任、樂觀
二至三歲	自主性/疑慮	獨立於父母	父母	獨立、自尊
四至五歲	主動性/罪疚感	對環境的探索	基本家庭成員	自我定向、目標
六歲到青春前期	勤勉/自卑	知識的吸取	家庭、鄰居、學校	勝利感/成就感
青春前期	同一性/角色混淆	突出的才能、人格	同伴、內集團、外集團	完整的自我形象
成年早期	親密/孤獨	深刻、長久關係	朋友、情人、競爭、合作	體驗愛情、責任的能力
成年中期	繁殖/自我專注	為社會生產和創造	勞動分工、分擔家務	關注家庭、社會和後代
成年後期	自我整合/失望	生活的回顧和評估	人類、大家庭	滿足感、對死亡的接受

〈資料來源：《生活中的心理學》<sup>101</sup>，筆者再做整理。〉

單親家庭之議題太過廣泛，研究資料也非常大量與普及化，本研究裡將縮小至因應扣緊研究人物太郎的狀況，在此將提出重點放在「失去父親的單親男孩」上。中國成長網裡出現的一則專題探討<sup>102</sup>與兩個學報<sup>103</sup>文中有著異曲同工之妙之處，皆與本研究的無父親之單親男童息息相關。

<sup>99</sup>黃氏寶桃，〈感情〉，《台灣文藝》，第三卷第四五期，1936年4月20日，頁22，收錄於《台灣新文學雜誌叢刊》，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81年復刻版，第十冊。

<sup>100</sup>葉石濤，《葉石濤全集22，翻譯卷二》，高雄市：高市文化局；台南市：國立台灣文學館，2006-，頁181。

<sup>101</sup>巴特勒；麥克馬納斯，《生活中的心理學》，韓邦凱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9，頁79。

<sup>102</sup>楊慧，〈父親缺失對兒童心理的影響〉，2008年7月16日。

2013年4月1日，取自中國成長網

<http://www.hljnews.cn/zt/system/2008/07/16/010184232.shtml>

筆者選擇引用新聞報導裡，作者楊慧(2008)所發表的專欄內容來說明父親缺失對兒童心理的影響其實是很大的。即使楊慧(2008)言「父親缺失的影響與特定的社會文化環境密切相關，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價值體系中，父親缺失影響的角度和程度可能存在差異。」，還是整理出對於父親給男童的影響之論述：

在家庭中，父親和母親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對兒童心理的發展發揮著不同的作用。Hetherington 等研究認為，父親對於一個孩子的發展，特別是對於其自我認同具有重要的作用：父親幫助孩子從心理上與母親分離，教他們控制自己的衝動，學習各種規範和規則，同時他還能幫助母親避免過度情緒化地處理她和孩子之間的關係。而且關於 Wallerstein 指出，對於男孩來說，隨著年齡的增長，兒童對父親影響的需求也不斷增強。因此，父親缺失使兒童生活的家庭環境不完整，兒童缺少來自父親的影響，便有可能造成其心理發展的缺陷。<sup>104</sup>

因此可以見得，父親不僅僅是幫助男童不再依戀母親的中間關係人，也是給予日漸長大的男童輔佐的力量。父親作為男性行為的啟蒙教育者，透過與母親的教育方式結合，調節男童心理健全的發展與走向。這與楊慧(2008)以下所提及的男童於成長中，若缺失父親是會影響兒童在性別角色的發展，因為父親在男童學習男性特徵的建構上扮演極關鍵的作用。

佛洛伊德將父親描述為兒童眼中的保護者、教育者和自己未來理想化的形象，兒童的認同作用(指個體潛意識地向別人模仿的過程)會使兒童將父親作為榜樣進行模仿，使自己的行為越來越像父親。社會學習理論強調兒童性別角色的獲得是通過同性別父母的榜樣強化而形成的。父親為男孩提供了一種男性的基本行為模式，使得男孩子往往把父親看作是自己未來發展的模型而去模仿父親。可以說父親的很多行為品質和習慣都會在兒子的身上體現出來。<sup>105</sup>

如同楊慧(2008)所言，男童會模仿父親的行為，並且從中學習行為模式，漸漸建立不懼怕的心態去挑戰新事物，所以若少了父親作為模仿的男童，就如同研究顯示下缺少父親撫養的男孩相較其他男孩更缺乏男子氣概<sup>106</sup>，一個男孩沒有父親，就沒有了方向，就沒有人帶他走過從兒童到成人的陌生地帶。性別角色定位上，完整家庭的男孩與父親缺失的男孩於男子氣的表現上的確會有所差異。趙海靈(2010)談論〈父親缺失與兒童心理發展的關係〉裡，就提及父親對於兒童的社

---

<sup>103</sup>趙海靈，〈父親缺失與兒童心理發展的關係〉，濮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3卷1期，2010年2月，頁128-132。  
陳小萍；張海鍾，〈父親缺失研究評述〉，中華女子學院學報，20卷6期，2008年12月，頁99-103。

<sup>104</sup>楊慧，〈父親缺失對兒童心理的影響〉，2008年7月16日。

2013年4月1日，取自中國成長網

<http://www.hljnews.cn/zt/system/2008/07/16/010184232.shtml>

<sup>105</sup>楊慧，〈父親缺失對兒童心理的影響〉，2008年7月16日。

2013年4月1日，取自中國成長網

<http://www.hljnews.cn/zt/system/2008/07/16/010184232.shtml>

<sup>106</sup>陳小萍；張海鍾，〈父親缺失研究評述〉，中華女子學院學報，20卷6期，2008年12月，頁100。

會化發展有著巨大的影響力，比起母親與性別社會化過程中更為重要<sup>107</sup>。對此，父親除了是男童的學習樣版之外，於兒童心理發展與父親的關係研究中，父親也必須作為玩伴的角色。父子的相處模式下，正有著間接去吸引男童接觸世界引發探索與好奇心的功能。相較於男童對於母親的依戀關係裡如同緩和劑一般的作用，男童與父親間的關係則是幫助男童心理與能力上的催促劑<sup>108</sup>。家庭不完整易導致孩子在社會化過程中出現不適應與失調的狀況，在沒有父親的陪伴下，本應雙邊管道輸入的價值觀念與行為習慣變成單方面母親的給予，男童的心理理所當然都會產生較不健全的現象，嚴重的話如同〈感情〉裡太郎的母親要再嫁的情形下，太郎未來有位繼父的情況裡，研究顯示中竟是導致兒童犯罪行為最高的狀態<sup>109</sup>。

透過以上所述，當重要的連結人物父親不在身邊的成長過程之下，只能從母親一方去索取關懷的孩童心理而言，缺乏父親對於男童的影響力可以明確理解。論述裡面提及的單親家庭中男孩缺失父親的狀態來看本研究的太郎，有著不謀而合之處，包含逐漸長大後對父親的崇拜與渴望，以及較於陰柔的性格(缺乏男子氣)。陳小普(2008)於期刊中整理出以下學者們所解析的單親兒童之性格特質與心理現象描述，也與本研究的太郎有著相似之處。

**張志群(2004)的調查發現，單親家庭兒童尤其是離棄家庭兒統比正常家庭兒童有更多的抑鬱症狀，且 45.51%有不同程度的自殺傾向；何宏靈(2006)的調查也指出，單親家庭兒童具有高精神質(孤僻、攻擊性強)、偏內向、情緒不穩定(焦慮、緊張、易激惹)、心理發育不成熟的個性特點。<sup>110</sup>**

陳小普(2008)表示單親家庭兒童在自我意識發展上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為三方面：自我評價偏低、自我體驗消極、自我控制力無力<sup>111</sup>。從以上研究的這些特徵好像都能呼應到太郎的特質裡。

……(略)……太郎を實際以上にいぢけた子供に見せた。<sup>112</sup>

……(略)……太郎顯得比實際上更畏縮的小孩。<sup>113</sup>

<sup>107</sup>趙海靈，〈父親缺失與兒童心理發展的關係〉，漢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3卷1期，2010年2月，頁128。

<sup>108</sup>楊慧：「父親角色理論認為，父親在兒童成長中最基本的角色是作為一個玩伴，父親的主要撫養行為是與兒童遊戲。兒童與父親的遊戲使兒童逐漸擺脫對母親的依戀，誘發兒童對外部世界的好奇；而成功的探索經驗又會使他們獲得信心，面對陌生環境時表現出勇氣；研究證明父親與兒童遊戲的作用不能被母親行為所代替；對父親與兒童關係的研究也發現父母在與兒童的關係上存在著差異，Paquette 提出了父親和兒童之間啟動關係(father-child activation relationship)來描述父親和兒童之間的關係，進而區別母親與兒童的依戀關係(mother-child attachment relationship)，認為父親和兒童的啟動關係是兒童積極能力發展的基礎。Lamb 等認為兒童與母親的關係主要建立在母親的撫養和敏感之上，兒童與父親的關係更多建立在活躍的遊戲中。兒童在遇到痛苦時更多地到母親那兒去尋求安慰，而想玩時，則更多地想到父親。父親缺失就會使兒童缺少與父親遊戲的經驗，缺少與父親之間的啟動關係的作用，進而影響兒童心理的發展。」楊慧，〈父親缺失對兒童心理的影響〉，2008年7月16日。

2013年4月1日，取自中國成長網

<http://www.hljnews.cn/zt/system/2008/07/16/010184232.shtml>

<sup>109</sup>楊慧：「Cynthia 等對少年犯的研究發現，在父親缺失家庭中兒童面臨高犯罪的風險，在存在繼父繼母的家庭中，特別是母親-繼父的家庭中兒童的犯罪率最高，並且父親的作用不能被繼父代替。它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父親在兒童健康成長中的重要作用。」

楊慧，〈父親缺失對兒童心理的影響〉，2008年7月16日。

2013年4月1日，取自中國成長網

<http://www.hljnews.cn/zt/system/2008/07/16/010184232.shtml>

<sup>110</sup>陳小普，〈單親家庭兒童自我意識存在的問題探析〉，教育探索，2008卷9期，頁128。

<sup>111</sup>陳小普，〈單親家庭兒童自我意識存在的問題探析〉，教育探索，2008卷9期，頁128-129。

<sup>112</sup>黃氏寶桃，〈感情〉，《台灣文藝》，第三卷第四五期，1936年4月20日，頁22，收錄於《台灣新文學雜誌叢刊》，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81年復刻版，第十冊。

……(略)……何時でも偶の方に一人ぼっちで置かれた。<sup>114</sup>

……(略)……時常獨自一個人在某個角落躲著。<sup>115</sup>

對於人物太郎的背景，從社會日治時期的背景到台日混血兒的身分，再到最後的單親無父的孩童上，可以了解到各個癥結點都是牽引太郎心理糾葛的來源。這樣的角色不僅有多異性，也可以說是有著豐富的心理癥結、情緒複雜多轉的人物。融合這樣多揣的成長因子的人物居然是日據時期普遍小人物內心所會有的辛酸心情。筆者將透過分析有著以上背景的太郎，感受黃寶桃筆下人物的意義與分析後延伸滲透的感染力。

####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

本篇論文研究中心定位於〈感情〉主角太郎，針對文本內容敘述詳細解析人物的內心世界。雖然聚焦於太郎但會先從母親對他的影響下去作開端，再進入推論主角的個人心理癥結部分作探索與整理後，再推展至這些心理症狀裡人格結構是如何運作轉折，心理的防衛機制是怎樣的啟動，最後統整出人物太郎之複雜心理於台灣日治時期背景下所能對照的重要性與普遍性。基本上，本篇研究只會以參照佛洛伊德部分可應用至本研究之相關的精神分析理論作為引用範圍，對照可映照角色太郎之處，包括從分析母親為開端影響太郎開始，由佛洛伊德的「戀母情結」說起，到太郎擁有的「抑鬱情結」、「戀物」與「自愛」現象，最後的「人格結構：本我、自我、超我」與「自我防衛機制」來細說解構角色心理，以上，皆為本研究所涉及的相關理論。

作為精神分析的始祖佛洛伊德屹立不搖的重要性想必延燒至現今社會都還看得到他極具影響力的痕跡，如索姆斯雜誌發上發表一篇文章〈佛洛伊德重出江湖〉<sup>116</sup>所言下之意顯示出佛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指標性，即作為 20 世紀上半葉，佛洛伊德的觀點是解釋人類心智運作最主要的理論。作為精神分析學說的創始人佛洛伊德，至今日仍為這個世界具有影響力。當代的文學、哲學、科學裡，他的理論無不滲透。正因為如此筆者想藉由佛洛伊德的理論，解析同屬 20 世紀上半葉時代，殖民地文學〈感情〉中角色的心智運作。佛洛伊德創立精神分析理論的時期，台灣正處於日治時期，黃寶桃與佛洛伊德可能屬於同一時代的人物。筆者選用佛洛伊德心理學作為分析，也是認為佛洛伊德所推展的心理學理論與本研究小說背景的時代點是一致，且同時代背景下的心理學理論與文學創作，更能不突兀地結合與對應。即使，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對應至現代的想法來看，會被淪為太過偏激與爭議性的思維。依照索姆斯的文章所指，它曾經被懷疑與甚至被認為是無望的古董觀念。但是其實現今，卻開始再次得到重視與沿用，精神分析被稱為「依舊是最一致、最令人滿意的心智理論」。透過佛洛伊德理論此模板，神經科學家也正為佛洛伊德的一些理論找尋證據，並將他描述的心智過程找出機制<sup>117</sup>。筆者認為，以現代許多思考下的確會可能與佛洛伊

<sup>113</sup> 葉石濤，《葉石濤全集 22，翻譯卷二》，高雄市：高市文化局；台南市：國立台灣文學館，2006-，頁 181。

<sup>114</sup> 黃氏寶桃，〈感情〉，《台灣文藝》，第三卷第四五期，1936 年 4 月 20 日，頁 22，收錄於《台灣新文學雜誌叢刊》，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81 年復刻版，第十冊。

<sup>115</sup> 葉石濤，《葉石濤全集 22，翻譯卷二》，高雄市：高市文化局；台南市：國立台灣文學館，2006-，頁 181。

<sup>116</sup> 索姆斯，〈佛洛伊德重出江湖〉，黃榮棋譯，《科學人》，2004 年第 28 期 6 月號。

<sup>117</sup> 〈佛洛伊德重出江湖〉

越來越多科學家，想將神經科學與精神病學整合成統一的理論。

撰文／索姆斯 (Mark Solms) 翻譯／黃榮棋

20 世紀上半葉，佛洛伊德的觀點是解釋人類心智運作最主要的理論。佛洛伊德的基本主張指出：人類的動機大都隱藏在無意識的心智，而且還備受壓抑，而無法進入意識。執行心智的機器（自我，ego），會排斥

德理論之思維不一致的地方，但對於分析同背景時代的產物卻應該存有它的研究性質。

此外，回歸本研究論述的小說〈感情〉裡的人物所營造出的無法解釋清楚的矛盾感傷，這種內心交織著受傷的情緒，如此壓抑的角色人物，有著無意識深處不為人知的創傷來源。佛洛伊德透過人類症狀來觀察病源，對於那些病態，他根據精神分析之方法治療找出病人在過去的傷疤。佛洛伊德所認為人格精神下分成自我、本我、超我這三個部分的失衡更是導致心理症狀出現的原因，人類也會透過防衛自己的方式產生許多調適的處裡。

因此，筆者認為本研究既然需要釐清小說中之人物為何矛盾的情緒，發現他不同於現代的我們所能接觸理解的心理狀態，這樣潛意識下的心理探究，引用對於人類心靈上的人格意識分析與解構無意識或潛意識下不明因素的反應的始祖心理學家佛洛伊德，筆者認為最能妥善表現本研究小說裡這複雜心理動線的故事人物，在這樣的分析過程後人物的內心世界才能較被窺視。如同作家郭良所言：「因此，理解文學藝術的關鍵，仍在於理解人的潛意識。<sup>118</sup>」，寫出精神分析影響著文學藝術區塊的原因。

第一章緒論裡，上述介紹了包含釐清研究動機與目的，以及關於作者與作品的先行研究，最後是相關背景的論述(殖民地台灣、日治時期台日混血兒、無父的單親兒童男孩)；第二章筆者將開始進入文本分析，母親對於太郎的重要性為前提(佛洛伊德之戀母情結為依據)，剖析母親的人格與太郎的互動模式，影射出對太郎的影響，視為分析太郎的開端；第三章為重心所在，先介紹

---

任何可能激起不符合自身有關文明人所應有行為的無意識驅力(本我，id)。這種壓抑是必要的，因為驅力會以脫韁的熱情、幼稚的幻想，以及性慾與攻擊慾的方式表現出來。

佛洛伊德在1939年去世以前，一直都認為精神病源自壓抑的失敗。恐懼症、恐慌症以及強迫症都是因為潛藏的驅力侵入意識行為造成的結果。因此心理療法的目的，就是希望從神經性的症狀追溯出無意識源頭，讓這些源頭接受成熟理性的批判，藉此消弭其強迫性力量。

1950年代開始，心智與腦的研究日趨成熟，讓專家了解到，佛洛伊德提供驗證自己理論的證據相當薄弱。佛洛伊德最主要的研究方法，不是透過控制下的實驗，而只是單純對臨床病患的觀察，其中還交雜著理論推斷。藥物治療有了進展，而精神病的生物研究取向漸漸超越了精神分析。如果佛洛伊德還活著，他還可能樂見這種轉變。在他的年代，佛洛伊德是位備受推崇的神經科學家，他常會說像這樣的話：「如果我們已經能利用生理學及化學的名詞來取代心理學名詞，那麼我們在敘述上的缺陷可能就會消失了。」但佛洛伊德卻沒有這種知識與科技，可得知正常人或神經機能障礙人格患者的大腦結構。

到了1980年代，甚至在某些精神分析圈子，自我與本我的觀念也被認為是無望的古董觀念。佛洛伊德終於走入歷史。在新心理學的時代，比較合乎時代潮流的想法是，受抑壓的人們之所以不幸，並不是嬰兒時期發生了不愉快的經驗，而是他們腦部的化學物質不平衡。然而，精神病藥物學並沒有提出另一個宏觀理論，來解釋人格、情緒以及動機等，這些「人之所以為人」的概念。缺乏這樣的理論模式，神經科學家便專注於狹隘的研究工作，而不再理會大格局。

現在，這樣的理論又成了焦點，而令人驚訝的是，這個理論與一個世紀前佛洛伊德所勾勒出來的，並沒有太大的不同。現在談共識雖然還嫌太早，但越來越多不同領域的神經科學家，卻都得到與2000年諾貝爾生醫獎得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坎德爾(Eric R. Kandel)同樣的結論：精神分析「依舊是最一致、最令人滿意的心智理論」。

佛洛伊德重出江湖了，而且不只是理論而已。現在世界上幾乎每一個大城市，都有跨領域的研究團隊，想要整合曾經分裂、且還經常敵對的神經科學與精神分析。這些組織後來聚集了起來，成立了國際神經精神分析協會，籌組一年一度的集會，並出版了一份成功的《神經精神分析》期刊。佛洛伊德理論的再度受到重視，可由該期刊的編輯顧問得到見證，裡面盡是當代行為神經科學界的名人，包括達馬吉歐(Antonio R. Damasio)、坎德爾、拉度(Joseph E. LeDoux)、利貝特(Benjamin Libet)、潘克沙普(Jaak Panksepp)、拉瑪錢德朗(Vilayanur S. Ramachandran)、夏克特(Daniel L. Schacter)以及辛格爾(Wolf Singer)。這些研究人員正在打造坎德爾所說的「精神病學的新知識架構」。在這個架構之下，佛洛伊德大格局的心智結構，似乎註定要扮演類似達爾文演化論對分子遺傳學的角色。佛洛伊德理論可以做為模板，使新發現的各項細節安置得有條不紊。同時，神經科學家也正為佛洛伊德的一些理論找尋證據，並將他描述的心智過程找出機制。……

2013年3月6日，取自科學人雜誌

<http://sa.ylib.com/MagCont.aspx?Unit=featurearticles&id=465>

<sup>118</sup>郭良，《佛洛伊德》，香港：中華，1996，頁145。

佛洛伊德之「人格結構」與「防衛機制」，以便解析時較易理解。進入分析主角太郎，並且找出心理症狀（「雙重依戀」、「矛盾與抑鬱」、「自愛」（self-love）、「戀物」（fetishism）），發現複雜難解之心理情結，最後將會細說論述所分析的心理症狀是如何於心中運作，對照佛洛伊德提及下的「人格結構」之中自我、本我與超我的拉扯因素，了解心理衝擊糾葛後「防衛機制」如何保護自身，展現舒緩心理的方式；第四章結論，筆者會再次強調研究黃寶桃〈感情〉裡「太郎」此人物的心理分析之意義與富有研究價值之重要性，並促使未來研究發展上其餘的可能性。



## 第二章 母親與太郎的關係

用弗洛伊德的話說，他樂觀、自信的品格與母親的影響不無關係。因為，他是母親所生的第一胎，備受母親的關注，所以，始終有一種「征服者」的感覺。而由此獲得的自信往往會導致真正的成功。<sup>119</sup>

由上述《佛洛伊德》一書中所透露的佛洛伊德談論他與母親，表達出佛洛伊德對於母親與小孩關係的看法，顯示出母親給孩子所帶來的影響力有多深。正好，本研究裡頭需要先從了解與分析人物息息相關的角色-母親開始論述，她是除了太郎之外，唯一在小說內出現的另一位人物。筆者認為在單親家庭下，依靠著母親長大的太郎，必定要從他與母親的感情中找出一些蛛絲馬跡。如同佛洛伊德所言之意，筆者認為太郎的啟蒙者即是母親。由佛洛伊德非常重要的理論-「伊底帕斯情結<sup>120</sup>」下去了解或許就可以知道為何筆者分析此小說時，「母親」對於太郎的感情世界的重要性是必須要強調的。

心理分析師申荷永《心理分析:理解與體驗》<sup>121</sup>一書中論述佛洛伊德與精神分析裡，表示伊底帕斯情結(戀母情結)於佛洛伊德理論佔有很大的重要性。

……(略)……佛洛伊德自我分析過程中最重要的發現，便是「戀母情結」—每個小男孩，都會暗戀自己的母親；相對地，每個小女孩也都會暗戀自己的父親，而有著「戀父情結」。在這種「暗戀」的情緒中，含有潛意識的兒童性慾的成分。神話傳說中的伊底帕斯正是佛洛伊德所描述的潛意識心理現象的原型，因此，佛洛伊德的「戀母情結」也被稱為「伊底帕斯情結」。

「伊底帕斯情結」是佛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基點，也是他的親身體驗。……(略)……在整個精神分析的過程中，「戀母情結」及其所包含的意義，始終佔有最重要的地位。<sup>122</sup>……(略)……

因此，本研究所要探究的男孩太郎與唯一生活在一起的母親之間的聯繫，以佛洛伊德的思維裡的說法來看，有著本身就密不可分的本質。在《佛洛伊德與女性》<sup>123</sup>書裡也闡述佛洛伊德論述母親與兒子關係帶有的意義：「只有母親與兒子的關係，能給母親全然的滿足，因為在所有的人類的關係中，這是最完美的、最不具兩歧矛盾性(ambivalence)的。<sup>124</sup>」，照佛洛伊德的想法，母子關係應當不具有又愛又恨的複雜情愫或碰撞矛盾，太郎對於母親而言應該是滿足的情感。筆者也非常肯定在小說內，母親對於太郎感情的意義與影響力，所以才需要從母親開始分析帶進太郎的內心世界。但套用到〈感情〉一文中所勾勒的故事情節，最終以與母親之間的親情衝突的無奈感傷畫下句點，佛洛伊德所謂母子間的強烈感情的基底下，太郎與他母親之間究竟產生多少糾葛矛盾，導致後來感情的曲折變化。

<sup>119</sup> 郭良，《佛洛伊德》，香港：中華，1996，頁24。

<sup>120</sup> 佛洛伊德：「這種關係一度曾同時存在，直到對母親的性願望變得更加強烈，而把父親看作是他們（母子之間）的障礙；這就引起了「伊底帕斯情結」(oedipus complex)。於是以父親認同的作用，就帶上一種敵對的色彩，並且變成了驅逐父親以取代他對母親的位置。此後和父親的關係，就有了心理上的矛盾……」佛洛伊德，《佛洛伊德之日常生活分析》，楊韶剛譯，台北：百善，2004，頁57。

<sup>121</sup> 申荷永，《心理分析:理解與體驗》，北京市：生活·讀書·新知三聯，2004。

<sup>122</sup> 申荷永，《心理分析:理解與體驗》，北京市：生活·讀書·新知三聯，2004，頁54-55。

<sup>123</sup> 保羅-羅宏·亞舜，《佛洛伊德與女性》，楊明敏譯，臺北市：遠流，2002。

<sup>124</sup> 保羅-羅宏·亞舜，《佛洛伊德與女性》，楊明敏譯，臺北市：遠流，2002，頁68。

母と子の異った感情がちぐはぐに交錯して居るのだった。<sup>125</sup>

母親與孩子不同感情的齟齬交錯在一起。<sup>126</sup>

筆者認為文本之所以能細細論述，就在於母親與太郎之間的愛並非如此純粹與簡單。太多其他因素附著於他們之中。雙方的感情為何擦出無可奈何，正是筆者探討太郎心理建構的理由。母親帶給太郎的影響其實是不容小覷的，如前所述之佛洛伊德「伊底帕斯情結」理論來源，或許就可以大膽的斷言太郎感情源自於母親。母親角色究竟在文本中如何呈現，她對於太郎而言又是怎樣的的存在，影響他的思維與認知而且間接締造他的人格模式。承接本研究重點，母親被筆者視為必要釐清的關鍵元素。

先行研究裡介紹的呂明純學者(2003)於〈潛抑與放逐——黃寶桃作品研究〉論文裡，提及到〈感情〉一文之研究，是針對分析母親為中心來論述黃寶桃對於女性情感的披露與在社會下寫實的弱勢女性地位。筆者將引用呂明純所分析的母親互相對應，納入此章探討。不同於呂明純學者(2003)〈潛抑與放逐——黃寶桃作品研究〉的是，筆者的重心還是在小男孩身上，藉由母親的角色來探討對男孩心理影響。所以了解母親與主角太郎之間的情感關係，是筆者此章所議論的目的，並非專研於單純分析母親，而是以她作為了解太郎的媒介，在此再次澄清。

### 第一節 為愛犧牲自己的母親

《佛洛伊德的「論自戀：一篇導論」》書中提及：「……(略)……自我原欲(ego-libido)與客體原欲之間的對比(antithesis)。其中一方愈被使用，另一方就愈變得匱乏。客體原欲有能力發展的最高階段，可以從戀愛(being in love)的狀態一覽無遺，個體這時似乎寧可選擇客體灌注，不惜犧牲自己個人。<sup>127</sup>……(略)……」在浪漫的愛情中，客體被大量的灌注，自我原慾因此減少，從文本中太郎母親這個角色，看待她的愛情，不難發現她不斷施捨的自我是為了滿足那客體的需求。一位女性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從台灣傳統的觀念裡頭看待也好，或是日治時期日本的風俗習慣也罷，女性地位總是位於低下的位置。社會文明的風氣，包含了台灣與日本的人種優劣，細分下來更包含男性與女性的優劣。如同張愛玲說道的：「說也奇怪，我們想像中的超人永遠是個男人。為什麼呢？大約是因為超人的文明是較我們的文明更進一步的造就，而我們的文明是男子的文明。<sup>128</sup>」，表示女性在父系環境中的立足點與發展，容易形成趨向對男性較低姿態與低一等的狀況，間接也影響女性容易長期處於無形的打壓下有著莫名的服從與溫順的性格，並且不論佇立於外界或內在本身，那心態皆是屬於弱勢且渺小。太郎的母親作為一名女性天生就少了被尊重感，再加上與內地人婚後即便生下一子，卻遭遇被拋棄而獨立扶養孩子長大的命運。在世俗的眼光下、外人街坊鄰居的眼裡，她淪為一位既沒有丈夫卻有了孩子的女性。這樣的經歷必會造成她身心極大的壓力，遲遲不願再婚的母親或許其實夾雜著因愛人離棄自己後會有著怕再次受傷的心理而不敢再婚的可能，於是等待時間治療直到太郎十七歲時她才下定決心接受婚事。文章中的一小段就能感受傳統女性的她，面對世間社會中無形裡既有的評判與被愛人背叛的痛心，

<sup>125</sup>黃氏寶桃，〈感情〉，《台灣文藝》，第三卷第四五期，1936年4月20日，頁26，收錄於《台灣新文學雜誌叢刊》，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81年復刻版，第十冊。

<sup>126</sup>葉石濤，《葉石濤全集22，翻譯卷二》，高雄市：高市文化局；台南市：國立台灣文學館，2006-，頁185。

<sup>127</sup>Joseph Sandler；Ethel Spector Person；Peter Fonagy，《佛洛伊德的「論自戀：一篇導論」》，李俊毅譯，臺北市：五南，2009，頁6。

<sup>128</sup>張愛玲，〈談女人〉，《流言》，臺北市：皇冠，1981，頁84。

一生過著孤苦無依的生活。

太郎が十七になるまで、内地人を一度夫に持って子供まで生み、その上捨てられたと云ふ世間に對するはづかしさから、一ツは内臺人の間に出来た児と云ふ太郎を育てる一心から、ずっと獨身を通して来た母は、益々孤獨感に耐えられなくなって叔父の進めのま、に結婚話を承知したのだった。<sup>129</sup>

直到太郎長到十七歲以前，為了一度嫁給內地人養下孩子而且被拋棄的對世間的羞愧，以及為了一心一意養育內台人之間養下的孩子太郎，一直過著單身生活的母親，越來越不耐孤獨感，答應了叔叔勸告的婚事。<sup>130</sup>

呂明純學者(2003)認為解釋母親持續單身的上段文字裡「看得出作者對這個母親含辛茹苦、富有責任感的強調<sup>131</sup>」。對於細心養大自己懷胎十月生下的骨肉，對於孩子爸爸的離去，面對愛情的態度還存有著期盼，選擇為所愛的男子繼續等待著，犧牲自己的時間與奉獻了青春年華，極其專一地過了十七年孤單的歲月，即使對拋棄她的內地人丈夫有所怨言卻不曾對孩子抱怨過。起初，甚至還總癡癡地等著丈夫能歸來，不斷回憶過去，深陷在情傷中，望著與愛人所生下的孩子並講述著那些過去印象中的美好，那種期盼奇蹟與痴守愛情的態度，反而更凸顯出一個女性失去依靠的寂寥。

太郎の母は彼が極く幼い時、寝付の悪い彼に床の中でやさしく未だ見ぬ父の國の話をよく聞かせて呉れた。タタミと云ふ不思議なものや、煉瓦も石も用ひない、木ばかりで造つてある、お伽話の中にでも出て来る様な小さな家の話だの、水が綺麗に澄んで居て、美しい花が澤山咲いて居る田舎の話を、感傷的な口調で話して呉れた。<sup>132</sup>

太郎的母親，在他幼年時，在床上，給難以入睡的他常常溫柔的講尚未看到的父祖之國的故事。她用感傷的話談到榻榻米這奇異的東西，不用磚瓦，只用木材蓋造的，只有在童話故事裡才出現的小小房屋以及溪水清澈、盛開著美麗的鄉村的故事。<sup>133</sup>

だから太郎の小さい時よく内地の話をして呉れたのは、皆父が話した美しい内地の受うり話だった。父の歸りを一生懸命待つて居たその頃の母は、身體いっぱい父に對する愛情を持って居たのだ。<sup>134</sup>

<sup>129</sup> 黃氏寶桃，〈感情〉，《台灣文藝》，第三卷第四五期，1936年4月20日，頁24，收錄於《台灣新文學雜誌叢刊》，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81年復刻版，第十冊。

<sup>130</sup> 葉石濤，《葉石濤全集22，翻譯卷二》，高雄市：高市文化局；台南市：國立台灣文學館，2006-，頁183。

<sup>131</sup> 呂明純，〈潛抑與放逐—黃寶桃作品研究〉，范銘如主編，《挑撥新趨勢：第二屆中國女性書寫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市：台灣學生書局，2003年2月，頁219。

<sup>132</sup> 黃氏寶桃，〈感情〉，《台灣文藝》，第三卷第四五期，1936年4月20日，頁23，收錄於《台灣新文學雜誌叢刊》，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81年復刻版，第十冊。

<sup>133</sup> 葉石濤，《葉石濤全集22，翻譯卷二》，高雄市：高市文化局；台南市：國立台灣文學館，2006-，頁182。

<sup>134</sup> 黃氏寶桃，〈感情〉，《台灣文藝》，第三卷第四五期，1936年4月20日，頁23，收錄於《台灣新文學雜誌叢刊》，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81年復刻版，第十冊。

因此，太郎幼少時母親常給他講內地的故事，其實是從父親所聽來的美麗內地的故事一字不變地重複一遍罷了。一心一意地等待父親回來的那時候的母親，整個身心充滿著對父親的愛。<sup>135</sup>

即使到後來即將再婚的她，其實心底還是放不下對內地人丈夫的牽掛，另一方面來看，我們或許可以說是對他的恨意並未消滅，那道傷痛還是存在於內心，已然成為揮之不去的疤痕。

然し子供が出来るとすぐ自分を見捨て故國に歸った不人情な、假令どんな事情がその間にあったとしても、子供まで出来た自分の元に歸って来なかった内地人の事は、その人に幾分かの感情が残って居るとは云へ、今となって内地の事を思ひ出すのは、心の古傷を再び痛める事であった。

<sup>136</sup>

可是剛懷了孩子就拋棄她而返回故鄉的沒人情味的人，縱令有些事情牽扯在內，有了孩子也不回到自己懷抱的內地人，對他即令還存有幾分感情。但如今想起內地，只是使舊傷痕加深痛苦罷了。<sup>137</sup>

以上，皆可以感受到太郎的母親在愛情中陷入的感情極深，一直不斷的犧牲自我、委曲求全的態度，包括忍受孤獨且獨立扶養與愛人生下的孩子。對於新任丈夫的態度也是表現出以夫為主的觀念。在服飾選擇部分，為丈夫而有所改變，一開始因應內地人丈夫的喜好穿上其實不適合自己的衣服，之後又因新任本島人丈夫的習慣而再次改變自己。

母は平常は内地人の父の趣味に合ふ様な、年に似ないじみな服を着けて居るのに、今日に限って派手な美しい長衫を、ぴったり身體に合はせて着て居た。<sup>138</sup>

母親平常都穿著符合內地人父親嗜好的不合年齡的質樸的衣衫，不過今天卻穿著華麗而合身的長衫（旗袍）。<sup>139</sup>

穿著旗袍的母親也顯示出再婚的意念，再婚對於她而言，到底有怎樣的意義存在？長期壓抑自己的空虛寂寞，被拋棄的陰影造成她無法自信地進入下一段幸福戀情，那渴望再次被愛與能依賴的心境，也因為顧及小孩都需要忍耐。但對於她而言，若要跳脫出過去不堪的婚姻關係，化解自己內在空虛寂寞的解藥，並重生快樂幸福的慾望，是需要一位新的陪伴對象。考慮長大後將獨立的太郎與未來年邁的自己打算的話，有個照應是必要的。依靠的肩膀對於一個女人而言是重要的，女人需要被滋潤，各種的愛裡，男女之情或許是讓自己擁有自信的要素之一。另一方面，獨自扶養兒子長大的母親，是極為不簡單的。或許一直受到外界眼光的影響之下造成她無法改嫁，

---

誌叢刊》，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81年復刻版，第十冊。

<sup>135</sup> 葉石濤，《葉石濤全集 22，翻譯卷二》，高雄市：高市文化局；台南市：國立台灣文學館，2006-，頁 182。

<sup>136</sup> 黃氏寶桃，〈感情〉，《台灣文藝》，第三卷第四五期，1936年4月20日，頁 25-26，收錄於《台灣新文學雜誌叢刊》，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81年復刻版，第十冊。

<sup>137</sup> 葉石濤，《葉石濤全集 22，翻譯卷二》，高雄市：高市文化局；台南市：國立台灣文學館，2006-，頁 185。

<sup>138</sup> 黃氏寶桃，〈感情〉，《台灣文藝》，第三卷第四五期，1936年4月20日，頁 23，收錄於《台灣新文學雜誌叢刊》，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81年復刻版，第十冊。

<sup>139</sup> 葉石濤，《葉石濤全集 22，翻譯卷二》，高雄市：高市文化局；台南市：國立台灣文學館，2006-，頁 182。

也或許是為了等待成熟後的太郎較能理解她改嫁。不管如何，作為一位母親來看孩子，即使歷經多年生活裡沒有父親的太郎，即使瞭解太郎對內地父親角色的強烈依賴，心底還是會為孩子留心，欲找到一位能替補空白的父親位置，以給太郎更健全的家庭。一位能接受自己的過去與兒子並且接受照顧她們母子二人的男人。總是孩子為主，自己為輔的愛子心情，生怕兒子無法接受新父親，不單考慮自己的慈母，有著另一道顧慮的防線……

「それでね、わたしは彼の人と本當に結婚する氣になったんですが。お前には悪いかも分らないと、考へたんですが、向ふでお前も一緒に引取って世話をすると云ふし、あたしもね……お前は反對ぢやないでせうね」<sup>140</sup>

「所以我真的決心跟那人結婚了。也許對你不好，不過對方說要把你一起帶過去照顧，所以我就……你不會反對吧？」<sup>141</sup>

我們可以瞭解，進入婚姻的女人其肩頭上的負擔不再是只有奉獻丈夫，更多了一位需要留心愛護的孩子。再婚受到兒子的認可對她而言是天大的喜悅，除了為了遺忘過去的傷口，再加上再婚對象為本島人的關係，希望太郎的內地服飾可以換下的要求，卻與孩子的內心世界產生衝突。在此刻，身為母親的角色與想得到幸福的慾念需要作取捨，內心美好的期望再次受到干擾，坎坷的選擇道路上，太郎的母親始終在愛情裡無法成全自己與掌握幸福的女人反倒成為犧牲品。然而，呂明純學者(2003)研究筆下則是由作為一位「台灣女性」的母親身分為焦點以展現文中她弱勢立場的現象。

故事中這個苦命的母親，年輕時滿懷愛情、一心一意等待著丈夫歸來，之後更是滿懷親情、全心全力在扶養兒子，她重視的，其實不過是身邊最單純、最深刻的感情——和丈夫的愛情，和兒子的親情。然而，內地丈夫無情地拋棄她；獨立養大的兒子在種族虛榮心作祟下，也不願理解她的痛苦，傲然拒絕脫下對她而言代表昔日傷痕的內地衫。對一個重視感情的台灣女性而言，恰恰正是她其實並不太在意的「種族問題」，使得她在多年前被日本情人拋棄；而現在又被混血兒子傷害；終究，她還是在家國男性的大論述下犧牲了一切。……可悲的是，面對這種日常生活上的精神折磨，母親完全處於「理直氣弱」的劣勢角色。試看這些對於母親的描寫：「用辯解一般的小聲說」、「語尾卻是低而微弱沒勁的聲音」、「母親再一次懇求太郎；好似罪人接受審判一樣的態度」。即使明明是合情合理的要求，但面對兒子在強勢論述下的倨傲，她卻得以罪人接受審判的委屈態度發言。最後，她仍然得到兒子毫不容情的拒絕，在承受不住險惡氣氛的情形下，這個台灣女性，只能默默地，拭了淚出去。<sup>142</sup>

<sup>140</sup> 黃氏寶桃，〈感情〉，《台灣文藝》，第三卷第四五期，1936年4月20日，頁24，收錄於《台灣新文學雜誌叢刊》，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81年復刻版，第十冊。

<sup>141</sup> 葉石濤，《葉石濤全集22，翻譯卷二》，高雄市：高市文化局；台南市：國立台灣文學館，2006-，頁183。

<sup>142</sup> 呂明純，〈潛抑與放逐——黃寶桃作品研究〉，范銘如主編，《挑撥新趨勢：第二屆中國女性書寫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市：台灣學生書局，2003年2月，頁219-221。

如呂明純學者(2003)分析所指,表面上看來,的確可以說是所謂的家國男性犧牲了一個女人,母親所重視的「感情」都背離她,被周遭所有「愛」遺棄的她,渴望的幸福再次遠離她而去。描寫下看來愛情、親情在母親的內心下似乎互相沒有衝突,呂明純學者(2003)看似也認為這兩種感情皆因「種族問題」而拋棄她。然而,筆者想探討的是,若是反過來看的話,面對這兩種感情時母親本身自我的心態是如何。若從心理透徹人性的話,為愛犧牲的母親本身所擁有的感受不應當是外在給予她情緒那樣單方面的問題,深入思考下來,面對太郎的母親,其自身情感流露不僅僅只有親情下散發母愛那樣的簡單,或許還有將潛藏於心底對前夫的愛情與悔恨投射在孩子身上。畢竟孩子,等同於雙方的一部份。對於筆者而言,「親情」與「愛情」重疊的問題正是母親心裡面的癥結,那重疊的對象正是表露現形於她兒子-太郎。

## 第二節 面對「太郎」的母親心理

母親對於太郎的情感與呵護在文章中表露無遺。光是母親叫太郎起床的開場刻畫,用著柔和的眼光與笑臉凝視著賴床的太郎,就極度展現出作為一位母親對於孩子的母愛,十足感受的到投射出的滿滿耐心與包容。

母は心持笑みをたゝえて、未だ温い寢臺の中で起き溢って居る太郎を見つめた。<sup>143</sup>

母親微笑著,凝視著還在溫暖的床中不欲起身的太郎。<sup>144</sup>

佛洛伊德提及過「當我們看到父母親對待他們孩子的神情時,我們會注意到那是他們本身早已捨棄之自戀的復活與再現,他們有股強迫性的衝動要將所有的完美特質歸於兒童,在審美觀察後卻發現並非如此,並且掩飾與遺忘他所有的缺點<sup>145</sup>」。做父母的,投注給孩子的愛與期盼,包含了自身的渴望與遺憾,他們將所有的美好教授給孩子,太郎的母親也是如此。從小對著他述說自己也未曾去過的內地美好故事,孩子有所要求時,也會隱藏住自己心中的痛苦接受包容他的一切。譬如說文中太郎強要母親掛上小日本國旗的舉動,勢必得讓日日面對那國旗所象徵一切的母親記憶起內地人丈夫所帶給她的痛苦,每當踏入太郎的房間即會有著過去記憶的湧現。

母に無理に願って掛けてある小さな日本の國旗は……<sup>146</sup>

強要母親掛的小日本國旗……<sup>147</sup>

面對太郎的行為,她其實處於兩難的態度,但母親最終還是選擇滿足兒子的喜愛掛上日本國旗。從對於太郎的態度來看,母親對於他自己的兒子所管教的方式應當是沒有威嚴存在的,如同面對「愛情」時般忍讓,總是很低聲下氣,在乎太郎的意見與情緒,自己的感受則內斂內縮,發

<sup>143</sup> 黃氏寶桃,〈感情〉,《台灣文藝》,第三卷第四五期,1936年4月20日,頁23,收錄於《台灣新文學雜誌叢刊》,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81年復刻版,第十冊。

<sup>144</sup> 葉石濤,《葉石濤全集22,翻譯卷二》,高雄市:高市文化局;台南市:國立台灣文學館,2006-,頁183。

<sup>145</sup> Joseph Sandler; Ethel Spector Person; Peter Fonagy,《佛洛伊德的「論自戀:一篇導論」》,李俊毅譯,臺北市:五南,2009,頁23。

<sup>146</sup> 黃氏寶桃,〈感情〉,《台灣文藝》,第三卷第四五期,1936年4月20日,頁22,收錄於《台灣新文學雜誌叢刊》,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81年復刻版,第十冊。

<sup>147</sup> 葉石濤,《葉石濤全集22,翻譯卷二》,高雄市:高市文化局;台南市:國立台灣文學館,2006-,頁181。

生衝突後也自己默默承受委屈，袒護孩子的心情可以見得。文章裡敘述到太郎認同再婚對於母親而言是最重要的事，並且在懇求太郎換下內地服飾的衝突導火線之後的沉默與眼淚，都能明白她內心有著無法向兒子說清楚的感受與不想與兒子太郎發生正面衝突的態度。呂明純學者(2003)所道：「面臨母子齟齬時，透過對於母親心聲的婉轉描寫，黃寶桃更為文中的母親塑造了忍辱負重、委曲求全的形象<sup>148</sup>」。文中一句，母親對兒子再三要求的畫面，足以貼切地寫出無私的愛轉為備感無助般的卑躬屈膝。

「ねえ、お願いだからそうしてお呉れ」

母は再び太郎にお願いした。まるで罪人が裁きを持つ様な態度だった。

「嫌です」予は怒鳴る様に答えた。<sup>149</sup>

「喏，我拜託你這樣做好嗎？」

母親再一次懇求太郎；好似罪人接受審判一樣的態度。

「我不要！」孩子像嘍也似地回答<sup>150</sup>

從感情寄託來看，太郎對於母親而言，那是相依為命的狀況下的生活重心來源，也許因為有這個孩子的存在稍稍撫慰被前夫拋棄的傷口，對於負心漢的愛意與期盼只能投注於小孩身上。站在一位母親的立場，在文章中處處為兒子考量而詢問的狀態皆是深怕孩子受傷的心情，完全感受到母親對於孩子無條件的包容與施捨與對於兒子太郎的保護。

太郎が反対するのが母には一番つらい事であって、若しいじけた太郎が反対すると、このうれしい話も無駄にせねばならない不安があった。<sup>151</sup>

以母親而言，太郎反對是一樁最痛苦的事。假若年輕而畏縮的太郎反對，就有把這快樂的事情取消的不安在。<sup>152</sup>

另一方面，在起初無法接受打擊的狀況看來，兒子卻也悄悄成了她那朝思暮想盼他歸來的內地愛人的「替代物」。一位女人必須要有精神依靠與愛去灌溉，才能歷經獨自承擔現實壓力的歲月。丈夫離棄的她只剩下兒子成為情感上唯一的依靠。太郎成為支持力量與擁抱的對象。對於前夫還有愛意的她，兩人的結晶成為一種被愛與愛的證明。於身旁陪伴的兒子太郎，漸漸地成為遺失內地情人的她轉移愛情灌注的對象。看著太郎想著內地的愛人，這股力量長久下來，造成親情的傳遞裡附帶著愛情的情緒，母親也或許會無意識地展露出小女人的樣態而非母親的樣態。母親與太郎的互動中，即能感受到母親羞澀與小女人的舉止。

「え、とてもうれしい事があるの、お前、何だか當て、ごらん」

母はそう云ってうれしくて耐へられない様に、強く太郎を抱いた。

<sup>148</sup> 呂明純，〈潛抑與放逐—黃寶桃作品研究〉，范銘如主編，《挑撥新趨勢：第二屆中國女性書寫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市：台灣學生書局，2003年2月，頁219。

<sup>149</sup> 黃氏寶桃，〈感情〉，《台灣文藝》，第三卷第四五期，1936年4月20日，頁26，收錄於《台灣新文學雜誌叢刊》，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81年復刻版，第十冊。

<sup>150</sup> 葉石濤，《葉石濤全集22，翻譯卷二》，高雄市：高市文化局；台南市：國立台灣文學館，2006-，頁185。

<sup>151</sup> 黃氏寶桃，〈感情〉，《台灣文藝》，第三卷第四五期，1936年4月20日，頁24，收錄於《台灣新文學雜誌叢刊》，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81年復刻版，第十冊。

<sup>152</sup> 葉石濤，《葉石濤全集22，翻譯卷二》，高雄市：高市文化局；台南市：國立台灣文學館，2006-，頁183-184。

「何でせうね。お母さんがそんなに喜ばれるのは……分った」

「分ったって、何か、云ってごらん」

「お母さん、もう云はなくなつて僕には分つて居ますよ」

母はそう云はれると、さっと赤らめた。<sup>153</sup>

「是啊!有特別高興的事啊!你，猜猜看!」

母親這樣說，似乎高興極了，強力地抱住了太郎。

「是什麼呢?媽那麼高興……我明白了。」

「你明白了?說說看。」

「媽，不說也罷，我很明白。」

母親給他這麼一說，忽地漲紅了臉。<sup>154</sup>

她給孩子的愛包含了對前任丈夫喜怒哀樂的記憶與過往，夾雜全部情緒，不只有愛情、親情，負面的恨更會隨之而來，倘若沒有太郎的誕生，她是否有另尋歸宿的選擇，不用浪費青春年華，無包袱地進入下一個婚姻，並擁有幸福與健全的家庭生活，那是沒有負擔和累贅的，更不會有社會狂襲的閒言細語，由此看來，這又何嘗不是一種「悔恨」的情緒。她每每看見兒子，等同於提醒自己那過去早該忘懷的沉痛，那個早已留下不可抹滅的證據。故當她看見太郎穿了內地人的衣服的橋段裡，就因舊傷痕而傷心起來也在所難免了。

太郎が内地人の着物を着る毎に、その古傷を痛めて居つたのだ。<sup>155</sup>

每當太郎穿了內地人的衣服就因舊傷痕傷心起來<sup>156</sup>

母親之所以希望太郎換下內地的服飾，其實不僅僅怕被新任丈夫感受到自己還未忘記舊情，筆者認為也是種內心渴望解救自己的心態，無須再碰觸那表面赤裸裸的內地印象而活，那潛藏的情感太令人難受。

又今度の夫にしたって、妻の子が殊更に内地に感情を走らせて居る姿を見せるのは、好い事とは思はれなかつた。だからこの機會に取り除けて置きたかつたのだ。<sup>157</sup>

給這一次的新丈夫故意表現對嚮往內地的樣子，不是椿好事，所以趁這機會想排除它。<sup>158</sup>

面對「太郎」，她作為一位母親，但當前夫記憶與血緣的連結後，卻也需要如同作為一位女人。集結「親情」與「舊愛」的兒子，使得母親面對他，在感情的宣洩下產生了衝突與矛盾。無

<sup>153</sup> 黃氏寶桃，〈感情〉，《台灣文藝》，第三卷第四五期，1936年4月20日，頁24，收錄於《台灣新文學雜誌叢刊》，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81年復刻版，第十冊。

<sup>154</sup> 葉石濤，《葉石濤全集22，翻譯卷二》，高雄市：高市文化局；台南市：國立台灣文學館，2006-，頁183。

<sup>155</sup> 黃氏寶桃，〈感情〉，《台灣文藝》，第三卷第四五期，1936年4月20日，頁26，收錄於《台灣新文學雜誌叢刊》，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81年復刻版，第十冊。

<sup>156</sup> 葉石濤，《葉石濤全集22，翻譯卷二》，高雄市：高市文化局；台南市：國立台灣文學館，2006-，頁185。

<sup>157</sup> 黃氏寶桃，〈感情〉，《台灣文藝》，第三卷第四五期，1936年4月20日，頁26，收錄於《台灣新文學雜誌叢刊》，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81年復刻版，第十冊。

<sup>158</sup> 葉石濤，《葉石濤全集22，翻譯卷二》，高雄市：高市文化局；台南市：國立台灣文學館，2006-，頁185。

情無義的優越血緣內地人前夫與自己辛苦懷胎所生下的孩子，該怎麼面對比較妥當。在再婚的第二次幸福路上，面對代表著愛與恨兩種情緒交織成的太郎，等同於新舊愛情的抉擇和衝突或像是親情和愛情之間的拔河，這樣過於兩難的情緒，那最終只能無言以對，默默承受離去的描寫是滿腹辛酸苦澀無從訴說的無奈。

沈黙が続いた。先刻迄愉快だった反動が来たのだ。母はこの場の險悪な空氣に耐え切れなくなって、黙っハンカチを眼に當て、涙をふいて出て行きかけた。<sup>159</sup>

沉默繼續著。剛才的愉悅的反動來了。母親耐不住這場面的險惡氣氛，默默地把手帕貼住眼睛，拭了淚，走了出去。<sup>160</sup>

反觀回到論述主角太郎時，母親對他的影響力也由面對太郎的母親之情感的多樣而展現。

### 第三節 母親對「太郎」的影響力

前一節所述希望太郎換下內地服飾可以理解母親看著太郎會有著對於內地愛人所有感情的表現。從母親自己到兒子太郎，外在所背負著的那包袱（內地影子）一切都該割捨，迎接新的本島人丈夫。從文章中的對話與母親換上旗袍的動作，即可以表現她對於再婚與新生活的決心。

母は平常は内地人の父の趣味に合ふ様な、年に似ないじみな服を着けて居るのに、今日に限って派手な美しい長衫を、ぴったり身體に合はせて着て居た。<sup>161</sup>

母親平常都穿著符合內地人父親嗜好的不合年齡的質樸的衣衫，不過今天卻穿著華麗而合身的長衫（旗袍）。<sup>162</sup>

そうでね、わたしは彼の人と本當に結婚する氣になったんですが。<sup>163</sup>

所以我真的決心跟那人結婚了。<sup>164</sup>

要求自己脫離過去陰霾的母親，殊不知她過去的那些投射，卻已經造就太郎根深蒂固的想法。天生的血緣連結加上後天成長環境的洗腦作用，太郎自身對於自己屬於內地人的認定已經無法動搖，從文本敘述中太郎對於母親的抱怨裡可以得知。

太郎にして見れば例へ本居地は臺灣であり、母が臺灣の女であっても、父の方を餘分に受けて生れて居る自分は明らかに内地人の子供だ。内地

<sup>159</sup> 黃氏寶桃，〈感情〉，《台灣文藝》，第三卷第四五期，1936年4月20日，頁26，收錄於《台灣新文學雜誌叢刊》，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81年復刻版，第十冊。

<sup>160</sup> 葉石濤，《葉石濤全集 22，翻譯卷二》，高雄市：高市文化局；台南市：國立台灣文學館，2006-，頁186。

<sup>161</sup> 黃氏寶桃，〈感情〉，《台灣文藝》，第三卷第四五期，1936年4月20日，頁23，收錄於《台灣新文學雜誌叢刊》，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81年復刻版，第十冊。

<sup>162</sup> 葉石濤，《葉石濤全集 22，翻譯卷二》，高雄市：高市文化局；台南市：國立台灣文學館，2006-，頁182。

<sup>163</sup> 黃氏寶桃，〈感情〉，《台灣文藝》，第三卷第四五期，1936年4月20日，頁24，收錄於《台灣新文學雜誌叢刊》，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81年復刻版，第十冊。

<sup>164</sup> 葉石濤，《葉石濤全集 22，翻譯卷二》，高雄市：高市文化局；台南市：國立台灣文學館，2006-，頁183。

人を父として此の世に出て来た人間なんだ。そう思ふと母が内地に對する關心の少ない様に思はれて、怒らずには居られなかった。<sup>165</sup>

以太郎而言，縱令生在台灣，母親是台灣女性，可是有著父親血統關係的自己分明是內地人孩子，以內地人為父親誕生的人。這樣想來，母親似乎對內地缺乏關心而不得不得生氣。<sup>166</sup>

如上一節中筆者分析所指，母親投射給太郎的愛其實包含了對前夫的愛以及對孩子的愛。從小製造美好的父親形象給他，重複著記憶中的過往，回味這一切的同時，正也是催眠自己持續相信前夫的美好，間接完成自己潛在的慾望，從中創造前夫的影子，眼前的太郎從起初是當下痴痴等待著丈夫歸來懷抱著希望的妻子所擁有的籌碼，也是一種與舊愛連結的證明，苦守多年的她漸漸地把太郎視為唯一的情感寄託，不再天真的相信前段愛情的死灰復燃，漸漸長大的太郎成為母親眼中寂寞的慰藉與給予餘情未了的愛意對象。太郎於無形之中接收到母親愛情與親情上雙向的寄託，這也正是帶給太郎極大影響的開端。表面上包含對內地父親的憧憬、屬於內地人的小孩意念，潛在之中無形地開始創造出太郎的理想自我(超我)，自己希望像父親一般，漸漸地自己就如同父親的化身，母親所深愛的角色，那位她所不該淡忘掉的人。太郎不願脫下身上的內地衣物，或許就是不願意遺失掉被母親深愛的價值。為了擁有母親渴求的愛人形象，內地父親的表象畫面，包含內地人父親的衣著、日本旗幟，皆是化身為母親心底深處所愛的那個人必備的裝飾。

於呂明純學者(2003)的研究中對於太郎的理解敘述裡提及的說法，其認為「強」要母親掛日本國旗、聽到要換台灣衣衫後馬上表情大變的太郎在黃寶桃的那筆下，就顯得粗暴、無理取鬧得多。<sup>167</sup>」針對種族的問題上，呂明純學者(2003)也指稱太郎是因所謂的「種族虛榮心作祟」<sup>168</sup>。筆者認為若是從「種族優越問題」的框架之中跳開，以一位兒童心理成長的多方面影響因素去考量的話，或許對於太郎的行為與心理就比較能感同身受。本研究即是希望用更深層的認知，去接受太郎於文章中的情緒，不再以看似欺侮母親的表現來排斥與嗤之以鼻。那自己的母親身為本島人太郎又是怎樣的去看待她呢?該如何解釋他對母親的互動裡母親的本島人身分並未影響他對母親的愛?相反的，從文中太郎回應母親再婚問題時，我們可以感受到那份感情是很深刻真誠的，對於母親並非想像中那般粗暴與無理，以母親的幸福為主要考量，自己的好壞則無所謂，這樣的太郎反倒能看得到他性格裡所散發出那滿滿的溫暖，全是一種對母親的貼心與愛護表現。

「僕がい、も悪いも無いんです。僕はもうこれ以上お母さんの淋しいお姿を見たくないんです」<sup>169</sup>

<sup>165</sup> 黃氏寶桃，〈感情〉，《台灣文藝》，第三卷第四五期，1936年4月20日，頁25，收錄於《台灣新文學雜誌叢刊》，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81年復刻版，第十冊。

<sup>166</sup> 葉石濤，《葉石濤全集22，翻譯卷二》，高雄市：高市文化局；台南市：國立台灣文學館，2006-，頁185。

<sup>167</sup> 呂明純，〈潛抑與放逐—黃寶桃作品研究〉，范銘如主編，《挑撥新趨勢：第二屆中國女性書寫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市：台灣學生書局，2003年2月，頁219。

<sup>168</sup> 呂明純，〈潛抑與放逐—黃寶桃作品研究〉，范銘如主編，《挑撥新趨勢：第二屆中國女性書寫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市：台灣學生書局，2003年2月，頁220。

<sup>169</sup> 黃氏寶桃，〈感情〉，《台灣文藝》，第三卷第四五期，1936年4月20日，頁24-25，收錄於《台灣新文學雜誌叢刊》，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81年復刻版，第十冊。

「以我來說沒有所謂的好和壞，我再也不想看到媽寂寞的樣子。」<sup>170</sup>

呂明純學者(2003)其論文分析裡，則是呈現太郎給予母親龐大的壓力的說明：

而在「有父親血統關係的自己分明是內地人孩子」的認知下，太郎對於母親的憤怒，來自她「對內地缺乏關心」，即使內地的種種會提醒母親昔日的痛苦，但在虛榮心作祟下，認同父系血統的太郎，仍然不允許母親忘卻「內地」的「光榮」，強迫她在家中虛擬了內地的氛圍。<sup>171</sup>

筆者認為太郎應當有更多情緒影響著他，若單以太郎不能接受母親忘卻內地的一切來看，會與文章故事發展有些矛盾、不妥與疑問的地方。既然不允許母親之內地情誼流失，太郎應該全盤的不能認同母親改嫁本島人，為何甚至還為她感到如此開心。

「え、いゝですとも。僕はお母さんのために大變うれしく思ひますよ。今迄僕のためにどんなに淋しい思ひをなされたか。耐えられない苦しさにて耐えて来たか、僕には分って居るんですから」<sup>172</sup>

「嗯，好哇！我為了媽而非常高興，為了我，媽不知忍耐了多少寂寞呢！我充分明白嗎忍受了無法忍受的痛苦。」<sup>173</sup>

除此之外，也應不會認為母親穿著旗袍時比起應付內地父親的喜好來得美麗……

母は平常は内地人の父の趣味に合ふ様な、年に似ないじみな服を着けて居るのに、今日に限って派手な美しい長衫を、ぴったり身體に合はせて着て居た。<sup>174</sup>

母親平常都穿著符合內地人父親嗜好的不合年齡的質樸的衣衫，不過今天卻穿著華麗而合身的長衫（旗袍）。<sup>175</sup>

歡喜母親再婚本島人、同意本島人繼父進入房內與日後接過去一同生活、認為母親穿著旗袍比不適合自己的服飾還美麗，這些都與所謂的「種族問題」與「內地意識」有些許衝突。或許，在太郎的內心深處真摯的情意與親情早已凌駕於種族問題和內地意識上了，並也與受到母親影響下的「愛」所演變而來。

#### 第四節 小結

第三章將藉由此章節對母親與太郎之間的關係的瞭解中，透過佛洛伊德理論來作深入研究，

<sup>170</sup> 葉石濤，《葉石濤全集 22，翻譯卷二》，高雄市：高市文化局；台南市：國立台灣文學館，2006-，頁 184。

<sup>171</sup> 呂明純，〈潛抑與放逐—黃寶桃作品研究〉，范銘如主編，《挑撥新趨勢：第二屆中國女性書寫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市：台灣學生書局，2003 年 2 月，頁 220。

<sup>172</sup> 黃氏寶桃，〈感情〉，《台灣文藝》，第三卷第四五期，1936 年 4 月 20 日，頁 24，收錄於《台灣新文學雜誌叢刊》，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81 年復刻版，第十冊。

<sup>173</sup> 葉石濤，《葉石濤全集 22，翻譯卷二》，高雄市：高市文化局；台南市：國立台灣文學館，2006-，頁 184。

<sup>174</sup> 黃氏寶桃，〈感情〉，《台灣文藝》，第三卷第四五期，1936 年 4 月 20 日，頁 23，收錄於《台灣新文學雜誌叢刊》，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81 年復刻版，第十冊。

<sup>175</sup> 葉石濤，《葉石濤全集 22，翻譯卷二》，高雄市：高市文化局；台南市：國立台灣文學館，2006-，頁 182。

由本章母親對太郎所釋放的充沛感情下的影響力來思索，從此端倪可研判主角複雜心理的起初點正是由「單純的親情」裡透露出混雜「愛情」的成分所導致，並且得知與後來太郎的心理漸漸走向「自愛」的狀態有關。

因此，筆者認為若不看待母親對於太郎的影響層面，是很難解釋出各種心理頭緒的。以光榮內地意念來看太郎於小說內的細微瑣碎的刻畫，很難解釋出太郎的行為表現。不僅僅是認可母親再婚本島人一事，從欣喜母親得到幸福轉而氣氛傷感無言，他心情轉變的原因正是因為有更多複雜的心理狀態，筆者認為其實存在於太郎內心。為了補足太郎此角色的情緒來源，需要透過文本的枝節脈絡剖析太郎性格與心理。如同此章的前提所提及到母親對於孩子的影響力基本上就不能忽視(伊底帕斯情結)，小說中的母親對於太郎的情感與行為並非如此單純下，更強化了兒子對於母親所會產生的依戀行為。進入第三章重心時，使筆者分析主角太郎之所以不得不用「戀母情結」作為依據的開端因素也在於此。



### 第三章 從佛洛伊德思維看太郎

從分析母親對太郎的影響之引導下，本章將進入本研究重心解析「太郎」之心理症狀。並且最後筆者將進入細說主角這些心理症狀樣態是如何形成於佛洛伊德的人格結構（自我、本我與超我）運作底下，以及調和心理的狀態下啟動了哪些自我防衛機制。根據回歸探索人格心理構造內，心智拉扯引發防衛機制的運作的分析過程，理解「太郎」發展出行為跡象（心理症狀）與情緒波動的由來。所以在進一步分析太郎的前述作業裡，必須先對於筆者要引用的佛洛伊德思維中的理論有所介紹與認識。筆者認為研究文本〈感情〉裡，最終的衝突矛盾乃是與角色的情感匱乏與壓抑有關。探究對象潛意識下所壓抑的根源，本研究以介紹精神分析的基礎出發，也就是對所謂的「本我」（id）、「自我」（ego）、「超我」（superego）之人格結構其三者間互動先做瞭解。

《佛洛伊德之日常心理分析》序言中簡單扼要的說明了人格結構：「在一般情況下，「本我」、「自我」、「超我」三者處於平衡狀態，而它們之間的關係失調，就是人的一切行為失常的根源<sup>176</sup>。」；因此對於瞭解文本裡角色之「他為何如此的感情狀態」，知道其三者的流通與運作，感受其為何會矛盾拉扯內心之前提是必要的。

另外，與之息息相關的支線莫過於心理防衛機制的連結性。由佛洛伊德首創的心理防衛機制概念，雖經過後世各樣的修正，但由基本定義來看，何謂「心理防衛機制」（defense mechanism），如約瑟夫·羅斯奈（Joseph Rosner）所言：「自衛機轉種類很多，但是目標都相同。它們幫助一個人逃離自己眼前的痛苦事實，並且探掘在他的內心世界裏更好的未來。自衛機轉的來源主要是潛意識，它可能出現在夢裏或意識的思想，感覺和行為中。<sup>177</sup>」簡而言之，功能在於使個人內心的矛盾衝突屏除於意識之外，或可說受到源自於「本我」（id）與「自我」（ego）的衝突，而「自我」（ego）乃接受「超我」（superego）所下達的命令，產生出的壓抑與擺脫，在不知不覺中減少自己的心理壓力和負擔，用來化解心中的困擾與應付挫折、不安的機制。我們的內在精神為了讓自我可以接受本身抗拒的事，為了處理某些情緒，使之不致於引起太大的痛苦，故它是具有保護作用的重要性，而防衛機制對每個人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屬於人類潛意識會使用的內在防衛機制。在「本我」、「自我」、「超我」衝突的情況下，潛意識中為了防禦的目的而轉化心理，此機制是為必然的存在，這也是分析文本角色時所依據的理論。以下，先將整理出「人格結構」與「防衛機制」的概念，以便連結本章之後所要說明與論述的內容。

#### 第一節 佛洛伊德之「人格結構」與「自我防衛機制」

##### 一、人格結構：「自我」「本我」「超我」

透過《弗洛伊德自述》<sup>178</sup>完整說明來理解人格結構其三者的關係。筆者將透過列點式整理，以便讀者區分。

本我：

「本我」包含了所有原始的遺傳的本能和慾望，宛如「一口充滿著沸騰液體的大鍋」，其中最根本的是性慾衝動，即所謂「性力」（Libido），它為各種本能衝動、慾望提供力量，是人的整

<sup>176</sup> 佛洛伊德，《佛洛伊德之日常心理分析》，楊韶剛譯，霍克（旭昇代理），2004，頁8-9。

<sup>177</sup> Joseph Rosner，《精神分析入門：150個問題的解說與釋疑》，鄭泰安譯，臺北市：志文，1984，頁80。

<sup>178</sup> 佛洛伊德，《佛洛伊德自述》，黃忠晶；王銀瓶；黃巍編譯，天津人民出版社，頁72-76。

### 個精神活動的基礎和源泉。<sup>179</sup>

- 精神結構中，混沌一團的本我構成了我們生命中的核心內容。
- 與外部世界沒有直接的接觸，只有通過中介才能被我們了解。
- 體現了遺傳的影響。本我是遺傳的，人生來就有的，它由本能<sup>180</sup>所構成。本能來源於人的肉體組織，在本我中，它以我們還不了解的形式得到最初的心理表現。
- 像本我這樣的本能，它直接和任意的滿足往往會造成與外部世界的危險衝突，引發重大災難。本我並不知道要為確保生存而擔心，因此也不知道甚麼是焦慮。或者更準確些說，儘管它可以產生焦慮的感覺要素，卻不會利用它們。
- 存在於本我心裡要素之中的那些原初過程，它們不受邏輯的嚴格控制。<sup>181</sup>
- 本我與外部相隔離，它有自己的感覺世界。它能十分敏感地察覺其內部的某些變化，特別是來自其本能需要的緊張波動。這些變化作為快樂或不快樂的感受而變成意識。
- 本我服從不可抗拒的快樂原則<sup>182</sup>，但並非只有它才如此，其他心裡活動也服從這一原則；或許它們可能對這一原則作出一些修改，辦不可能取消它。

自我：

「自我」所代表的是理性和判斷，它既要滿足「本我」的要求，又要使之符合「現實」，調節兩者之間的衝突。但「自我」並不能脫離「本我」而獨立存在。它不僅為「本我」服務，而且**必須依靠「本我」提供的能量來活動。**<sup>183</sup>

- 本我的一部分得到特別的發展，從而產生一個專門的組織。它來自本我的表層（本我的表層在接受或排斥刺激的過程中直接跟外部世界相接觸），有著接受刺激的器官，還具有免遭刺激傷害的活動程序。這一特殊組織由此成為本我和外部世界之間的中介。
- 自我的活動在於同時滿足本我（接受本我的本能要求，讓其獲得滿足）、超我和現實的要求（它從外部世界獲得知覺，作為記憶加以使用），也就是在三者之間協調它們的關係（它著意於自我保存，抵擋著來自本我和外部世界的過分要求；同時它所有的決定都服從於修改過的快樂原則）。
- 受到個體自身經驗的控制，也就是受當前偶然實踐的控制。
- 它的任務就是自我保存（自我的活動由刺激產生的緊張而<sup>184</sup>引發，無論這緊張是自發的還是外來的）。<sup>185</sup>

<sup>179</sup> 弗洛伊德，《弗洛伊德之日常心理分析》，楊韶剛譯，霍克（旭昇代理），2004，頁8。

<sup>180</sup> 弗洛伊德：「人肌體的各種本能起著作用，這些本能是由愛慾和破壞這兩種原始力量以各種比例混和在在一起的產物，它們與不同的器官或器官系統相聯繫而分化出來。這些本能唯一的動力是獲得滿足，這是器官借用外部世界而讓自身內部發生某種變化。」

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自述》，黃忠晶；王銀瓶；黃巍編譯，天津人民出版社，頁74。

<sup>181</sup> 弗洛伊德：「我們假定存在於本我心裡要素之中的那些原初過程，跟存在於我們智力和情感生活之中，由我們的意識所知覺並為我們所熟悉的那些過程是完全不同的。它們不受邏輯的嚴格控制，因為邏輯可能以不合理為由，來排斥和消除其中一些過程。」

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自述》，黃忠晶；王銀瓶；黃巍編譯，天津人民出版社，頁74。

<sup>182</sup> 弗洛伊德：「快樂原則是要求減少甚至消除本能需要帶來的緊張。」

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自述》，黃忠晶；王銀瓶；黃巍編譯，天津人民出版社，頁74。

<sup>183</sup> 弗洛伊德，《弗洛伊德之精神分析論》，楊韶剛譯，霍克（旭昇代理），2004，頁8。

<sup>184</sup> 弗洛伊德：「緊張的出現通常被感覺為不快樂，而緊張的減弱被感覺為快樂。但感覺為快樂或不快樂，也許不在於緊張的絕對強度，而是其變化的節奏。」

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自述》，黃忠晶；王銀瓶；黃巍編譯，天津人民出版社，頁73。

<sup>185</sup> 弗洛伊德：「就外部事件而言，自我通過意識到刺激，通過記憶儲存有關刺激的經驗，最後，通過活動學

- 自我總是力求快樂，盡量避免不快樂。當預期有不快樂的增加時，往往會伴隨著焦慮。無論來自內部還是外部，不快樂的增加都會被當成危險時刻。這時自我常常放棄與外部世界的聯繫，退回睡眠的狀態，並對其組織作出範圍廣泛的改變。
- 自我的構建功能是把思想活動引入本能的要求和滿足本能的行動之間，讓它在確定當前方向和估計以前經驗之後，預測所計畫的行動後果。<sup>186</sup>
- 本我只是指向快樂一樣，自我主要考慮的是安全。(現實原則)<sup>187</sup>
- 自我以焦慮感為信號，對威脅自身完整的危險發出警告。在尋求保存自己的過程中，自我不僅會受到來自外部現實危險的威脅，還可能受到內部本我類似的危險威脅。
- 首先，過度強烈的本能會傷害自我，這跟外部世界的過度刺激相類似。<sup>188</sup>  
這樣，自我是在兩個戰場作戰：它既要防止外部世界毀滅自身的威脅，又要防止內部世界提出過分要求，從而保存自己。<sup>189</sup>

超我：

「超我」則代表一種對本我的道德限制（即良知），與「本我」處於對立的地位，它不僅使「本我」推遲得到滿足，而且使之不能得到滿足，它指導「自我」去限制「本我」的衝動。<sup>190</sup>

- 部分外部世界不再是對象，而是通過認同作用被納入自我之中，成為內部世界的一部分。這個新的心理構成部分開始起著以前是由外部世界的人們所起的作用，它觀察自我，命令自我，以懲罰來威脅自我，簡直就像這個孩子的父母。
- 超我是由自我分化而出的，或者說與自我相對立，從而構成自我必須關注的第三種力量。<sup>191</sup>
- 超我作為我們的良心而起著評判作用，我們可以意識到它。<sup>192</sup>
- 超我都體現了一個人童年受到的影響，也就是父母的教養所施加的影響，以及他對他們

---

會有效改造外部世界以利於自身，來完成自我保存的任務；就內部事件而言，與本我相聯繫，自我通過對本能願望的控制，通過決定是否允許本能願望獲得滿足，通過延緩本能願望的滿足、壓抑其興奮直到外部世界具備了有利時機，來完成自我保存的任務。」

佛洛伊德，《佛洛伊德自述》，黃忠晶；王銀瓶；黃巍編譯，天津人民出版社，頁 72。

<sup>186</sup>佛洛伊德：「自我就會作出決定：是力求實現本能需要的滿足，還是加以拖延。有時根本不要求自我做甚麼，因為本能的要求很危險而完全被壓抑了。」

佛洛伊德，《佛洛伊德自述》，黃忠晶；王銀瓶；黃巍編譯，天津人民出版社，頁 74。

<sup>187</sup>佛洛伊德：「自我責無旁貸地承擔著自我保存的任務，而這正是本我所忽略的。」

佛洛伊德，《佛洛伊德自述》，黃忠晶；王銀瓶；黃巍編譯，天津人民出版社，頁 75。

<sup>188</sup>佛洛伊德：「實際上，過度強烈的本能並不會毀滅自我，卻能夠毀滅自我特有的動力組織，使自我重新變成本我的一部分。其次，經驗告訴自我，某些本能需要自身並不是無法承受的，但它們滿足會帶來現實世界的危險，因此這種本能需要也是危險的。」

佛洛伊德，《佛洛伊德自述》，黃忠晶；王銀瓶；黃巍編譯，天津人民出版社，頁 75。

<sup>189</sup>佛洛伊德：「它對待兩者的方法是相同的，但在對付內部敵人方面處於不利狀態。自我在起源上跟內部敵人一致，後來它們又關係密切，共生共存，因此自我很難躲避內部的危險。雖然內部敵人暫時受到壓制，卻一直作為威脅而存在。」

佛洛伊德，《佛洛伊德自述》，黃忠晶；王銀瓶；黃巍編譯，天津人民出版社，頁 75。

<sup>190</sup>佛洛伊德，《佛洛伊德之精神分析論》，楊韶剛譯，霍克(旭昇代理)，2004，頁 8。

<sup>191</sup>佛洛伊德：「當自我和超我十分協調地發揮作用時，很難區別兩者的表現；而它們關係緊張和疏遠時，要區別兩者就比較容易。人們受到良心責備時會感到苦惱，這是道德的力量在起作用。另一方面如果自我成功地抵制了超我和某種誘惑，做了一些反對超我的事情，它就會提高自信和自尊，好像取得了一些成就。這時超我雖然已經變成內部世界的一部分，對自我仍然扮演著外部世界的角色。」

佛洛伊德，《佛洛伊德自述》，黃忠晶；王銀瓶；黃巍編譯，天津人民出版社，頁 76。

<sup>192</sup>佛洛伊德：「由於值得注意的是，超我往往表現得十分嚴厲，其程度超過了真正的父母。超我要求自我不僅說明自己的活動，還要說明自己的種種想法以及沒有實施的種種圖謀，它似乎能夠察覺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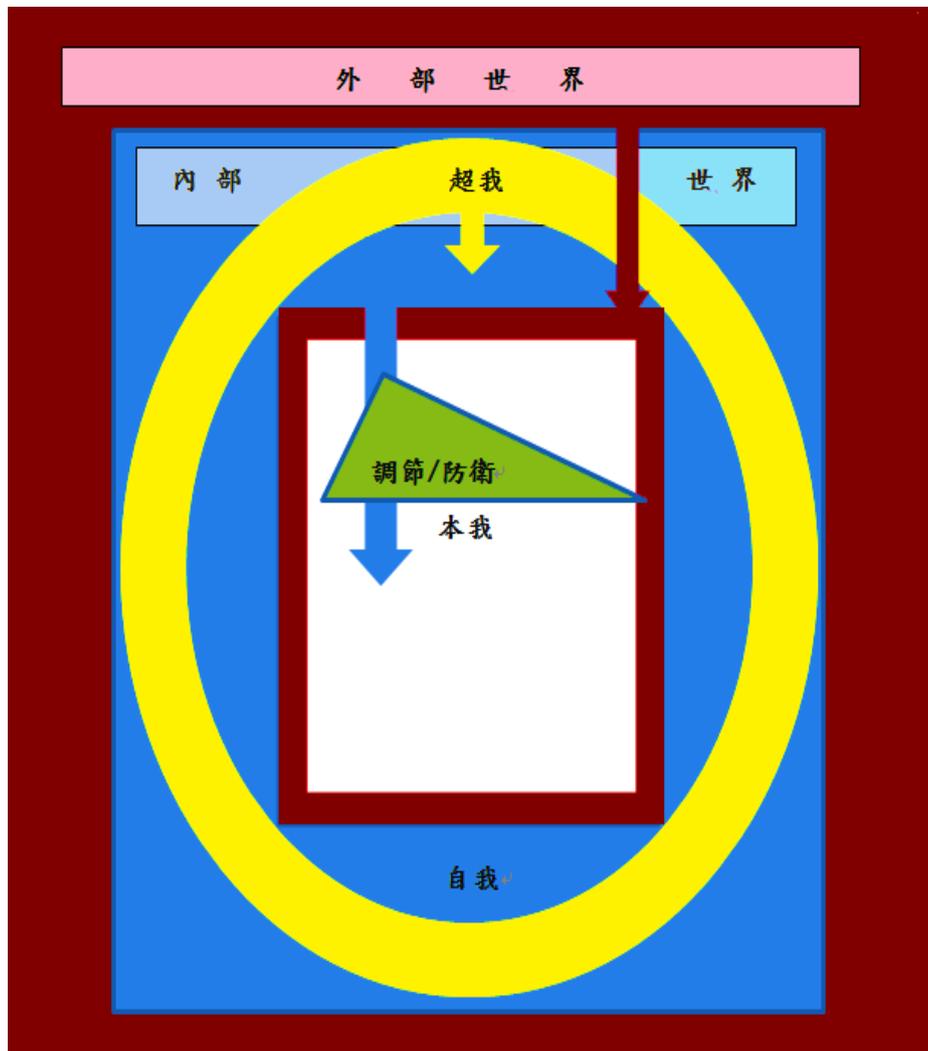
佛洛伊德，《佛洛伊德自述》，黃忠晶；王銀瓶；黃巍編譯，天津人民出版社，頁 76。

的依賴所產生的影響。<sup>193</sup>（父母的影響在這人的自我中產生了特殊的作用，並作為沉澱物而留存下來）<sup>194</sup>

- 體現了繼承下來的前人的影響。<sup>195</sup>

筆者對此三者的流通自製以下圖式來說明，藉此表達筆者所釐清的思緒，希望傳達較易理解的人格結構，順道帶入心理防衛機制形成位置，以示連帶關係：

（圖一）



<sup>193</sup> 佛洛伊德：「實際上超我感受的不僅是父母個人的品質，還有他們所屬的社會等級的品味和標準以及他們所屬的民族的意象和傳統。」

佛洛伊德，《佛洛伊德自述》，黃忠晶；王銀瓶；黃巍編譯，天津人民出版社，頁 76。

<sup>194</sup> 佛洛伊德：「有些喜歡明確劃分的人也許會說，在跟父母分離後，個體面對的外部世界代表了現實力量；他帶有遺傳傾向的本我代表有了有機體的過去；後來，超我逐漸把外部世界和本我連接在一起，更多的是代表過去的文明，作為流傳下來的經驗，這是兒童早期生活中必然會重複的經歷。這一概括不見得都是對的。文明肯定會在本我中留下一些沉澱物。超我的主要作用是在本我中引起回應；兒童的許多新體驗得到加強，這是因為，它們不過是某些早期種族發生時的經驗的重現。因此，超我處於本我和外部世界當中，它將現在和過去的影響合併於一身。在確立超我的同時，我們就已經有了一種方式，讓現在轉變為過去。」

佛洛伊德，《佛洛伊德自述》，黃忠晶；王銀瓶；黃巍編譯，天津人民出版社，頁 76。

<sup>195</sup> 佛洛伊德：「這些繼續起作用的父母影響，不僅包括父母的實際人格，還包括由此而代代相傳的家庭、民族、國家的傳統，包括由此體現的直接社會環境的要求。在個體發展過程中，老師以及其他公眾生活中被看作社會理想的典範等等，也會做為父母的後繼者和替代者塑造一個人的超我。」

佛洛伊德，《佛洛伊德自述》，黃忠晶；王銀瓶；黃巍編譯，天津人民出版社，頁 77。

補足說明：

外部世界(紅底):任何刺激於對象的可能因子,包括社會風氣、事情歷練、人物的接觸...等。文明這種外部世界的殘留會留有一部分於本我中。

超我(黃底):由自我中演化。因受外部世界的感染影響孕育而生,而命令自我。

自我(藍底):與外部世界接觸,受超我控制,會壓抑本我慾念,調節與外部之衝突,產生防衛機制。

本我(白底):慾念與快樂,遺傳與本能。無與外部世界接觸到。

總而言之,綜合(圖一)來作出簡單說明,即「自我」因接觸外部世界而產生的「超我」,將會迫使「自我」壓抑「本我」的慾念,這之間產生了不愉快,所以會需要防衛自己產生調適的保護機制(「自我防衛機制」)。

## 二、自我防衛機制

本能衝動會經歷一種變化,就是遇到障礙,其目的是使這種衝動無效。在一定的條件下這種衝動會進入被壓抑的階段,我們現在就對這種條件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如果起作用的是一個外部刺激,那麼逃避顯然是一種合適的補救辦法,但本能是無法逃避的,因為自我無法躲避自己。以後會發現,根據判斷作出的拒絕(譴責〈condemnation〉)是反對衝動的良好武器。壓抑是譴責的早期階段,介於逃避與譴責之間,在進行精神分析研究之前是無法描述這個概念的。<sup>196</sup>

—佛洛伊德

從佛洛伊德論述壓抑之前言裡,我們可以發現因為衝突而有障礙產生,並引起不安焦慮反應,以至於自我壓抑本我之慾望與衝動時,為了減輕心中的不舒適感受,而有了所謂的自我防禦現象。透過《心理治療》<sup>197</sup>一書裡,對於防衛機制做了簡單的說明介紹。

心理防禦機制“防禦”一詞最早源於1894年佛洛伊德的《防禦性神經精神病》一書,當時提出並描述了九種防禦機制。1936年他的女兒安娜·佛洛伊德在《自我與防禦機制》一書中發展了防禦機制的理論,至今已有數十種防禦機制被提出。防禦機制(defense mechanism)是精神分析學說中的一個基本概念。它是一個人直接的、習慣性的心理保持機制,即當個體潛意識中本我的欲望與現實或超我之間出現矛盾造成心理衝突時,會出現焦慮反應。此時自我通過心理防衛機制來控制本我的慾望與衝動,從而起到減輕焦慮的作用。因此防衛機制也被稱為“自我防衛機制”。佛洛伊德認為防衛機制是在潛意識中進行的,是一種“無意識”的過程。<sup>198</sup>

<sup>196</sup> 佛洛伊德,《佛洛伊德著作選》,賀明明譯,台北市:唐山出版社,1989,頁37。

<sup>197</sup> 胡佩誠,《心理治療》,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2006。

<sup>198</sup> 胡佩誠,《心理治療》,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2006,頁17。

電子書

HTTP://WWW.APABI.COM/CEC/PUB.MVC?PID=BOOK.DETAIL&METAID=M.20081126-M802-W018-050&LIB=CEC&LIBNAME=&DI=

由此一解說，更能清楚表示出防禦機制與「自我、本我、超我」的關係之來龍去脈。筆者所沿用的《走出生命的幽谷》<sup>199</sup>書籍中，沈教授為作者所提的序裡提及佛洛伊德的女兒安娜對於防衛機制的解釋：「佛氏的女兒安娜於一九三六年發表“自我與心理防衛機轉”一書裡，暢述心理防衛機轉的普遍性，是自我功能的一部分，每個人都會在不自覺中，或多或少運用自己獨特的防衛機轉，處理日常生活的遭遇，減少焦慮緊張。<sup>200</sup>」既然，每個人在心理起伏之下必定藏著防衛機制作用，故若需分析小說中的故事人物所表達的情緒與性格，並從中欲深入探討心理層面問題，如同安娜對防衛機制所言的普遍性，故防衛機制與人的心理有著不可劃分的地位，這也顯示為何文本分析裡，需要運用這些機制作用作說明，因心理和防衛機制具有無法切割的相互必然作用。

以下筆者引用《走出生命的幽谷》一書中所說明之解釋<sup>201</sup>，來了解本研究所使用的幾項防衛機制的作用說明：

- ①壓抑作用(Repression):將無法為人接受的想法、衝動、情緒，自動地從意識面驅逐入潛意識(動機性的無意識遺忘)。
- ②退化作用(Regression):當事人遭遇內心衝突時，會不自覺的退回到困難較少或可以得到滿足的階段，他的反應和表現，會比正常的年齡階段顯得幼稚。
- ③仿同作用(Identification):下意識地想模仿、學習某個人的人格特質，通常此人都會擁有一人為當事人所嫉妒或欽羨的特質。
- ④內射作用(Introjection):內射就是，當事人將他喜愛或憎厭的人或者其他外在對象，象徵性地帶進自己的人格內，同化為自己的一部分。這個機轉，與「投射」恰好相反，但與「仿同」和「內含」，則有極密切的關係。
- ⑤合理化作用(Rationalization):個人的行為無法符合社會規範，或是遭遇挫折而不能獲得個人所追求的目標時，為了想維護自尊、減低焦慮感，便給自己的行為和想法一個合理的解釋；這個解釋，不一定就是真正的行為原因，很多時候，當事人不惜曲解現實，文飾自身的過錯，但本人卻不知情。
- ⑥昇華作用(Sublimation):將原始的，不為社會接受的潛在慾望或本能改變，以較符合社會規範的方式表現出來，也可以稱之為「情緒的社會化歷程」(socialization of emotion)。
- ⑦替代作用(Substitution):將一個無法達成或無法被接受的心理需求改變方向，使其成為可以完成可被接受的活動。但為了使原先的心理需求得到滿足，這個被替換上來的活動，必須與前面被禁制的活動間，存在某種相似性，例如強烈的殺戮衝動，可以用改玩打靶遊戲來替代、滿足。
- ⑧否定作用(Denial):潛意識裡，拒絕承認某個不為意識接受的想法、感覺、願望、需求或事實，就好像當做問題不存在一樣。否認是個下意識的活動，和故意說謊不同。
- ⑨轉移作用(Displacement):所謂「遷怒」即是轉移作用的表現，當事人因某種原因不能將情緒施諸於某個對象上，因而轉移到另一個可以接受此情緒的對象身上，減輕自己的精神負擔。當一個員工被老闆責罵，轉而回家罵人出氣，這是一個正常的現象。
- ⑩隔離作用(Isolation):把與社會規範抵觸的衝動、想法或行動，從記憶和意識層面裡隔離出來，不使個人意識到，也因而能除去伴隨這些記憶而來的情緒，所以，縱然當事人還能夠回想起某些創痛事件，但隨著回憶而起的悲傷感已被「隔離」。

<sup>199</sup> 沈楚文口述；呂政達撰文，《走出生命的幽谷：認識心理防衛機轉》，臺北市：張老師，2005。

<sup>200</sup> 沈楚文口述；呂政達撰文，《走出生命的幽谷：認識心理防衛機轉》，臺北市：張老師，2005，頁1。

<sup>201</sup> 沈楚文口述；呂政達撰文，《走出生命的幽谷：認識心理防衛機轉》，臺北市：張老師，2005，頁133-153。

①分離作用 (Dissociation): 在這個作用裡, 當事人會毫無知覺地將他日常行為模式的某個部分分離出來, 使其單獨發生作用。

②象徵化作用 (Symbolization): 當事人在潛意識的運作裡, 用一個較為中性的想法或對象, 來代表、象徵另一個被禁忌的想法或對象。

③理想化作用 (Idealization): 當事人會對他喜歡的人或物, 給予過高的評價和看重, 通常表現於青春對異性的讚美。

④幻想作用 (Fantasy): 幻想是當個人遭遇挫折後, 陷入一種心理畫面或想像中, 用逃避現實的方式應付挫折, 也常稱為「白日夢」。幻想可以使個人的情緒在挫折後獲得平緩的機會, 提高個人對未來的希望, 但經常性的幻想, 去會造成對現實的扭曲, 傷害到當事人。

透過本研究所使用之各樣化的防衛機制型態可以得知, 人類於日常生活中運用了各種管道使心理維持表面平衡的狀態, 為了繼續面對現實環境而穩定自己正常心理的方式。換言之, 防衛機制作用普遍應用於每個人的日常心理調適。因此, 本章第二節將先探出主角的心理症狀, 藉由心理症狀的解析, 於第三節裡再去歸納心理症狀形成與轉化之中, 他如何運用了上述之防衛機制來保護自己受傷與挫折後的心理重建。

## 第二節 以佛洛伊德解析主角心理症狀

在兒子還很小的時候, 他已開始對其母親形成一種特殊的情感, 他認為母親屬於他, 並且他開始感到父親是爭奪他唯一的所有物的對手。<sup>202</sup>

-佛洛伊德

文本所談及的感情, 表面上顯而易見的為「親子之情」, 但因故事背景與角色身分, 使之營造出更多潛在深層的意義。上一章已先對文本中影響太郎極深的母親做了介紹, 雖然主角太郎並非直接與愛情與愛慾有所牽扯, 但從小依賴著唯一陪伴於自己身旁的人所傳遞的愛(第二章裡筆者解析後認為並非如此單純的母愛)之影響氛圍下, 再加上佛洛伊德的思維中對男孩的第一愛戀對象即是「母親」的概念, 即「伊底帕斯情結(戀母/父情結)其實為愛欲的開端, 愛不過是性本能以性滿足為目的的對象投注<sup>203</sup>」, 正所謂「伊底帕斯情結在人格的結構化與左右人類的慾望上扮演著根本的角色。<sup>204</sup>」從這樣的思考脈絡下去先行定義的話, 不排除有戀母情結<sup>205</sup>的可能性。而從文章中可以見得, 母親與太郎之間的關係有些許的微妙, 在母親所給予的母愛裡包含了對於前夫愛情的轉移時, 太郎對於母親的喜愛, 也似乎看得到佛洛伊德所說的伊底帕斯情結殘留的愛戀痕跡。例如, 太郎看著母親的穿著旗袍的場景, 眼中感官所描述出的字句表達出強調「ぴったり身體(貼身)」的描繪……

<sup>202</sup> 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論》,張愛卿譯,臺北市:米娜貝爾製作:紅螞蟻總經銷,2000,頁242。

<sup>203</sup> 佛洛伊德,《佛洛伊德之性愛與文明》,楊韶剛譯,臺北縣中和市:百善書房,2004,頁261。

<sup>204</sup> Jean Laplanche; J.-B. Pontalis,《精神分析辭彙》,沈志中;王文基譯,臺北市:行人出版:遠流總經銷,2000,頁86。

<sup>205</sup> Jean Laplanche; J.-B. Pontalis:「指兒童所感到對雙親的愛戀與敵意慾望的組織整體。在所謂正面形式中,該情結以一如伊底帕斯王故事所述的方式出現:希望其對手-同性人物-死的慾望,以及對異性人物的性慾望。在負面形式中,它出現的方式相反:對雙親中同性者的愛,以及對異性者的妒恨。事實上,上述兩種形式均不同程度地存在於伊底帕斯情結所謂完整的形式中。」

Jean Laplanche; J.-B. Pontalis,《精神分析辭彙》,沈志中;王文基譯,臺北市:行人出版:遠流總經銷,2000,頁86。

……(略)……今日に限って派手な美しい長衫を、ぴったり身體に合はせて着て居た。<sup>206</sup>

……(略)……不過今天卻穿著華麗而合身的長衫(旗袍)。<sup>207</sup>

再者，像是看見母親美麗的身影時情不自禁的緊抱母親的動作，愛撫的動作更是顯露出對於母親超乎親情的情愫。

實際母の瞳には美しい涙の玉が滲み出て居た。その姿は太郎には今迄にない美しい姿に見えた。それで固く抱き直して背中を愛撫しながら耳元で「いつ式をお上げになるの」と問うた。<sup>208</sup>

實際上母親的眼眶已經孕育著美麗的淚水。這是太郎從來沒有見到母親漂亮的姿容。因此，緊緊地抱住，撫摸了脊背，在耳畔問道。「什麼時候舉行婚禮？」<sup>209</sup>

因此，筆者決定大膽沿用佛洛伊德所稱戀母情結為愛欲的開端，第一位所愛的投射對象假設於「母親」身上，作為發掘主角心理的出發點。

以下為主角簡單的基本特徵：

出生背景	殖民地時期的本島(台灣)
姓名	內地名
血緣關係	父親-內地人(日本) 母親-本島人(台灣)
單親家庭	本島人母親扶養 未見過面的父親

筆者以「戀母之情」為首要思考因子，藉由此理論感受文本角色之十七歲男孩太郎，正值青春期的他<sup>210</sup>，感受其感情下所涵蓋的演化歷程與其複雜的曲折內心世界，以至於了解情緒失控的緣由。如同人出生所皆會面臨的初期心境而漸漸演化於無形中或透過自身無意識下的調節，轉換大眾所可接受的正常軌道之過程與萌發的可能性<sup>211</sup>。

<sup>206</sup> 黃氏寶桃，〈感情〉，《台灣文藝》，第三卷第四五期，1936年4月20日，頁23，收錄於《台灣新文學雜誌叢刊》，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81年復刻版，第十冊。

<sup>207</sup> 葉石濤，《葉石濤全集22，翻譯卷二》，高雄市：高市文化局；台南市：國立台灣文學館，2006-，頁182。

<sup>208</sup> 黃氏寶桃，〈感情〉，《台灣文藝》，第三卷第四五期，1936年4月20日，頁24-25，收錄於《台灣新文學雜誌叢刊》，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81年復刻版，第十冊。

<sup>209</sup> 葉石濤，《葉石濤全集22，翻譯卷二》，高雄市：高市文化局；台南市：國立台灣文學館，2006-，頁184。

<sup>210</sup> 太郎が十七になるまで、内地人を一度夫に持って子供まで生み、その上捨てられたと云ふ世間に對するはづかしさから、一ツは内地人の間に出来た兒と云ふ太郎を育てる一心から、ずっと獨身を通して来た母は、益々孤獨感到耐えられなくなって叔父の進めのまゝに結婚話を承知したのだった。

黃氏寶桃，〈感情〉，《台灣文藝》，第三卷第四五期，1936年4月20日，頁24，收錄於《台灣新文學雜誌叢刊》，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81年復刻版，第十冊。

直到太郎長到十七歲以前，為了一度嫁給內地人養下孩子而且被拋棄的對世間的羞愧，以及為了一心一意養育內地人之間養下的孩子太郎，一直過著單身生活的母親，越來越不耐孤獨感，答應了叔叔勸告的婚事。葉石濤，《葉石濤全集22，翻譯卷二》，高雄市：高市文化局；台南市：國立台灣文學館，2006-，頁183。

<sup>211</sup> Jean Laplanche; J.-B. Pontalis: 「根據佛洛伊德的說法，伊底帕斯情結的高峰時期在三到五歲之間的陽具期被體驗；其衰退則標示進入潛伏期。它於青春時期復甦，且多半會在某一特別類型的對象選擇中會被大致成功地克服。」

## 一、失衡的愛引起的「雙重依戀」

許多留到現在的偉大作品，原來的主題往往不再被讀者注意，因為事過境遷之後，原來的主題早已不使我們感覺興趣，倒是隨時從故事本身發見了新的啟示，使那作品成為永生的。<sup>212</sup>

-張愛玲

筆者非常贊同張愛玲所言之意，作家筆下所創造的人物與故事其實是有變化性的，透過讀者充分的想像空間，使既有小說之見解改變。筆者即是透過故事走向，發覺雖然說太郎起初的情感是由於母親所給予的母愛而起，或可以說小男孩天生所帶有的「戀母情愫」，但如同筆者第二章裡所言，因母親給的不單只是母愛那樣單純下，進而間接造成太郎原本依戀母親的傾向有著另一條支線。

身為男性的太郎，依據伊底帕斯情結的影響，理所當然起初將會將愛戀對象投射「母親」一人，況且加深此情意的可以說是因「單親家庭」之下只接受到單一性母愛的關係，因此值得注意的是，出生於單親家庭與未見過父親的他而言，眼裡全是全心全意愛著自己而單身過活的母親，所以筆者認為無法衍生出佛洛伊德所謂的忌妒「父親」的這一部分，因為太郎在無法看見實體的父親與母親的互動狀況下是無法衍生出所謂的強烈忌妒或是父親為情敵之心態<sup>213</sup>。即便一開始對於傷害母親的那模糊父親的影子會心生不滿，但也由於母親從小於睡前所述說之床邊故事的影響下，對於母親述說時充滿著幸福過往的同時，也慢慢消除了父親曾經傷害母親的事實，反倒使太郎對於父親這未知人物所擁有的背景，漸漸建構起更大的好奇與幻想，此點可由文本太郎興奮之情為證。

太郎の母は彼が極く幼い時、寝付の悪い彼に床の中でやさしく未だ見ぬ父の國の話をよく聞かせて呉れた。タタミと云ふ不思議なものや、煉瓦も石も用ひない、木ばかりで造ってある、お伽話の中にでも出て来る様な小さな家の話だの、水が綺麗に澄んで居て、美しい花が澤山咲いて居る田舎の話を、感傷的な口調で話して呉れた。その度毎に太郎は益々寝付が悪くなって、興奮するのだった。<sup>214</sup>

太郎的母親，在他幼年時，在床上，給難以入睡的他常常溫柔的講尚未看到父親祖之國的故事。她用感傷的話談到榻榻米這奇異的東西，不用磚瓦，只用木材蓋造的，只有在童話故事裡才出現的小小房屋以及溪水清澈、盛

---

Jean Laplanche ; J.-B. Pontalis,《精神分析辭彙》，沈志中；王文基譯，臺北市：行人出版：遠流總經銷，2000，頁 86。

<sup>212</sup>張愛玲，〈自己的文章〉，《流言》，臺北市：皇冠，1991，頁 23。

<sup>213</sup>Jean Laplanche ; J.-B. Pontalis:「指兒童所感到對雙親的愛戀與敵意慾望的組織整體。在所謂正面形式中，該情結以一如伊底帕斯王故事所述的方式出現：希望其對手-同性人物-死的慾望，以及對異性人物的性慾望。在負面形式中，它出現的方式相反：對雙親中同性者的愛，以及對異性者的妒恨。事實上，上述兩種形式均不同程度地存在於伊底帕斯情結所謂完整的形式中。」

Jean Laplanche ; J.-B. Pontalis,《精神分析辭彙》，沈志中；王文基譯，臺北市：行人出版：遠流總經銷，2000，頁 86。

<sup>214</sup>黃氏寶桃，〈感情〉，《台灣文藝》，第三卷第四五期，1936年4月20日，頁 23，收錄於《台灣新文學雜誌叢刊》，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81年復刻版，第十冊。

開著美麗的鄉村的故事。每當這時候，太即便興奮得更加難以入眠。<sup>215</sup>

因此，筆者解讀下的太郎，後來漸漸走向並非完全單一性的依戀母親（沒有單一依戀父親的可能性），他其實有著雙向的依戀情緒，對於父親的依戀傾向竟然也是存在的。由此發展出太郎情感多變的走向，也將會豐富〈感情〉小說裡的糾葛情緒。

然而，強化他的父親記憶，不僅僅是母親的話語傳遞而已，更有著一股社會大結構下滲入的力量在催使他，並使他漸漸地走向依戀父親的傾向發展。整個當時殖民地台灣的風氣，如第一章介紹的殖民地台灣心理入侵太郎知覺感受並且孕化於自身體內的影子，即皇民化制度所內化於體內的天皇威權與優秀內地人人種的思維。雖生長於台灣，體內對內地產生自然而然的嚮往，並對內地人父親更富有崇拜感，反之則覺得本島人為劣等族群。關於太郎的先行探討裡，對於無父的單親男孩背景中，也了解到對於男孩來說，隨著年齡的增長，兒童對父親影響的需求也會不斷增加。父親在心中的位置，在日漸成長中的太郎內心漸漸開始佔有重要的地位，而會使其直接感受到父親與自身息息相關的正是因認識自己的名字開始的，那是屬於「內地人」所命名。於是，心裡開始產生不舒適的感受，起因於那感受居然矛盾著與自己身長的地方和母親本島人身分，這使得沉澱在心底的「血緣關係與母語意識」開始糾結著他，使自己處在一個「非純粹」的血緣與「非單一」的母語裡，這認知更刺傷太郎原本的自信，並開始漸漸對於混雜不清的自己感到自卑。

太郎の名前は、内地人が付ける名である事は、母から聞いて始めて太郎に解った。内臺人の間に出来た児である事は、少なからず彼の自尊心を傷付けた。<sup>216</sup>

太郎這種名字，唯有內地人（日本人）才會取的名字這個事實，從母親嘴裡聽見了以後，太郎才開始明白，他是內台人結合才會生下來的東西，這多少傷了他的自尊心。<sup>217</sup>

漸漸長大後的他，了解自身留著兩種血統，本不應該有著異樣的情緒（人皆有的原始自戀<sup>218</sup>影響，使其認同自己為完美），卻因為受社會風氣感染而產生本島人與內地人的優劣區別性思維已逐漸內化成自我概念，進而導致自尊心受傷（本島人代表著的劣等人種），再加上一直以來自己最深愛的人是本島人的狀態之下，對於愛著本島人母親的自己，更想逃離周遭對於本島人的諷刺言語，逃避著對於所愛的對象母親的批判，畢竟聽到這樣的話語只會更刺傷他本身與母親。

本島人とさえ見ればリイヤと言って、劣等人種である様に思っているこ

<sup>215</sup> 葉石濤，《葉石濤全集 22，翻譯卷二》，高雄市：高市文化局；台南市：國立台灣文學館，2006-，頁 182。

<sup>216</sup> 黃氏寶桃，〈感情〉，《台灣文藝》，第三卷第四五期，1936 年 4 月 20 日，頁 22，收錄於《台灣新文學雜誌叢刊》，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81 年復刻版，第十冊。

<sup>217</sup> 葉石濤，《葉石濤全集 22，翻譯卷二》，高雄市：高市文化局；台南市：國立台灣文學館，2006-，頁 181。

<sup>218</sup> Jean Laplanche；J.-B. Pontalis：「原自戀指兒童將他所有力比多投資在自己身上的一種早發性狀態。次自戀指力比多從對象投資上撤回，迴轉至「自我」。」

Jean Laplanche；J.-B. Pontalis：「原自戀一般而言指稱最早的自戀，在選擇外在對象以前將自己當作是愛戀對象的兒童自戀。此種狀態對應於兒童相信其思維的全能。」

Jean Laplanche；J.-B. Pontalis，《精神分析辭彙》，沈志中；王文基譯，臺北市：行人出版：遠流總經銷，2000，頁 284。

の邊りの人達から逃れて行きたく<sup>219</sup>

這出自於他要逃避只要是就叫「リイヤ（你呀）」而當作劣等人種的周遭的人的念頭<sup>220</sup>

增強此意識的莫過於被群體心理態度所支配下的種族意識、階級偏見之縮影事件。文本中所以見得學校所面臨的排擠效應，給予他實際上之正面衝擊與刺激，此經驗告訴了他，所謂的群體心理所排斥的非同質性的對象竟是他本身。

學校でも彼だけが、内地語と台灣語の持主だった。で、同級生達からのけ者にされて、何時でも偶の方に一人ぼっちで置かれた。<sup>221</sup>

在學校裡唯有他才會講內地話（日本人）和台灣話。因此，被同學排擠，時常獨自一個人在某個角落裡躲著。<sup>222</sup>

從太郎在學校的情況來看就可以知道，正因有著會說台灣話的相異性，而遭受奇異的眼光與不同的待遇。如佛洛伊德所言：「在一個偶和人群的各個成員能構成像心理學意義上的群體那樣的東西之前，必須滿足的條件是：這些個體必須彼此間有某些共同的東西，對某一對象的共同興趣，在某種或其他情境中相似的情緒傾向，以及（我想要插話說，「結果是」）「這些範圍的交互影響」。「這種心理的同質性」的程度愈高，個體就愈容易形成一種心理群體，並且群體心理的各種表現，也就愈顯著。<sup>223</sup>」這會使得太郎瞭解殘酷的現實，當融入一群同質性的團體內並且想得到認同，需要的首要條件是成為不會被排斥或被另眼看待的同類人，這也啟動了現實原則下自我保存的運作，保護自己就需要解決那本我與外在的衝突性。解決內在舒緩的方式，是將未曾見過面、遠在內地的高貴內地人父親轉為強化自身的精神武器，療癒自己受到團體打壓的自信。佛洛伊德又曾道：「出自群體的某些其他影響，有利於這種情感強化的機制，一個群體給個體的印象，是作為無限的力量和不可抗拒的危險。群體暫時取代了整個人類社會。人類社會是權威的行使者，個人對它的懲罰感到恐懼，因此，個人甘受如此諸多的抑制。對他來說，把自己與社會對立起來，顯然是危險的，而追隨他周圍的人的榜樣則更為安全，甚至也許「不惜與狼共舞」。在服從新威權的過程中，他可能會失去他先前的「良心」，如此聽任其消除抑制的確獲得了極度快樂的吸引。<sup>224</sup>」這樣的感染與暗示性是極為可怕的。因此，太郎開始昧著良心掩蓋自己本島人身份且對其貶低，並且漸漸對於吸引自己使自身快樂的母親有著「本島人身份」之事實有著否認的念頭。不同於以往的隨心所欲，因應周遭人群賦予來的效應，提高自己內地人身份且加強與之之關聯性——身為內地人父親的兒子。從太郎文本中最後的呼喊，可以得知內心深植的內地人意識已經是不容許任何人動搖了。

<sup>219</sup> 黃氏寶桃，〈感情〉，《台灣文藝》，第三卷第四五期，1936年4月20日，頁23，收錄於《台灣新文學雜誌叢刊》，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81年復刻版，第十冊。

<sup>220</sup> 葉石濤，《葉石濤全集22，翻譯卷二》，高雄市：高市文化局；台南市：國立台灣文學館，2006-，頁182。

<sup>221</sup> 黃氏寶桃，〈感情〉，《台灣文藝》，第三卷第四五期，1936年4月20日，頁22，收錄於《台灣新文學雜誌叢刊》，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81年復刻版，第十冊。

<sup>222</sup> 葉石濤，《葉石濤全集22，翻譯卷二》，高雄市：高市文化局；台南市：國立台灣文學館，2006-，頁181。

<sup>223</sup> 佛洛伊德，《佛洛伊德之日常心理分析》，楊韶剛譯，百善書房，2004，頁127-128。

<sup>224</sup> 佛洛伊德，《佛洛伊德之日常心理分析》，楊韶剛譯，百善書房，2004，頁130。

お母さん。僕は誰がなんと云っても内地人の子なんですよ<sup>225</sup>

媽!不論誰說什麼,我都是內地人的孩子啊!<sup>226</sup>

這顯示出高貴日本人的形象與以日本名命名(父親的姓)的自己早就在不知不覺中,因面臨自我尊嚴維護下已催化連結成一塊。這也牽扯到語言的影響力,當時殖民地下的台灣所用的語言為日語為主,這也宣稱了太郎出生後選擇的主要「母語」意識,從太郎家裡的鸚哥所言之語言,即可得知太郎在家庭中所慣用的言語。

窓際のいんこが朝のお早うを叫ぶ…<sup>227</sup>

窗邊的鸚哥叫了一聲早安啊! …<sup>228</sup>

從出生後得知有著日本姓名的印記、加上從小母親教育對內地美好的投射,再到社會上的薰陶下,刻印創造了太郎的超我結構,這樣的他對於內地人父親開始有著急迫性的需求,轉而調節原本單一依戀本島人母親的路線。本質上,太郎因為與父親並非實質的共存,導致他無伊底帕斯情結中男童弑父<sup>229</sup>的狀況,所以這樣的他也毋須壓抑對母親的愛意,在無別的女性與他所爭而繼續無阻的戀母情誼之下,引導出另一條依戀的對象—內地人父親,加上隨著受外界壓力下所帶來的內地人父親優秀的思緒,增強了認同作用,也間接填補心理本身沒有父親與父愛的殘缺。從此視父親為模範人物甚至是幻想著哪日見到他,這可說是如同偶像崇拜的情愫,將其理想化<sup>230</sup>。使其如文章所述,展現出對父親強烈的期盼。

太郎の平常から氣にかけて居る唯一つの願ひは、内地人である父に逢ひたい事だった。<sup>231</sup>

太郎平常所掛念的唯一願望是想要跟內地人的父親見一次面。<sup>232</sup>

太郎的雙依戀情結就在看似沒有衝突下發生,殊不知這樣的雙向依戀還是無法滿足內心的慾

<sup>225</sup>黃氏寶桃,〈感情〉,《台灣文藝》,第三卷第四五期,1936年4月20日,頁26,收錄於《台灣新文學雜誌叢刊》,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81年復刻版,第十冊。

<sup>226</sup>葉石濤先生對於日文版原文的最後一小段並未翻譯,因此,此處筆者自行翻譯處理。

<sup>227</sup>黃氏寶桃,〈感情〉,《台灣文藝》,第三卷第四五期,1936年4月20日,頁22,收錄於《台灣新文學雜誌叢刊》,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81年復刻版,第十冊。

<sup>228</sup>葉石濤,《葉石濤全集 22, 翻譯卷二》,高雄市:高市文化局;台南市:國立台灣文學館,2006-,頁181。

<sup>229</sup>佛洛伊德於精神分析綱要裡介紹精神分析工作實例中,說明每個孩子必定都會歷經之伊底帕斯情結的過程。佛洛伊德命名戀父或戀母情結為伊底帕斯情結的由來正是從希臘傳說中一名英雄伊底帕斯因不知道誰是他的親生父母,所以在無意識中,他殺了父親,娶了母親的弑父故事。並且還引用了法國科學家狄德羅說過的一段話,來證實伊底帕斯情結的存在,表達壓抑的戀母愛意所會產生的可怕後果。「如果這個搖籃中的小傢伙在完全自由的環境中成長並保留他的全部愚昧的話,當三十歲男人的強烈情慾加入他那幼小的頭腦裡時,他就會勒死父親,然後和母親睡在一起。」

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導論演講新篇》,周林譯,台北市:華成圖書,2003,頁284-297。

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導論演講》,周林譯,台北市:華成圖書,2003,頁311-330。

<sup>230</sup>佛洛伊德:「理想化是一個關係到「對象」的過程,透過理想化,個體在不改變對象的條件下,在心目中將對象聚集和誇大。理想化既可產生於對象性力中,亦可產生於自我性力中,譬如,對某一對象性的高估便是它的理想化。」

佛洛伊德,《佛洛伊德之性愛與文明》,楊韶剛譯,臺北縣中和市:百善書房,2004,頁196。

<sup>231</sup>黃氏寶桃,〈感情〉,《台灣文藝》,第三卷第四五期,1936年4月20日,頁23,收錄於《台灣新文學雜誌叢刊》,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81年復刻版,第十冊。

<sup>232</sup>葉石濤,《葉石濤全集 22, 翻譯卷二》,高雄市:高市文化局;台南市:國立台灣文學館,2006-,頁182。

望，更對於自己造成無形建構於內在的沉重心理壓抑現象。

## 二、尋求平衡過程的「矛盾與抑鬱」

一個男子不僅對其父親有一種矛盾態度，對其母親有一種深情的對象選擇，而且他還同時像一個女孩那樣，對他的父親表示出一種深情的女性態度，對母親表示相應的敵意與妒忌。

-〈自我與本我〉<sup>233</sup>

對於戀母又戀父的兩條線中，漸漸交叉且產生衝突，使得太郎動搖並需游移抉擇，這進而關係到那潛在部分的恨意與不滿油然而生，造成情感衝突的潛在因素。此正表達佛洛伊德所言：「差不多在每一個對某個人產生強烈情感依戀(emotional attachment)的事例中，我們都可以發現，在柔情蜜意的背後，在潛意識中，隱藏著敵意(hostility)。這是人類情感矛盾的經典性例證，或曰原型(prototype)。這種矛盾現象或多或少存在於每個人的先天素質之中……(略)……這種原發性(original)情感矛盾的大量存在是強迫性神經症的一個典型特徵<sup>234</sup>……(略)……」。也就是精神分析中的「情感矛盾」(ambivalence)作用的體現，它涉及某個客體的衝突感受和傾向同時並存，或稱作「矛盾雙重性」。詳細說明即「在對同一個對象的關係中，同時存在相互對立的傾向、態度及感覺-特別是愛與恨。<sup>235</sup>」對於戀母與戀父這兩位依戀對象，因有著不同方向面的愛恨矛盾交疊的影響，無形下，太郎的內心還是存在隱隱作亂的罪惡感與自卑感。從小看著辛苦扶養自己還為了離棄他們的男子傷心哭泣的母親，使太郎本我內心對於母親滿滿的愛裡有著應當保護母親的心理。但對於外界眼光看來，所愛的母親並非那麼美好，包含母親的身分與外界對女子獨自帶大孩子的解讀裡，總是多了許多閒言閒語的負面評論。內地父親對於太郎而言是抱怨的對象，但卻也是為自己解套的重要人物。內地父親若真實存在，喚回的是外界對於自己與母親的尊重，自我價值也會提高。處於高度自卑的太郎需要內地父親的角色緩解自己對自己的貶抑。對於所依戀的母親與父親，罪惡感與自卑感都是同時於兩條依戀中存在。那罪惡感來自於他崇拜著使他所愛的母親傷心的內地人父親，而自卑感來自於提醒著自身為半個本島人身分的母親，這一切使得太郎的本我、自我與超我持續性在潛意識下互相反抗著，即佛洛伊德所言：「罪惡感（以及自卑感）也能被理解為自我和自我理想之間的緊張表現。<sup>236</sup>」、「表示著自我的兩種動因之間的尖銳衝突-過於敏感的自我理想，無情地譴責處於自卑和自貶錯覺中的自我<sup>237</sup>。」由於與所愛的人有關的實際傷害和失望，這種對象關係變得不穩定，所以依戀的對象必須轉變，但父親與母親之兩者對象已經不再能完全的愛戀投注與支撐性慾滿足，雙向依戀開始漸進式的消失，開始將自身去替代補足對象，以求認同的途徑達到自我保護，得以完全建立自我投射的美好連結<sup>238</sup>。這使得太郎開始由母親與父親之所渴望的部分將選擇性的納入（可被接納的同一性），兩者的影子自

<sup>233</sup> 佛洛伊德，《佛洛伊德文集》，車文博主編，第四卷，長春市：長春出版：新華發行，1998，頁154。

<sup>234</sup> 佛洛伊德，《佛洛伊德文集》，車文博主編，第五卷，長春市：長春出版：新華發行，1998，頁59。

<sup>235</sup> Jean Laplanche；J.-B. Pontalis，《精神分析辭彙》，沈志中；王文基譯，臺北市：行人出版：遠流總經銷，2000，頁20。

<sup>236</sup> 佛洛伊德，《佛洛伊德之日常心理分析》，楊韶剛譯，百善書房，2004，頁169。

<sup>237</sup> 佛洛伊德，《佛洛伊德之日常心理分析》，楊韶剛譯，百善書房，2004，頁170。

<sup>238</sup> 佛洛伊德：「認同作用的情況下，自我用對象的特性豐富自己，它把對象「內向投射」於自己。而在愛極端發展的情況下，自我是貧乏的，它使自己屈服於對象，它用對象取代它自己最重要的部分。」佛洛伊德，《佛洛伊德之性愛與文明》，楊韶剛譯，臺北縣中和市：百善書房，2004，頁266。

動加於自我（漸進式轉移到自身），以求保存不被干擾（罪惡感與自卑感作祟）。筆者認為對於太郎而言，母親對於他的感情（母愛-促使太郎有著溫柔體貼的一面<sup>239</sup>）被保留下來，而被拋棄的是身分，如文章中他提及母親同內地人般的性格來看，太郎依戀著母親，已經有著用其餘內地人的特點覆蓋著母親本島人身分的思維。

母が何事によらず内地風に控へ目にする性質を知って居たから、素晴らしい花嫁が出来ると思った。<sup>240</sup>

他知道母親任何事都像內地人一般保守的性質。料想有漂亮的新娘子會出現了。<sup>241</sup>

反之，渴望的內地父親之給予的照顧（父愛）需要被放棄，留住的則是內地父親的身分背景（內地人<sup>242</sup>）。這樣的父親變成一位雖未曾付出過責任，卻依然被崇拜、依戀著。因此，小說內看不到太郎對內地父親的任何不滿。這正剛好吻合佛洛伊德所言的一句話：「拯救僅僅是針對父親時，其幻想中包含的意思主要是保持自尊；如果這種拯救是指向母親，它包含的就主要是一種感恩的柔情。<sup>243</sup>」雙依戀的太郎所拯救的特徵正是那自尊（內地人高尚血統）與恩情（獨力扶養他成人）。看出矛盾下正在崩潰的雙依戀對象，也十足地體現雙向依戀對象部分受到了壓抑與部分被理想化的現象，這也關係到後續理想自我之重建。

因此，這類事態還有些模糊，特別是由於只有一些抑鬱症的形式和病例，得到了精神分析的研究。我們迄今只是理解那些對象被放棄的病例，因為該對象本身顯得是不值得愛的。然後，憑藉認同作用。它在自我之內再次被建立起來，並受到自我典範的嚴厲譴責。指向對象的責難和攻擊，以抑鬱性自責的形式顯露出來<sup>244</sup>。

<sup>239</sup>從文本中太郎母親再嫁，詢問太郎時可以發現他為了母親著想的心理。

「え、い、ですとも。僕はお母さんのために大變うれしく思ひますよ。今迄僕のためにどんなに淋しい思ひをなされたか。耐えられない苦しさに耐えて来たか、僕には分って居るんですから」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お前がそう云って呉れると、何だか涙が滲んで来そうな気がします」

「僕がい、も悪いも無いんです。僕はもうこれ以上お母さんの淋しいお姿を見たくないんです」

黃氏寶桃，〈感情〉，《台灣文藝》，第三卷第四五期，1936年4月20日，頁24，收錄於《台灣新文學雜誌叢刊》，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81年復刻版，第十冊。

「嗯，好哇！我為了媽而非常高興，為了我，媽不知忍耐了多少寂寞呢！我充分明白嗎忍受了無法忍受的痛苦。」

「謝謝！你這樣說，似乎眼淚快要滴下來了。」

「以我來說沒有所謂的好和壞，我再也不想看到媽寂寞的樣子。」

葉石濤，《葉石濤全集 22，翻譯卷二》，高雄市：高市文化局；台南市：國立台灣文學館，2006-，頁184。

<sup>240</sup>黃氏寶桃，〈感情〉，《台灣文藝》，第三卷第四五期，1936年4月20日，頁25，收錄於《台灣新文學雜誌叢刊》，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81年復刻版，第十冊。

<sup>241</sup>葉石濤，《葉石濤全集 22，翻譯卷二》，高雄市：高市文化局；台南市：國立台灣文學館，2006-，頁184。

<sup>242</sup>文本太郎內心所提及到自己的想法：

内地人を父として此の世に出て来た人間なんだ。

黃氏寶桃，〈感情〉，《台灣文藝》，第三卷第四五期，1936年4月20日，頁25，收錄於《台灣新文學雜誌叢刊》，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81年復刻版，第十冊。

以內地人為父親誕生的人。

葉石濤，《葉石濤全集 22，翻譯卷二》，高雄市：高市文化局；台南市：國立台灣文學館，2006-，頁185。

<sup>243</sup>佛洛伊德，《佛洛伊德之性愛與文明》，楊韶剛譯，臺北縣中和市：百善書房，2004，頁112。

<sup>244</sup>佛洛伊德：「更確切地說，指向對象的責難和攻擊，把自己隱匿在指向主體自己的自我的責難後面，致使

上述得知雙依戀的兩條路線並非是平行無礙，不斷反彈的內心使雙依戀漸漸走向消失的時期對太郎而言是難熬的，卡在中間的模糊地帶裡，他急著找到新的定點對象來灌注愛欲，選擇愛的對象以憑藉所認同下的優與劣而加以取捨，再次在自我內重新建構。但即使這樣做的太郎，畢竟是無法蒙蔽最真實的本我與改變旁人的觀點與認知。此方式選擇性下基本上就存有缺陷，因為那些被挑剔掉的「不完整的呈現」其實等於「真正的本我」，它們皆是愛的對象與自身的一份子。即簡而言之看來，「無父愛」與「半個本島人身份」的他是被拋棄掉的，或可以說無意識下所作出的逃避，他只不過繼續在自我欺騙與保護下生存（背叛了愛的對象並且與原始自戀<sup>246</sup>相悖離）。佛洛伊德論述悲痛與抑鬱現象時所言及的狀況正是太郎此刻的寫照。

首先存在著對象選擇，性慾本能使自己依戀於某人母親，後來由於與所愛的人有關的實際傷害和失望，這種對象關係變得不確定了。其結果並不是正常地從這個對象撤回性慾本能衝動，並將其轉移到新的對象上去，這需要各種條件。事實證明對象發洩的抗拒能力很小，從而被拋棄了。但是撤回到自我的、已自由的性慾本能並沒有指向其他的對象。它並沒有應用幾種可能方式中的任何一種，而只是確立了自我與被拋棄對象之間的同一性（identification）。這樣，對象的影子就落在自我身上，後者就像是被遺棄的對象一樣受到心理力的批判。透過這種方式，對象的失去就轉變為自我的失去，在自我與愛人之間的衝突就轉變為自我批判能力與由上述認同作用造成的自我之間的分裂。<sup>247</sup>

-佛洛伊德

無意識下正崩壞兩條依戀的走向，正因失去愛的支柱使得太郎漸漸衍生出抑鬱的悲傷<sup>248</sup>之性格。值得注意的是，抑鬱與悲傷不相同的地方，參照佛洛伊德所言：「抑鬱表現出一些在悲傷中沒有的東西—極度地陷入自重，自我極度匱乏。悲傷時，世界變得貧乏空虛，抑鬱時則是自我變得貧乏空虛。<sup>249</sup>」因此太郎的自我將變得無力，有如被挖掉的坑洞一般，失去的那些本來屬於他自己的一部分，皆是自我完整的要素。產生抑鬱的自我譴責裡也顯示出佛洛伊德所言及到的一句：「否定與被壓抑的東西有關。<sup>250</sup>」受到所接觸環境下被否定的自己，正是為保護防止受傷與怕被

---

它們帶有抑鬱症患者的自責特有的那種固執、頑強和迫切。」（出自原註）

佛洛伊德，《佛洛伊德之日常心理分析》，楊韶剛譯，百善書房，2004，頁173。

<sup>245</sup>佛洛伊德，《佛洛伊德之日常心理分析》，楊韶剛譯，百善書房，2004，頁172。

<sup>246</sup>Jean Laplanche；J.-B. Pontalis：「原自戀指兒童將他所有力比多投資在自己身上的一種早發性狀態。次自戀指力比多從對象投資上撤回，迴轉至「自我」。」

Jean Laplanche；J.-B. Pontalis：「原自戀一般而言指稱最早的自戀，在選擇外在對象以前將自己當作是愛戀對象的兒童自戀。此種狀態對應於兒童相信其思維的全能。」

Jean Laplanche；J.-B. Pontalis，《精神分析辭彙》，沈志中；王文基譯，臺北市：行人出版：遠流總經銷，2000，頁284。

<sup>247</sup>佛洛伊德，《佛洛伊德著作選》，賀明明譯，台北市：唐山出版社，1989，頁69。

<sup>248</sup>佛洛伊德：「抑鬱以某種方式與無意識地失去所愛對象有關，這與悲痛不同，在悲痛中並沒有失去甚麼無意識的東西。」

佛洛伊德，《佛洛伊德著作選》，賀明明譯，台北市：唐山出版社，1989，頁66。

<sup>249</sup>佛洛伊德，《佛洛伊德著作選》，賀明明譯，台北市：唐山出版社，1989，頁66。

<sup>250</sup>佛洛伊德，《佛洛伊德著作選》，賀明明譯，台北市：唐山出版社，1989，頁79。

否定的心態下才壓抑<sup>251</sup>住的那失去之身分與愛，但在自我典範（排斥不完美）之持續的壓制與要求下，使他異常地為難與痛苦，這一切都迫使自己瞭解自我所匱乏（自我典範的刺激所造成的不足感）與提醒他自身所逐漸失去掉之原本該有的愛（依戀關係與原始自戀）。雙依戀崩塌後的時期，他回歸於孤獨無助的一人。從文本中寫到太郎的外在來看，可以瞭解其不同於他人的憂鬱內縮性格。

本島人獨特の無表情な顔付は、太郎を實際以上にいぢけた子供に見せた。

252

本島人獨特の毫無表情的相貌，使太郎顯得比實際上更畏縮的小孩。<sup>253</sup>

這樣抑鬱下的太郎，需要另一個自我空間來填補。他急需新的對象轉移愛的投注，而那空間是需要無人可以介入與替補的，而那對象是需要符合自我典範之要求以滿足自己的高度自尊與渴望而且不被壓抑的心態，那像是不會背叛自己的愛人。那個角色，他必須是完全能代替與內化的對象。如佛洛伊德所言：「被拋棄或失去的對象認同，作為對於那一對象的替代—將對象內向投射於自我<sup>254</sup>」，也就是投注對象至「太郎自己本身」，愛自己而非愛他人，這樣的對象絕不會棄他而去。由個體經驗證實的如何作一名全能者，即完美形象的對象，用它來建立自我理想並且實現它的要求，這樣就可以貼切地不被外界與內在的衝突所傷。此時，正是自我保護與重生所啟動的狀態，曾經因為陶醉於真實的自我（原始自戀<sup>255</sup>）造成傷害的他，使愛回歸到本質上自尊的角落，「自愛」（self-love）產生，進入為自己確立了一種「理想」（ideal），以這份「理想」檢驗自己實際的自我，並且達成實現「理想」的階段<sup>256</sup>。抑鬱的太郎，開始從「依戀傾向」轉入「自戀型」<sup>257</sup>的體現，從依戀養育自己的女子與依戀能解救他自卑感的內地父親，漸漸進入依戀重新創造過

<sup>251</sup> 佛洛伊德：「壓抑來自於自我，不過更確切地講，壓抑來自自我的自尊。」

佛洛伊德，《佛洛伊德之性愛與文明》，楊韶剛譯，臺北縣中和市：百善書房，2004，頁194。

<sup>252</sup> 黃氏實桃，〈感情〉，《台灣文藝》，第三卷第四五期，1936年4月20日，頁22，收錄於《台灣新文學雜誌叢刊》，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81年復刻版，第十冊。

<sup>253</sup> 葉石濤，《葉石濤全集22，翻譯卷二》，高雄市：高市文化局；台南市：國立台灣文學館，2006-，頁181。

<sup>254</sup> 佛洛伊德，《佛洛伊德文集》，車文博主編，第四卷，長春市：長春出版：新華發行，1998，頁89。

<sup>255</sup> 佛洛伊德：「兒童具有原始自戀：如果留意充滿感情的父母對其子女的態度，我們便不得不承認，這是他們早已拋棄的自戀的復活與再生。正如我們所知道的，選擇對象中的自戀特徵，由於高估而成為可相信的要點，它主導了父母的情緒態度。這樣他們便有了使孩子變得完善的衝動—掩蓋、忘卻孩子的缺點。冷靜的觀察絕對會如此（對孩子的性活動的否定也恰與此有關）。此外，為了孩子的利益，傾向於中止那些他們自戀被迫尊敬的文化習得的行為，同時，他們為了自己，傾向於重新喚起他們早已放棄的特權。孩子將會比父母更好的時光，父母不會讓孩子屈從於他們曾認為至高無上的東西。疾病、死亡、享樂克制與意志控制將遠離孩子，自然與社會法則將以孩子之嗜好予以取捨，孩子將再次真正成為創造的中心—孩子陛下，如同我們幻想的自己一樣。孩子將現實父母不曾實現的所有夢想—男孩成為偉人和英雄，以體現父親；女孩與王子聯姻，作為對母親「遲到」的補償。在自戀系統最棘手支點上，現實強加於父母自我的不朽性，在孩子身上找到了避風港。父母之愛—動人而天真的—不過是父母自戀的再生，雖然將其轉化為對象愛（object love），但卻明白無誤地顯露了它的原本質。」

佛洛伊德，《佛洛伊德之性愛與文明》，楊韶剛譯，臺北縣中和市：百善書房，2004，頁189-191。

<sup>256</sup> 佛洛伊德：「自尊的一部分是原始的，及嬰兒自戀的殘餘，另一部分則源於個體經驗證實了的「全能」（自我理想的實現），再一部分則來自對象性力的滿足。」

佛洛伊德，《佛洛伊德之性愛與文明》，楊韶剛譯，臺北縣中和市：百善書房，2004，頁207。

<sup>257</sup> 佛洛伊德：

「一個人可能愛的對象有：

(1) 按照自戀型

(a) 他自身（實際的他）

(b) 過去的他

後的自己。這也是筆者認為當太郎母親要再婚的時候，太郎並未因依戀母親之情，而反彈母親，反而還興奮地回問母親婚禮的日期之緣由。

「いつ式をお上げになるの」と問うた。

母は一度太郎を離して「式の日どりなんかは叔父さんにまかせてあるの」

太郎の肩をゆすぶって答えた。

太郎はうれしかった。<sup>258</sup>

「什麼時候舉行婚禮？」

母親有一度放開太郎，搖動著太郎的肩膀回答。

「婚禮的日子拜託你叔叔安排。」

太郎高興極了<sup>259</sup>

另外，這位本島人繼父與本身太郎依戀的內地人父親的身分是極具反差的。不論是繼父與父親的差別，或是本島人與內地人在太郎心裡的劃分，皆應該促使太郎有反彈的情緒才對。以下內容敘述，卻對於新的本島人繼父要進入自己房間觀看，並未反對

「それからね、今日あの方がお出になって、お前に合いたいんですって、だからお出になったらお前のお室に御案内をしても好いでせうね」

「え、好いですがとも。僕、ちゃ起きて室を一寸かたづけませうね」<sup>260</sup>

「還有，今天他會來，想要跟你見面，所以他來了，我會帶他到你的房間來，可以嗎？」

「好，那麼我就起床收拾一下。」<sup>261</sup>

從這裡也能推敲出太郎對於本島人母親與內地人父親之雙依戀傾向的淡化，並且演變為筆者所認為的自愛傾向，如下佛洛伊德對於「自愛」(self-love)所論述，開始了太郎的另一個心態轉變階段。

在許多愛的選擇形式中，該對象起著代替我們自己的某種未達到的自我理想的作用。我們愛它，是因為為了我們自己的自我所努力追求的完善性。我們現在願意以這種迂迴的方式，作為取得滿足我們自戀的手段。……

---

(c) 將來的他

(d) 曾經是他自己一部分的某人

(2) 依戀型

(a) 傾心的女人(或有人翻譯為: 養育他的女性)

(b) 保護過自己的男人。」

佛洛伊德，《佛洛伊德著作選》，賀明明譯，台北市: 唐山出版社，1989，頁 26。

<sup>258</sup> 黃氏寶桃，〈感情〉，《台灣文藝》，第三卷第四五期，1936 年 4 月 20 日，頁 25，收錄於《台灣新文學雜誌叢刊》，台北: 東方文化書局，1981 年復刻版，第十冊。

<sup>259</sup> 葉石濤，《葉石濤全集 22，翻譯卷二》，高雄市: 高市文化局；台南市: 國立台灣文學館，2006-，頁 184。

<sup>260</sup> 黃氏寶桃，〈感情〉，《台灣文藝》，第三卷第四五期，1936 年 4 月 20 日，頁 25，收錄於《台灣新文學雜誌叢刊》，台北: 東方文化書局，1981 年復刻版，第十冊。

<sup>261</sup> 葉石濤，《葉石濤全集 22，翻譯卷二》，高雄市: 高市文化局；台南市: 國立台灣文學館，2006-，頁 184。

(略)……自我變得愈益謙卑，對象則變得愈益高貴，直到它最後占據自我的整個自愛，這樣，其自我犧牲就做為自然的後果而出現。可以說，這個對象耗盡了這個自我。

-佛洛伊德<sup>262</sup>

但這樣的傾向其實是一種病態的自戀狀態，不同於天生之原始自戀，而是存於「自愛」(self-love)階段未走向「客體/對象愛」(object love)的展現。

### 三、啟動自我保護的「自愛與戀物」

理想自我此時成了自愛 (self-love) 的目標，童年曾為真實的自我所陶醉。個體的自戀將自身展示給這種新的理想自我，理想自我像早期自我 (infantile ego) 一樣，發現自己佔有有價值的所有成就。就性力的經常表現而言，個體再次表現出不能放棄曾經有過的滿足，他不願棄絕童年的自戀成就 (narcissistic perfection)，隨著年齡的增長，他為別人的告誡及自己的評判力的喚醒而煩惱，於是，他再也不能保持原來的成就，並尋求自我理想的新形式將其恢復，他為自己樹立的理想，不過是童年失卻的自戀的替代，在那種自戀中，他就是自己的理想。

-《佛洛伊德之性愛與文明》<sup>263</sup>

在發生不愉快和不能得到滿足的愛下，太郎發覺自我是貧乏的，需要再次創造與恢復。他開始用自我理想的新形式來鞭策自己製造不與之衝突的他。他要成為「理想化」的人物。找回自信或是恢復自戀的自己，甚至出現昇華作用(不好→好)<sup>264</sup>。這也是《文學文本的精神分析：佛洛伊德影響下的文學批評解析導論》<sup>265</sup>一書中解釋「理想」裡，提及所謂的「自我的理想」(ideal du Moi)：「它隨後出現於象徵體系。這回位於整體體系基底的不再是我自己，而是另一個人像。對於我來講另一個是我努力效仿的英雄。這種自我的理想的模式融合了家長的形象以及社會集體生活對人的種種要求。<sup>266</sup>」太郎藉由開始模仿理想的形象中，形塑完美的理想化人物，自己將不再只是愛的對象，反倒像是精神對象的指標，極度轉為戀著自己-「自戀」(narcissism)，但筆者認為這也是種封閉的狀態。依照貝爾曼-諾埃爾所言：「是透過兩種力量共同努力：自我的理想是積極的，具有鼓動性的一面；超我 (Surmoi) 則是消極的、以退化的方式運轉的一面。這兩種方式合於一起，共同把我們推向符合各種標準的理想。<sup>267</sup>」完成自愛的目標，才能愛著自己不再質疑。體現在於文本中，從兩方面可以看見痕跡。

<sup>262</sup> 佛洛伊德，《佛洛伊德之性愛與文明》，楊韶剛譯，臺北縣中和市：百善書房，2004，頁 264-265。

<sup>263</sup> 佛洛伊德，《佛洛伊德之性愛與文明》，楊韶剛譯，臺北縣中和市：百善書房，2004，頁 195。

<sup>264</sup> 佛洛伊德：「昇華則是一種出路，可以在無壓抑的條件下，滿足自我的這些要求。」

佛洛伊德，《佛洛伊德之性愛與文明》，楊韶剛譯，臺北縣中和市：百善書房，2004，頁 197。

<sup>265</sup> 貝爾曼-諾埃爾，《文學文本的精神分析：佛洛伊德影響下的文學批評解析導論》，李書紅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sup>266</sup> 貝爾曼-諾埃爾，《文學文本的精神分析：佛洛伊德影響下的文學批評解析導論》，李書紅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頁 41。

<sup>267</sup> 貝爾曼-諾埃爾，《文學文本的精神分析：佛洛伊德影響下的文學批評解析導論》，李書紅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頁 42。

「自愛」(self-love)下，先需要全心全意地深植意念去建立符合慾望下所理想中的角色—那位角色的它將等同於太郎並且給予自己愛的關注與激勵。它不僅僅是形象的代表，更是有著權力的象徵(包含父親/內地人)。筆者認為文本中的太郎開始從自己所可以改造的範圍內開始著手創造。透過無時無刻看得見且與其最貼近並可自行作主的房間擺設空間上，掛著那一閃閃發亮的日本國旗，那正是象徵他內心的澎湃熱情的嚮往內地，作為一名內地人所需要的愛國情操，也透過此而有不斷增強自己就是那個理想我的作用。

太郎の父が内地人であることから、母に無理に願って掛けてある小さな日本の國旗は、この調度の貧しい室の中で、一番晴やかな存在であった。

268

由於太郎的父親是日本人的緣故，強要母親掛的小日本國旗，在這家具缺乏的房間裡，是最華麗的存在。<sup>269</sup>

另外，穿在自身上那象徵性的內地人服飾，或可以說是已漸漸成為與他融合為一身的一層保護膜，即有此物才能體現自我的代表物之一。為了清楚騙過潛意識下那知覺，匱乏的自我必須完全讓內地人的特徵表露於外，因此內地人服飾穿在自身的象徵性身分，開始作為長期存在用來掩飾自己為內台人所生的孩子之武裝。這也成為「戀衣情結」，在衣物上尋求的寄託情愫<sup>270</sup>。我們從太郎母親要求他換下內地人服裝的場景來看，正有如一頭棒喝的作用般告知太郎本來屬於本島人的自己(那是自愛的條件中強烈壓抑著，使他遺忘的部分)。

「そうしてお呉れ、それから—お前には言ひにくいだけけれど、今着てる内地人の着物をこの臺灣服と變へて呉れませんの…」

太郎の表情はさっと變った。それを目ざとく見つけて、母は辯解する様に小聲になって

「あの人が臺灣の人だし、お前だって本居地は臺灣に有るのだから、殊更に内地の着物を着なくても好いぢやないの」

太郎は答えなかった。何と云はれぬ不決な氣持ちだった。<sup>271</sup>

「好。那麼這樣做好了。不過……很難向你開口，你要把現在穿的內地人衣服換上臺灣衣衫……」

太郎的表情突然變了，母親敏銳地看到，用辯解一般的心聲說：

「那人是台灣人，你也是生在台灣，並不需要特地穿著內地的衣服吧？」

<sup>268</sup> 黃氏寶桃，〈感情〉，《台灣文藝》，第三卷第四五期，1936年4月20日，頁22-23，收錄於《台灣新文學雜誌叢刊》，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81年復刻版，第十冊。

<sup>269</sup> 葉石濤，《葉石濤全集22，翻譯卷二》，高雄市：高市文化局；台南市：國立台灣文學館，2006-，頁181。

<sup>270</sup> 貝爾曼-諾埃爾：「戀物癖患者的慾望不是針對一個(由於自己缺少某樣東西而痛苦的)充滿渴望的主體，它針對的是一個對象—物(object-chose)。這個對象—物借助某一個人為現象將對象和物合成為一個整體，它是完整的，並服從於某個人的奇思怪想，並與這個人相互滿足。必要時，這個合為一體的對象—物可以被某一確定的部分對象所取代，後者可以使它變得完整，並成為它的濃縮。」

貝爾曼-諾埃爾，《文學文本的精神分析：弗洛伊德影響下的文學批評解析導論》，李書紅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頁31。

<sup>271</sup> 黃氏寶桃，〈感情〉，《台灣文藝》，第三卷第四五期，1936年4月20日，頁25，收錄於《台灣新文學雜誌叢刊》，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81年復刻版，第十冊。

母親雖然如此說，但是語尾低而微弱沒勁的聲音。

太郎並不回答。有不可形容的不愉快的心情。<sup>272</sup>

少了內地人衣物的太郎，保護層與安全感會盡失。那鏡子中那不穿著內地衣物的自己，也不再是灌注愛的對象，瞬間又丟失依靠。爆發情緒的結局，就能理解出要太郎脫下那該有的物件(自愛的自我理想中的一部分-整體完整中缺一不可的自己，若無只剩下赤裸著的空殼子)，等同於自我毀滅般之煎熬。結局底下，也看出太郎的心理，那不健康狀態的自愛傾向已經嚴重顯示出「無法面對真實自我」問題的隱憂。

確かに自分は内地人の子だ。然し母にまで殊更に内地と云事を強要するだけの権利があるだろうか。母の気持が段々分って来る様な気がした、太郎は再び横になって毛布をかぶると、不意に張り切って居た感情が融けて来て、感傷的な涙が出て来た。<sup>273</sup>

自己的確是內地人的孩子啊…但是，自己真的有權利對母親格外地強求內地的事嗎?漸漸的太郎開始感受到母親的心情，他再次躺回臥床蓋上毛毯的瞬間，不經意地一股難以言喻的交雜情感湧了上來，感傷的眼淚默默地從眼角滑落。<sup>274</sup>

也因走向自愛的太郎，已經不再將愛投注於他人。因此，母親再婚的事情與接受新任本島人父親，他都可以坦然面對。即使母親擁有另一位愛戀對象，而那並非是崇拜的「內地人」也並非屬於「自己」的情形，可以看見對「母親」加諸的強烈依戀感已經深埋與淡化。對「父親」的角色加諸的內地情結對於太郎而言也無關緊要，因那腦子中內地父親早已轉化為內地的形象。以自我思考為出發點，透過將內地與母親之情愫結合於內地衣物與自身的融合之中，作為保護自己的方式。爆發情緒地當下，見到傷心欲絕的母親，太郎也下意識的展現出保衛自己而以自我為中心的態度冷血地看待母親的傷感……

太郎は母の泣いて居る姿が何だか空々しく思はれた。自分の主張が通されなかったから泣いて胡麻化して居るのだとも思った。<sup>275</sup>

太郎不知為何地認為母親流淚的姿態很虛偽。覺得那只是自己的主張不被接受而以哭泣騙取同情罷了。<sup>276</sup>

日治時期帝國強權下生存的他，「自愛」使其相信自身等同於一位強者。畢竟弱者要強化自身才能不被受傷害，內地衣物、日本國旗、父親、母親，集結而成的自己就宛如是那強而有力的內地國家的象徵。

簡而言之，筆者認為太郎複雜的心理層次在於他擁有的伊底帕斯情結、雙依戀情結、抑鬱矛

<sup>272</sup> 葉石濤，《葉石濤全集 22，翻譯卷二》，高雄市：高市文化局；台南市：國立台灣文學館，2006-，頁 184-185。

<sup>273</sup> 黃氏寶桃，〈感情〉，《台灣文藝》，第三卷第四五期，1936 年 4 月 20 日，頁 26，收錄於《台灣新文學雜誌叢刊》，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81 年復刻版，第十冊。

<sup>274</sup> 葉石濤先生對於日文版原文的最後一小段並未翻譯，因此，此處筆者自行翻譯處理。

<sup>275</sup> 黃氏寶桃，〈感情〉，《台灣文藝》，第三卷第四五期，1936 年 4 月 20 日，頁 26，收錄於《台灣新文學雜誌叢刊》，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81 年復刻版，第十冊。

<sup>276</sup> 因無中文版本，此處為筆者自行翻譯處理。

盾性格及戀物特徵，最後發展出的這個自愛階段。最後小說的結局也看得到，為自己締造安全堡壘而選擇自愛的太郎，若受到與自愛(即理想自我)不吻合的刺激時，很容易像被戳破的氣球般洩氣與損毀。因為太郎無法作真實的自己，只能一直壓抑自己並處在理想自我的狀態，而那些皆是需要靠外在的物質來替代自己，以「戀物的他」不斷強化自己—那半個虛假的我。處在自愛與戀物的狀態是非常敏感脆弱需要被保衛的，這也是此〈感情〉小說的人物極具悲傷無奈的地方。筆者作了以下圖表，以簡單地方式勾勒出太郎複雜情結的流程，便於讀者對於此章所述較易概念化與理解，也利於後續以佛洛伊德之「人格結構」與「防衛機制」的運作來論述太郎的心理症狀。

(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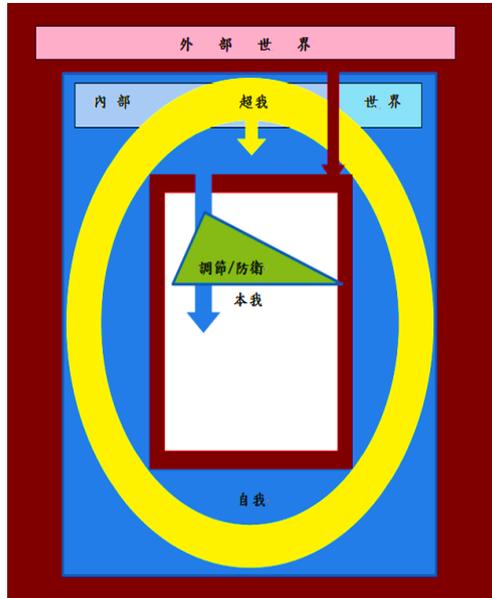


由此節可知，從佛洛伊德的思維裡看作家創造的角色是非常有趣的，它能深入發掘出人物的獨特性，例如本研究太郎他即有著若沒有相同經驗是難以感受的心理癥結。如筆者於第一章所指，黃寶桃筆下的太郎，其實是作為一位能顯示時代背景的有意義人物，於台灣日治時期裡，許多如同太郎身分般的人們，或許皆有著這樣的複雜心理症狀在內心深處轉折。因此，更深入的話，筆者以佛洛伊德的人格結構與防衛機制來細說太郎複雜的心理狀態流程(「雙依戀情結」→「矛盾抑鬱性格」→「自愛與戀物」)，在此之中感受太郎這些心理狀態是如何於「自我」、「本我」、「超我」三者之間糾結下所產生，而防衛機制的運作是處於哪種自我保護的模式下發生。

### 第三節 由主角的心理症狀看運作的「人格結構」與「自我防衛機制」

出生後的太郎其本身的原始自戀裡頭包含對他照顧呵護的第一愛戀對象母親(「戀母情結」)，因此並未有任何內心的衝突與不安，以至於人格結構與防衛機制並未產生衝突或調整，但漸漸

走向雙依戀的他，在人格結構中逐漸產生許多內心對立與摩擦。筆者將透過第一節整理後的人格結構區塊圖<sup>277</sup>(以下將放置小圖以方便讀者作對照)，來解析太郎這種在當時普遍有的複雜心理徵狀下所對應的外部世界與內部世界裡運作的情況，了解人格結構裡衝突的自我、本我、超我為了保護自己所引發出的防衛作用。



### 一、「雙重依戀」中的「人格結構」與「自我防衛機制」

雙重依戀的行進下，太郎的內心必須要拋棄「本島人母親」與「內地人父親」不被他接受的部分。首先從外部世界解析，外部世界的刺激與接觸，從最基本的外在環境來看，對太郎最有直接影響的力量，就是日治時期的社會風氣、家庭環境，以及學習場所；即內地與本島人的區別與地位高低、家庭中僅有本島人母親陪伴成長卻缺乏內地人父親這個角色、學校內的教學課程之內容與同儕間的互動接觸，造就太郎成為殖民地群體不平等心理、混血兒不純粹血緣、男尊女卑的社會下無父親陪伴之單親家庭兒童。他人所給予的影響力也屬於外部世界傳遞於自身的其中一部分，包含母親的教育以及同儕的接觸。因此，由母親給的內地父親之美好故事印象以及被同儕歧視的事件，使身為半個本島人的混血兒太郎，對於自身的某部分產生排斥感，且偏向認同內地相關的一切。而人格結構圖裡，由外部世界直接滲透至內部本我的紅色框架，使屬於並沒有與本我直接接觸，卻殘留於內部世界的本我的物質。筆者認為太郎的本我內無形之中殘留下來的外界殘留物，即有「母語意識-日語與台語」與「血緣連結-內地與本島」。

因此，本我在有著原始自戀的影響下，認同自己天生所有的狀況，即包含了①外部世界之殘留物：天生擁有的雙母語意識與體內兩種血緣的關聯；②依戀於身旁照顧自己的女性，對於養育自己的母親充滿疼惜與依戀情愫，出自於單親家庭與伊底帕斯情結影響下，敬愛母親成為理所當然；③內地人父親被視為是拋棄者、失職角色，然而雖恨傷害且拋棄母親的父親，但又卻矛盾於天生對於父愛的需求。

超我則受上述外部世界感染下於自我內形成，筆者歸納出太郎的超我會有以下幾點心理特質表現，包含①追求父親的優越感，反映無父親的自卑感；②追求單一血緣的純粹，反映自己混雜血緣的不純粹感；③優秀的內地人，造成對屬於本島人母親的排斥感；④屬於優秀內地人之父親的認同感。於是，這樣的超我開始深入觸角命令自我去抑制本我的慾念。

自我接觸到外在訊息與超我給的壓力，都表示出本島人母親的不足，還有內地人父親的崇高存在。急需要自我來解決的問題是，①本我對於喜愛母親的依戀慾念以及取消對於父親的恨意；②需要轉變本我去依戀尊重那位失職父親的角色。

自我接觸到外在訊息與超我給的壓力，都表示出本島人母親的不足，還有內地人父親的崇高存在。急需要自我來解決的問題是，①本我對於喜愛母親的依戀慾念以及取消對於父親的恨意；②需要轉變本我去依戀尊重那位失職父親的角色。

因應超我的要求中，自我在調節本我的需求產生了困難與衝突，使得防衛機制<sup>278</sup>（自我與外

<sup>277</sup> 參照(圖一)，頁 52。

<sup>278</sup> 以下所列之防衛機制，請參照第一節筆者整理之說明表格，頁 54-55。

部世界接觸，會壓抑本我慾念，調節與外部之衝突，產生防衛機制)開始運作。太郎與母親之間相依為命的情感，使得太郎的本我依戀母親的情感，是極其自然與理所當然的感情投注對象。但漸漸於自我接觸到外界世界的影響下與孕育而生的超我逼迫之中，接收到因為母親的本島人身分，導致自己並非是完全的內地人之挫敗感，認知到本我依戀母親的全部是不被超我認同與允許的。自我試著調和超我與本我之相互抵觸，愛「本島人母親」與恨「內地人父親」這本我的狀態，被自我接收外界的壓力下壓抑轉為愛「母親」恨「本島」與恨「父親」愛「內地」的型態。因為這是自我調和劑的任務，緩和內心的不安穩。本島人母親的「本島」部分、內地人父親的「父親」部分被自動地從意識面驅逐入潛意識，屬於所謂的動機性的無意識遺忘，正是所謂的「壓抑作用」(Repression)。這樣一來，太郎的內心雙重依戀的兩個角色，其實就剩下「母親」的性質與「內地人」的性質，太郎自身才不會再產生痛苦與矛盾。另外，在此階段也需要產生「理想化作用」(Idealization)，放大了內地的優勢特徵並輕忽父親不負責任的事實，為這個角色重新修飾與粉妝，將父親角色與人的本身理想化，才能無後顧之憂地依戀他。反之，對於母親，漸漸地將母親符合內地人的性格放大，加諸於自己的腦中，使母親有著非本島人而反而像是內地人的型態呈現於自己眼中。

在這樣的保護作用啟動下，雙依戀的進行仍還是有著矛盾與衝突的部分，因日常生活中所給予刺激的那些人事物，還是會不斷地使內心問題的癥結浮現。包含日日於身旁的母親為內地父親傷心的面孔與寂寞的身影，或是本島人與內地人的差別也越益隨著年齡感受地更加深刻。以為可以藉由防衛機制蒙蔽自我，殊不知隨著時間流走超我與本我的力量也逐漸擴散，超我那完美的要求依然不斷地在抨擊依戀母親的部分，而本我則是因基本的感受譴責下不斷的抨擊著在依戀父親這部分。即使或許對自己做了許多「合理化作用」(Rationalization)的自我安慰，但畢竟，依戀母親與父親都是有缺陷的，依戀母親違背了社會的價值觀(本島人女性之地位於當時的時代背景處於最為弱勢，較無自尊)，依戀父親則是為違背了良心的判斷(並未盡責照顧過妻兒的男子)。這樣的譴責與罪惡感有著很大的關係並且會在這狀態之中產生自卑的情緒，如佛洛伊德所言：

**對正常的、有意識的罪惡感(良心)的解釋並沒有甚麼困難；應該把它歸之於自我和自我理想之間的緊張，並且是由它的批判功能發出的自我譴責表現。可以推測，神經症中這麼有名的自卑感(the feelings of inferiority)可能和這種有意識的罪惡感密切的相關。<sup>279</sup>**

內心承受著不斷被批判的攻擊，既自責又自卑的太郎於雙重依戀的心理路程中，使自我再度陷入困頓，應付著超我與本我的抵抗，漸漸使它疲累至無法承受，所以筆者所分析其擁有的抑鬱性格才就此產生。佛洛伊德就言及到：「在兩種非常熟悉的疾病中，罪惡感有過強的意識；自我理想在裡面表現得特別嚴厲，常常及其殘暴地對自我大發雷霆。自我理想在這兩種疾病(強迫性神經症和抑鬱症)中的態度，和這種類似性一道表現出具有同樣意義的差異。<sup>280</sup>」言下之意，自我理想特別嚴厲地對自我抨擊的結果其中一項症狀就包含促使抑鬱的產生。因此，在如此強烈罪惡的譴責下，抑鬱的自我為了解套，太郎又進入了下一個心理變化，伴隨在這轉變之下，防衛機制也有了新的運作。然而，太郎的下一階段的變化，正是佛洛伊德曾言及過的發展中的兩種危險

<sup>279</sup> 佛洛伊德，《佛洛伊德文集》，車文博主編，第四卷，长春市：長春出版：新華發行，1998，頁171。

<sup>280</sup> 佛洛伊德，《佛洛伊德文集》，車文博主編，第四卷，长春市：長春出版：新華發行，1998，頁171。

之一，「退化」的現象。

這是一個假設，假設任何發展過程中都可能存在兩種危險：「停滯」(Inhibition)和「退化」(Regression)。<sup>281</sup>

-佛洛伊德

## 二、「自愛與戀物」中的「人格結構」與「自我防衛機制」

那些已經前行的性的衝動，部分也可以輕易退回到較早的發展階段，這就是「退化」。它是這種階段性發展的第二個危險，退化的形成原因與外界障礙有關。在願望滿足的過程中，一種衝動的機能在以後或更高的發展形式中遇到強有力的外界障礙就會往後轉，退回到較早的發展階段，形成退化。

-《精神分析導論演講》<sup>282</sup>

何謂「退化作用」(Regression)，根據以上佛洛伊德演講稿所述說的解釋，了解到退化現象不僅僅是停滯不前，它是在於發展後的形式內碰觸到無力解決的障礙之下，退縮回去的狀態。太郎的本我與超我，依舊照著各自的祈求努力抗爭，自我即使應付它們的需求為此蛻變為雙依戀的傾向，卻還是產生雙方不夠滿足與不願妥協的障礙。以至於卡於臨界點的自我開始尋求不再威脅到雙方的方式，必須選擇一條和平的路線來保護自己。佛洛伊德曾說過自我發展階段中最重要的一個進步，就是從快樂原則向現實原則的轉變。但是本能上還是處在不情願地接受這樣的轉變，所以會有著退化的現象<sup>283</sup>。依據佛洛伊德所述里比多<sup>284</sup>與退化之間的關聯性中，可以理解到太郎的性對象投射極需要找尋滿足自我的替代模式。

因為里比多與退化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所以當它退回到過去的生活時，也就是退回到了物件選擇或性組織的較早階段，症候便經由這種退回的方式，使病人獲得替代的滿足。<sup>285</sup>

對於太郎而言，退化至依戀單一性的母親與父親已經不能滿足體內本我與超我的需求。因此，它需要退回到不再依戀任何一方的階段，依戀自己是最好的抉擇。自我決定接納各方所求，集結於一身，創造新的自我，一個完善而可以不被譴責的自我，所以它選擇自愛，先用自己替代母親與父親的角色，將愛的對象轉移到自身。即為筆者所論述的太郎轉為「自戀型」之表現。佛洛伊德

<sup>281</sup> 佛洛伊德：「由於生物過程一般趨向於變異，所以部分機能可能在發展過程中受到阻礙，而滯留在某些早期階段，整體發展過程也因此出現某種程度的停滯，也就是，並非所有的預備階段都能成功通過這一發展過程而抵達終點，並被完全取代。這是一個假設，假設任何發展過程中都可能存在兩種危險：「停滯」(Inhibition)和「退化」(Regression)。這一假設與普通病理學的理論是一致的。」

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導論演講》，周林譯，台北市：華成圖書，2003，頁331。

<sup>282</sup> 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導論演講》，周林譯，台北市：華成圖書，2003，頁332。

<sup>283</sup> 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導論演講》，周林譯，台北市：華成圖書，2003，頁348。

<sup>284</sup> 佛洛伊德：「生物學通常用」性本能“(sexual instinct)表達存在於人類及動物身上的性需要(sexual need)，並將它比喻為營養需求本能，相當於飢餓感。然而，日常用語中卻找不到在性方面與“飢餓”相對應的詞，固科學採用“力比多”(libido)與此對應。」

佛洛伊德，《佛洛伊德文集》，車文博主編，第二卷，長春市：長春出版：新華發行，1998，頁512。

<sup>285</sup> 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導論演講》，周林譯，台北市：華成圖書，2003，頁356-357。

就曾說過「自戀性神經症」的類型，就是里比多退化的極致代表。

**在移情性神經症中，這兩種退化形式都有所展現，並在其機制中起重要作用，特別是第一種退化形式，就是退回到里比多的第一個亂倫對象這種形式，它是常見的神經症症狀。在「自戀性神經症」(the Narcissistic Neuroses)中，里比多的退化表現得更為充分。<sup>286</sup>**

退回至不愛外在對象，回歸至愛自己本身的太郎，則需要有十足的條件來滿足自我。因此，首要行動必定需要昇華自己，也就是那原本不被認同的自己要以能被認同的方式呈現。所以此刻，太郎的心理，再度啟用了防衛機制，包含「替代作用」(Substitution)、「轉移作用」(Displacement)、「昇華作用」(Sublimation)。性對象替代：即是將自己替代成本身依戀的兩個角色(母親與父親)，性對象轉移：將愛的對象目標轉移到自身且昇華後能不被譴責的自己。替轉後接受自愛的方式達成心靈愛欲的宣洩，首先當然必要先改造無法認同與接受自己的我，將父母親的特點去蕪存菁，於是它需要先學習雙方好的部分將之納進於自身，剔除掉不優秀而會被攻擊傷害的部分，為了打造全新的「理想自我」。於是伴隨啟動「內射作用」(Introjection)、「仿同作用」(Identification)與「否定作用」(Denial)的輔助對於太郎而言是非常重要的。首先，需要打從心裡先厭惡自己所擁有的部分，從因受到外在環境影響的超我力量所告知的劣勢與會遭受異樣與排擠的特質，開始進行全面性地否定。自我開始進行掃除，否定自己原本不完善的部分，包含半個本島人身份的混血身分以及屬於在單親家庭沒有父愛底下成長。換言之，太郎自己成為不認為自己有著本島人血統，母親與自己的血統呈現割離的狀態，只認為自己生長於本島。再者，覺得自己其實不缺乏父愛與對於新來的家族成員-本島人繼父也並不在意。

另外，「仿同作用」(Identification)與「內射作用」(Introjection)是為了讓自我需要學習好的以充實不足的一種方式，包括母親柔順的人格特質以及完全內地人的樣態模式。由此，從小到大接受溫暖母愛的美好，太郎開始下意識地吸取了母親所擁有的那體貼溫暖、謹慎求完美的性格。另一方面，模仿著高貴的內地人父親所幻想中應該擁有的一切，內地人的習性、裝扮及語言成為太郎模仿依據的樣板。膚色、髮色等，內地人與本島人無所差別的狀態下，混血兒太郎選擇從表面外在來開始強化自己，即穿內地服飾皆是由外在影像深植入腦部，並且於接觸外界環境不被異類化的先行條件。另外，房間內的擺設，則是營造內地氛圍的極佳自我空間。言語部分也完全排斥台語，只想說日語，透過說話的力量與思考的連結，強化出自己內地的歸屬感。

太郎最後需要藉由那些所屬的內地物質而來證明自身的「戀物」心態，正是因為長久運用於幫助自己進入一個營造好的理想角色，如同角色扮演一樣，必須得完全相信自己就是那個對象，長期下來默默地已經到達深信不疑的程度，再加上利用「幻想作用」(Fantasy)與「隔離作用」(Isolation)的交錯運作，隔除了在外所曾受過因本島人的身分所帶來的痛楚與斥責，幻想自身為完完全全的內地人，所在的房間則是內地的小小縮影。增加幻想的力量，象徵性地意象就格外重要。太郎自己房內的日本國旗擺設是象徵內地的代表物，看見國旗能讓身處台灣的他知道他屬於內地的一份子而非本島人，正是物品被「象徵化作用」(Symbolization)成了內地代表物。長久以來，太郎或許進入自己的臥房與郊外會又著不相同的心境，因太郎私人空間的臥房早已經無知覺地與其他生活區塊分離出來(「分離作用」(Dissociation))，使他可以處在自己所塑造的

<sup>286</sup> 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導論演講》，周林譯，台北市：華成圖書，2003，頁333。

美好環境下被保護著。

所使用的貼身內地衣物更是透過「內射作用」(Introjection)將內地服飾內化為自體的一部分，也就是所謂的自我代表。佛洛伊德認為這是一種性對象的不適當替代，即「戀物癖」(fetishism)的現象，如佛洛伊德所言：「向戀物癖的轉化過程中，要使目的得以實現，性對象必須具有某些戀物的條件。如有特定的頭髮顏色，特定樣式的服裝，或身體缺陷。<sup>287</sup>」而對太郎而言，性對象已經轉化為他本身，而此對象必須符合內地人的樣貌，此為他戀自己與戀內地服飾的條件來源。若沒有服飾的證明，剩赤裸裸的他是無法說服他人與自身，即失去代表性對象-穿著內地人服飾的他。所以當他被要求脫下內地衣物的時候，才會爆發等同於如自我毀滅一般地無法認同的失控情緒。長久以來，不離身的內地人衣物要換成本島人服飾，等於是給他照鏡子發現到半個本島人的自己，這對已經自戀於自我理想中建設的那自以為完美的太郎而言是何其恥辱，因為他將發現努力塑造後之理想自我還是蓋不住那他想遮蔽掩飾的部分。要他如何再次面對自己與愛自己的這個對象投注呢？佛洛伊德以下所述的病態現象，正可以解釋太郎的確對於那內地服飾已經有著超乎異常的心理反應。

只有當對崇拜物的追求超越了對性對象的固著並替代了正常目的，或者崇拜物與某人產生了分離並變成了性對象時，病態現象才會出現。  
……(略)……這種變異尤其在崇拜的條件與性對象無法分離的時候更為明顯。<sup>288</sup>

透過以上的作用下可以了解，太郎的自我漸漸造就出理想的自我，所愛著的也是那理想的自我，他不再依戀「本島人母親」與「內地人父親」，而是愛著擁有百分之百愛和百分之百內地人的自己，這個他是可以被超我與本我完全認同的。於是不論是曾經依戀的母親要再婚也好，或是多了一位本島人繼父代替了曾經依戀的內地人父親也罷，對於武裝後的太郎而言衝擊並不大，因為自愛下那些都已經如身外之物般，母親再婚只要她開心幸福就好，並不會有所妒忌與怨恨，而新任的繼父，只不過是為父親這空殼虛名位置上做的補位而已。超我的刺激以及本我的抗議皆能因為在自愛的心態下，被蒙蔽地看著完美的自身而停止纏鬥，自我得以再次被保護並緩和不安安全的局面。

#### 第四節 小結

因此，藉由佛洛伊德的人格結構與防衛機制的理論概念下，更能感受到太郎的心理層次性的變化與心理癥結的運作情形。關於他那複雜的背景，過多不單純的意念與慾望，心理的癥結才會不斷地被擴大卻又加以壓抑。由小說的結局就能發現到，最終太郎對母親的無法諒解在於不被認可，他完美的自我再次被否定。自己好不容易認可自身創造的一切，選擇自己不被自我所厭惡的方式，卻還是無法抵擋外在給予的傷害。面對現實上的負面壓力，雖然防衛機制可以暫時減輕了挫折感、無力感，彈性地調節了自己，卻不一定能解決問題。國立空中大學吳來信老師就提到過當自我防衛機轉變的很僵硬而沒有彈性而且毫無其他選擇時，這種防衛機轉就是一種病態的防衛機轉<sup>289</sup>。太郎的最後已經不再像原本的自己，因為他無法接受最真實的自我。正是所謂的病態式

<sup>287</sup> 佛洛伊德，《佛洛伊德文集》，車文博主編，第四卷，長春市：長春出版：新華發行，1998，頁524。

<sup>288</sup> 佛洛伊德，《佛洛伊德文集》，車文博主編，第四卷，長春市：長春出版：新華發行，1998，頁525。

<sup>289</sup> 吳來信，〈心理(自我)防衛機轉的類型與層次〉，國立空中大學，2008年12月9日。

的自愛傾向，無法去轉化愛他者與客體。太郎的心理癥結並不會消逝，它只是被收納於已上鎖的盒子內，所以，若是如同小說的結尾般，一旦它被打開，一切的情緒與痛苦還是會從潛意識裡出來。或許因為如此，像對於教育偏差學生的引導處理方式，都希望盡可能消除他們的自我防衛。設法解除自我防衛的行為或許才能真正使他從此解脫心理癥結<sup>290</sup>。或許文章的未知的結局，太郎或是現實中如同太郎般心理的人，將會進入人生下一個階段，也許會有佛洛伊德精神分析中曾提過的自戀型對象選擇的同性戀者<sup>291</sup>傾向，另外《精神分析辭彙》在解釋自戀型對象選擇裡，也述說「某些主體，特別是同性戀者，「……以其自身為模型[……]來選擇其愛戀對象」<sup>292</sup>……(略)……」之可能。這也是未來研究裡筆者渴望對於類似背景的兒童心理(日治時期單親家庭之台日混血兒)所深入進行涉獵的可能性。對於日治時期台灣裡，許多有著這樣複雜心理的他們，是否能找尋到真正解放釋懷的方式，至少透過佛洛伊德的思維下我們能更完整的釐清「太郎」這人物心靈上的來龍去脈。

筆者在此研究下，擺脫性別議題所探討的女權主義方向的〈感情〉，單純的根據作家所創作的角色與故事背景之意義來體會小說所傳達給讀者的訊息，發現台灣日治時期單親家庭之台日混血兒代表的太郎一角之重要性與普遍存在性，及作者黃寶桃為何於小說內將太郎擺在第一主角的位置上描述，並且還呈現出他感情的起伏之緣由。若未跳開對於作者黃寶桃性別設定的做法，將會使太郎再次淪為被放置於強化母親弱勢的研究區塊，難以展開新的視野。若未經過佛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理論，將無法理解他們的心理建構與障礙。若未經過文學與心理學的結合，就無法嶄新思考出黃寶桃筆下所想要傳遞與呼應的真實狀態或是其他可能。黃寶桃〈感情〉主角人物透過筆者層層背景的解析與探究下，運用佛洛伊德的心理思維理論，幫助筆者跨出過去的研究框架，尋回台灣日治時期可能普遍存在的複雜心理現象。

---

2013年4月1日，取自

<http://jc.nou.edu.tw/971209-2.pdf>

<sup>290</sup> 王千偉，〈學生偏差行為的處理模式〉，教育資料與研究，第22期，1998，頁62-65。

<sup>291</sup> 「……(略)……在所有我們檢查過的性倒錯者身上，我們發現這一事實，即在他們的童年早期，經歷一段圍著某一女性(通常是母親)的強烈而短暫的時期。此後，他們將自己認同於這一個女性，並把自己當作性愛對象。也就是說，他們起始於自戀基礎，追尋像自己一樣的年輕男人，他們像這樣的男人就像母親愛他們一樣。……(略)……他們最基本的特徵表現為自戀式……(略)……我們的觀察表明，父母雙方的相伴起著重要作用。童年期若見不到強健的父親，常會導致性倒錯。……(略)……」

佛洛伊德，《佛洛伊德文集》，車文博主編，第二卷，長春市：長春出版：新華發行，1998，頁519-520，註①。

<sup>292</sup> Jean Laplanche；J.-B. Pontalis，《精神分析辭彙》，沈志中；王文基譯，臺北市：行人出版：遠流總經銷，2000，頁70。

#### 第四章 結論

黃寶桃〈感情〉在台灣日治時期文學小說裡屬於非常短篇的文章，其相關研究甚少，幾乎皆趨向以女權問題為單一主軸。本研究與其他研究方向相異，重點由總是被聚焦的母親角色轉移至男孩身上，從中找尋到可能普遍存在於那時代下專屬痕跡，使本研究對於此文本內容的意義給予新的風貌。筆者認為，或許比起母親的感情太郎的糾結情緒更複雜卻也更值得探究。本研究論文的價值在於，日治時期單親家庭中的混血兒很大的可能是普遍存在的，並且他們有許多值得可探討的心理層次，本研究的重點在於傳遞理念與推測可能的未知。筆者希望能讓更多研究者知道在還未被重視的人事物上、或是一本虛構的小說中，都有可能發現具有可能性的潛藏價值。即便是已經被侷限及定型的研究裡，繼續延伸出另一種不同於以往的研究方向。或許未來對被遺忘的人事物，能試著用更深入且大膽想法去作探究，創造新奇的研究領域。筆者認為很多生活上的小事比起單一的大事來得大眾化且需要被關心，但卻像似埋沒於社會下一般被漠視，導致本身該有的情形卻被忽視，這是筆者覺得可惜的狀況。如同本研究「太郎」這虛構的人物，或許就是眾多讀者讀過後印象不深的一個小人物，又或許就如同過去研究方向以女性主義去解析他，認為這個角色只是用來凸顯母親在文中地位薄弱與女性個性忍讓屈服的表現而已，但其實是否應當有更多角度去看待太郎這角色的意義呢。

「太郎」也是此小說內黃寶桃所塑造的人物，筆者認為他的重要性不單單是為了凸顯母親的無助或卑微態度而已，根據此論文的研究角度來看，顯示此角色獨自的重要性。從筆者第一章第一節之動機與目的裡所列舉的數據顯示，能證明日治時期無婚姻關係的男女所生下的混血小孩，其實比婚姻關係的小孩比例來的多。日治時期所存在著大量的單親家庭之內台混血兒，於黃寶桃〈感情〉小說中被勾勒出來，並點明其身分複雜之處，他其實在作者筆下被暗示性地讓讀者大眾明白日治時代下這般人物的存在。雖只是小說人物，但筆者認為他們在作者筆下的用意都源自於真實的投影。這點在此研究內也得到印證，如同故事人物「太郎」一般的痛苦與矛盾心理現象，最終走向一種病態的自戀狀態，「自愛」的太郎處於未走向依戀客體的情況。應該是台灣日治時期底下普遍存在的心情寫照，但過去沒有研究以此角度提出過。本研究選擇跳脫過去一直以來針對黃寶桃是以女權主義或女性觀點為啟發點的研究方向，也因而得到此小說從未被發掘、探討之處，或許黃寶桃其餘作品也有更多可能性。本研究嘗試開啟黃寶桃〈感情〉此小說的另一種解讀方向，也透過此研究歷程，筆者才能發掘到作為故事人物的「太郎」所擁有的意義竟可能是代表台灣日治時期另一種普遍的心理現象。

台灣日治時期形成的這種普遍的心理複雜建構，其實並非單純簡單，它並非僅止於殖民地心理而已，或是單親家庭無父的男童心理狀況，和內台混血兒的矛盾。從本研究後發現他的心理複雜構造，若沒有包含殖民、單親、混血等以上重疊的因素如此加總結合，是無法創造出這樣的複雜心理症狀。現代的我們，非殖民的我們，非單親家庭的我們，非混血兒的我們，多少的我們是無法體會這種體內如此多混雜因素的人們。殖民地的文學研究裡，忽略了這樣一群人的存在，因少了研究人物心理的細節而錯失了許多每個時代背景的「可能」。因此，筆者在此研究中為了使台灣殖民地文學更能細膩的進入角色研究，故結合了精神分析的方式，透過精神分析學始祖弗洛伊德的理論(包含「伊底帕斯情結」、「自我防衛機制」、「人格結構」、「抑鬱」、「自愛」等)來解析人物的內心層次，感受他內在的複雜度。這是在西方研究裡非常普遍的手法，筆者希望也能擴展至我們台灣殖民地文學的這一塊，將心理學與台灣殖民地文學的結合，以更能投射出故事裡人

物於小說內的深層捕捉。精神分析的手法也能讓我們更清楚明白人物心理症狀的始末，筆者希望透過此研究的作法能引起日後能有更多心理學與文學之結合的台灣殖民地文學之後續研究，以深層且細膩的分析手法，展現作者更多創作的意圖。透過本研究裡黃寶桃〈感情〉小說的研究後，作家黃寶桃的其餘作品其實皆可再重新發展更多元的研究路線，讓台灣殖民地文學的研究手法注入新的心理學元素與多元發展的可能。

回歸到本篇研究上，筆者挖掘出在黃寶桃〈感情〉小說裡的主角「太郎」，有著台灣日治時期普遍的複雜心理現象。換句話說，台灣日據時代有著許多跟「太郎」一樣複雜心理的小人物，這也是本研究上筆者認為極具意義與價值之所在。在筆者層層的相關背景的解釋後，以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之理論思維下所解析的複雜心理症狀與矛盾中自我解救的現象，更能讓台灣日治時期這般人物的存在被鮮明地理解。筆者也希望透過此研究，讓本身就該被注目到的「日治時期單親家庭之台日混血兒」，能被加以重視並了解其心理的衝擊與無奈。「內台共婚、內台混血兒這樣少數的狀態」皆被廣泛的研究，反倒「日治時期單親家庭之台日混血兒」的普遍存在卻似乎鮮少人知曉，這是種奇特現象，也或許是研究裡的漏網之魚。希望這研究主題透過本研究後能夠重新得到重視，並引發未來更多相關的探討。

本篇論文研究中，筆者藉由以下推展方式，展現黃寶桃〈感情〉多元與全新之面向：

- 原本被定位為女性作家的黃寶桃，其實應該屬於無法證實其性別的狀態，因此，本論文表示不應當將黃寶桃當作「女性或男性作家」，應以「作家」身分去看待反倒能釐清更多文章的意涵。
- 黃寶桃〈感情〉的研究路線，不再只是停留於女權議題上的母親角色，本論文走向細說原本被當作是配角的太郎，並且從此角色發現可反映當時代社會背景的普遍狀況與他所附有的複雜心理現象。
- 不再拘泥於日治時期內台共婚為主軸的研究方向，筆者研究顯示下，釐清除了內台共婚以外，同居關係的現象反而較為普遍，並且比例大於內台共婚的數據。在此依據下，同居關係的狀態下所延伸的問題，不僅僅是雙方之無婚姻之約束，連帶影響還有所誕生的小孩也會因為沒有法律保障的緣故，導致容易淪為單親家庭的兒童，即為「日治時期單親家庭之台日混血兒」。
- 殖民地心理學、單親家庭兒童心理、混血兒心理，以上三項皆被廣泛研究，卻未被同時放置一起論述。此論文發現將其三項結合起來，能傳達台灣於殖民時期所存在的另一種廣泛心理現象。
- 本研究不同於以往以大方向或議題下去研究的台灣殖民地文學。本篇研究單純以分析論述極為短篇小說黃寶桃〈感情〉內的一位故事人物心理找出其研究價值。雖然只是看似單純小研究卻潛藏著許多具研究價值的主题。
- 台灣殖民地文學的領域裡，結合心理學，並以精神分析手法詳述角色內心世界之作法較不常見。本研究以此為理念，表現出文學與心理學結合的無限可能，透過此作法的確能感受作家筆下人物所被創造的未知生命力。

另外，本研究未來或許能更進一步發展的部分與思考的空間，即小說內容裡所影射下的狀況，不單單只是「日治時期單親家庭之台日混血兒」的問題，而是當時與內地人交往或同居的狀態很多，後來分離後所生的小孩是否都如太郎一般對自己的身世知曉。當時制度下混亂與不完善，也

是會有導致許多未被發現的「內台混血兒」被隱沒於時代的洪流之中，甚至包含筆者所研究的「單親家庭之內台混血兒」也可能忽略於其中，更擴大這群人的存在數量。因此，筆者疑惑的還有很多那些不知道自己體內流著內地人血統的小孩是否存在的可能性也很大。

因此，「日治時期單親家庭之台日混血兒」的心理現象與結構，其實不該止步於筆者所分析的類別而已。細說下來，此角色是日治時期單親家庭、「無內地父親有本島母親」之內台混血兒「男童」的身分，人物在此研究下被解析後的心理層次結果，皆與筆者所強調劃分之以上元素息息相關。若以上元素變動，心理結構的構圖將會改變。例如若找尋到人物範本是轉為日治期單親家庭「無內地母親有本島父親」之內台混血兒「女童」的話，透過佛洛伊德心理的思維來釐清，又應該會有不同的樣貌。或是單一元素變動後，成為日治期單親家庭「無內地母親有本島父親」之內台混血兒「男童」後，也會有不一樣的心理症狀。正所謂，人的心理是流動的，也因為如此的人性化才爆發出火花。未來進一步的努力，是可以更詳細的論述「日治時期單親家庭之台日混血兒」這塊領域，隨著人物所附帶下的元素「單親的家庭成員(父親或母親)」「男孩或女孩」之下改變轉而產生相似又有著些微不同的心理分析結構圖。

或許經過這樣的各別分隔下的分析研究手法，此塊領域會更加穩固完善。採用結構性強烈的分析方式，以達此區域的心理詮釋。未來研究更能根據完善的「日治時期單親家庭之台日混血兒」的整理，如同上一章筆者結束所指希望看似死結的無可奈何纏鬥的疲態內心，能被後來的學者找尋到解藥後解析出真正解放釋懷的方法，達到拓展此研究論文於台灣殖民地文學內延續性意義。



## 參考文獻

### 文本

- 黃氏寶桃,〈感情〉,《台灣文藝》,第三卷第四五期,1936年4月20日,收錄於《台灣新文學雜誌叢刊》,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81年復刻版,第十冊。
- 葉石濤,《葉石濤全集 22,翻譯卷二》,高雄市:高市文化局;台南市:國立台灣文學館,2006-。

### 書籍(引用順)

- 佛洛伊德,《佛洛伊德傳》,廖運範譯,台北:志文出版社,1993。
- 許進發,《臺灣重要歷史文件選編(1895-1945)一》,臺北縣:國史館,2004。
- 臺灣慣習研究會編,《臺灣慣習記事》,臺北市:臺灣總督府臺灣慣習研究會,第參卷上。
- 江慶林著,《臺灣慣習記事(中譯本)》第參卷上,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譯,1984-。
- 臺灣慣習研究會編,《臺灣慣習記事》,臺北市:臺灣總督府臺灣慣習研究會,第參卷下。
- 江慶林著,《臺灣慣習記事(中譯本)》第參卷下,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譯,1984-。
- 下山一自述;下山操子譯寫,《流轉家族:泰雅公主媽媽、日本警察爸爸和我的故事》,臺北市:遠流,2011。
- 林呈蓉,《日本人的臺灣經驗—日治時期的移民村》,台北:台灣歷史學會,2004。
- 張素玢,《臺灣的日本農業移民——以官營移民為中心(1909-1945)》,新店:國史館,2001。
- 王溢嘉,《精神分析與文學》,臺北縣中和市:野鵝出版,1978。
- Julia Kristeva,《Proust and the sense of tim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
- 廚川白村,《苦悶的象徵》,顧寧譯,臺中市:晨星,1988。
- 劉紀蕙,《心的變異:現代性的精神形式》,臺北市:麥田出版:城邦文化發行,2004。
- 《台灣新文學》,新年創刊號,1936,收錄於《台灣新文學雜誌叢刊》,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81年復刻版,第十一冊。
- 黃英哲主編;王惠珍等譯,《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臺南市: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
- 呂明純,《徘徊於私語與秩序之間: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女性創作研究》,臺北市:台灣學生書局,2007年10月01日。
- 鍾正道,《佛洛伊德讀張愛玲》,台北:萬卷樓,2012年08月31日。
- 劉紀蕙,《孤兒·女神·負面書寫:文化符號的徵狀式閱讀》,台北:立緒出版社,2000。
- 張秀琴,《佛洛伊德無所不在》,臺中市:好讀,2004。
- 吳濁流,《台灣連翹》,台北:前衛出版社,1995。
- 弗朗茲·法農,《黑皮膚·白面具》,陳瑞樺譯,台北:心靈工坊,2005。
- 佛洛伊德,《論文明》,譯者徐洋、何桂全、張敦福,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10月。
- 庄司總一,《陳夫人》,山下武監修,東京都:大空社,2000。
- 庄司總一,《陳夫人》,黃玉燕譯,臺北市:文經出版社,2012。
- 弗蘭克·富里迪,《恐懼》,方軍、張淑文、呂靜蓮譯,南京市:江蘇人民,2004。

- 巴特勒；麥克馬納斯，《生活中的心理學》，韓邦凱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9。
- 郭良，《佛洛伊德》，香港：中華，1996。
- 佛洛伊德，《佛洛伊德之日常心理分析》，楊韶剛譯，百善書房，2004。
- 申荷永，《心理分析：理解與體驗》，北京市：生活·讀書·新知三聯，2004。
- 保羅-羅宏·亞舜，《佛洛伊德與女性》，楊明敏譯，臺北市：遠流，2002。
- Joseph Sandler；Ethel Spector Person；Peter Fonagy，《佛洛伊德的「論自戀：一篇導論」》，李俊毅譯，臺北市：五南，2009。
- 張愛玲，〈談女人〉，《流言》，臺北市：皇冠，1981。
- 佛洛伊德，《佛洛伊德之精神分析論》，楊韶剛譯，霍克(旭昇代理)，2004。
- Joseph Rosner，《精神分析入門：150個問題的解說與釋疑》，鄭泰安譯，臺北市：志文，1984。
- 佛洛伊德，《佛洛伊德自述》，黃忠晶；王銀瓶；黃巍編譯，天津人民出版社。
- 佛洛伊德，《佛洛伊德著作選》，賀明明譯，台北市：唐山出版社，1989。
- 胡佩誠，《心理治療》，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2006。
- 沈楚文口述；呂政達撰文，《走出生命的幽谷：認識心理防衛機轉》，臺北市：張老師，2005。
- 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論》，張愛卿譯，臺北市：米娜貝爾製作：紅螞蟻總經銷，2000。
- 佛洛伊德，《佛洛伊德之性愛與文明》，楊韶剛譯，臺北縣中和市：百善書房，2004。
- Jean Laplanche；J.-B. Pontalis，《精神分析辭彙》，沈志中；王文基譯，臺北市：行人出版：遠流總經銷，2000。
- 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導論演講新篇》，周林譯，台北市：華成圖書，2003。
- 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導論演講》，周林譯，台北市：華成圖書，2003。
- 佛洛伊德，《佛洛伊德文集》，車文博主編，第四卷，長春市：長春出版：新華發行，1998。
- 佛洛伊德，《佛洛伊德文集》，車文博主編，第五卷，長春市：長春出版：新華發行，1998。
- 貝爾曼-諾埃爾，《文學文本的精神分析：弗洛伊德影響下的文學批評解析導論》，李書紅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 佛洛伊德，《佛洛伊德文集》，車文博主編，第二卷，長春市：長春出版：新華發行，1998。

#### 論文(引用順)

- 廖苑純，〈異族婚姻的法制與文化調適：以日治時期「內台共婚」案例分析為中心〉，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1。
- 德田幸惠，〈日本統治下台灣的「內台共婚」—日本與台灣的「家」制度的衝突和交流〉，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7。
- 呂明純，〈潛抑與放逐—黃寶桃作品研究〉，范銘如主編，《挑撥新趨勢：第二屆中國女性書寫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市：台灣學生書局，2003年2月。
- 鐘秀敏，〈惡與善：綠野仙蹤、女巫及和平女巫中的女巫形象〉，靜宜大學碩士論文，2004。
- 張春華，〈庄司總一《陳夫人》身份認同研究〉，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8。

#### 期刊(引用順)

- 翁聖峰，〈日治時期職業婦女題材文學的變遷及女性地位〉，《台灣學誌》創刊號，2010年4月，頁1-31。
- 星名宏修，〈從1930年代之貧困描寫閱讀複數的現代性〉，《臺灣文學學報》第10期，2007年6月，頁111-130。
- 李仁芳，〈崩敗中的電視內容產業？〉，《今周刊》，第852期，2013年4月。
- 宋淑芳，〈“他者”黑人—奧尼尔笔下黑人形象的文化與心理闡釋〉，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6卷5期，2009年9月10日，頁172-175。
- 孫妮，〈V. S. 奈保爾《模仿者》的多重主題解讀〉，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34卷1期，2006年1月，頁48-53。
- 張惠珍，〈紀實與虛構：吳濁流、鍾理和的中國之旅與原鄉認同〉，臺北大學中文學報，第3期，2007年9月，頁29-65。
- 林慧君，〈坂口(丕零)子小說人物的身分認同—以〈鄭一家〉、〈時計草〉為中心〉，臺灣文學學報，第8期，2006年6月1日，頁123-145。
- 趙海靈，〈父親缺失與兒童心理發展的關係〉，濮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3卷1期，2010年2月，頁128-132。
- 陳小萍；張海鍾，〈父親缺失研究評述〉，中華女子學院學報，20卷6期，2008年12月，頁99-103。
- 陳小普，〈單親家庭兒童自我意識存在的問題探析〉，教育探索，2008卷9期，頁128-129。
- 王千倬，〈學生偏差行為的處理模式〉，教育資料與研究，第22期，1998，頁62-65。

其他(引用順)

- 嘉義縣竹崎鄉戶政事務所-便民服務-日治時期稱謂用語  
2013年4月27日，取自<http://jhuci-hro.cyhg.gov.tw/content/index.asp?Parser=1,5,24>  
2013年4月27日，取自<http://jhuci-hro.cyhg.gov.tw/content/index.asp?Parser=1,5,24>
- 中國女性文學研究室  
2013年4月1日，取自[HTTP://STUDENTCLUB.TKU.EDU.TW/~TKUWL/A2\\_TAI\\_1.HTM](http://STUDENTCLUB.TKU.EDU.TW/~TKUWL/A2_TAI_1.HTM)
- 林欣誼 專訪，〈父親道盡委屈 林香蘭邊寫邊哭〉，中國時報，2011年7月2日。  
2013年3月3日，取自奇摩新聞網  
<http://tw.news.yahoo.com/%E7%88%B6%E8%A6%AA%E9%81%93%E7%9B%A1%E5%A7%94%E5%B1%88-%E6%9E%97%E9%A6%99%E8%98%AD%E9%82%8A%E5%AF%AB%E9%82%8A%E5%93%AD-183952945.html>
- 中國成長網  
「父親缺失對兒童心理的影響」  
2013年4月1日，取自<http://www.hljnews.cn/zt/system/2008/07/16/010184232.shtml>
- 科學人雜誌  
2013年3月6日，取自<http://sa.ylib.com/MagCont.aspx?Unit=featurearticles&id=465>
- 中華數字書苑  
<http://www.apabi.com/cec/?pid=foreign.search&db=dlib&dt=EBook&dc=1.6&hdc=1>
- 吳來信，〈心理(自我)防衛機轉的類型與層次〉，國立空中大學，2008年12月9日。



附録一、(黃氏寶桃,〈感情〉,《台灣文藝》,第三卷第四五期,1936年4月20日,頁22-26,收錄於《台灣新文學雜誌叢刊》,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81年復刻版,第十冊)

太郎の名前は、内地人が付ける名である事は、母から聞いて始めて太郎に解った。

内臺人の間に出来た児である事は、少なからず彼の自尊心を傷付けた。學校でも彼だけが、内地語と台灣語の持主だった。で、同級生達からのけ者にされて、何時でも偶の方に一人ぼっちで置かれた。本島人獨特の無表情な顔付は、太郎を實際以上にいちけた子供に見せた。

南國の春は早くから訪れて、くちなしが街の郊外や、田舎の部落の傍に咲いて居て、高くやはらかい香を投げて居た。

太郎の室の窓の外にも、くちなしの一株があって、奇麗に咲きそろって室の中に甘い香を送って呉れた。

窓際のいんこが朝のお早うを叫ぶと、春らしい柔かい風が窓から入って来て、太郎の寢臺の上に掛けてある日の丸の旗をゆらいた。

太郎の父が内地人であることから、母に無理に願って掛けてある小さな日本の國旗は、この調度の貧しい室の中で、一番晴やかな存在であった。

太郎の平常から氣にかけて居る唯一の願ひは、内地人である父に逢ひたい事だった。本島人とさえ見ればリイヤと言って、劣等人種である様に思っているこの邊りの人達から逃れて行きたくもあり、又内地と云ふ全然生活様式の變った見知らぬ國に対する好奇心からでもあった。

太郎の母は彼が極く幼い時、寢付の悪い彼に床の中でやさしく未だ見ぬ父の國の話をよく聞かせて呉れた。タタミと云ふ不思議なものや、煉瓦も石も用ひない、木ばかりで造ってある、お伽話の中にでも出て来る様な小さな家の話だの、水が綺麗に澄んで居て、美しい花が澤山咲いて居る田舎の話や、感傷的な口調で話して呉れた。その度毎に太郎は益々寢付が悪くなって、興奮するのだった。母はよく内地の話をして呉れるのだったが、然し母は内地の事は餘りとく知らなかった。母自身も内地を見た事はなかったのだ。視察に来て居た内地人の父とねんごろになって太郎を生んだのだが、その父は何かの用にかこつけて内地に歸った切り、再び母の元には歸っては来なかった。

だから太郎の小さい時よく内地の話をして呉れたのは、皆父が話した美しい内地の受うり話だった。父の歸りを一生懸命待って居たその頃の母は、身體いっぱい父に対する愛情を持って居たのだ。

「太郎、もうお眼覚めでせう」母はそう云ひながらドアを開けて入って来た。母は平常は内地人の父の趣味に合ふ様な、年に似ないじみな服を着けて居るのに、今日に限って派手な美しい長衫を、ぴったり身體に合はせて着て居た。

母は心持笑みをたゝえて、未だ温い寢臺の中で起き溢って居る太郎を見つめた。

「お母さん。お早うございます」太郎は眼をぱちくりさせながら母の言葉をかけると、半身だけ床から起き上って、改めて母に聞いた。

「お母さん、一體どうしたんです。何だか大變愉快そうですね」

母が昨夜妙に若い気持ちではしゃいで、叔父さんの家に行った事を思ひ出した。

「えゝ、とてもうれしい事があるの、お前、何だか當てゝごらん」

母はそう云ってうれしくって耐へられない様に、強く太郎を抱いた。

「何でせうね。お母さんがそんなに喜ばれるのは……………分った」

「分ったって、何か、云ってごらん」

「お母さん、もう云はなくなつて僕には分つて居ますよ」

母はそう云はれると、さっと赤らめた。太郎が十七になるまで、内地人を一度夫に持って子供まで生み、その上捨てられたと云ふ世間に對するはづかしさから、一ツは内臺人の間に出来た児と云ふ太郎を育てる一心から、ずっと獨身を通して来た母は、益々狐獨感に耐えられなくなって叔父の進めのまゝに結婚話を承知したのだった。

「そうでね、わたしは彼のひとと本當に結婚する氣になつたんですが。お前には悪いかも知れないと、考へたんですが、向ふでお前も一緒に引取つて世話をしてやると云ふし、あたしもね……お前は反對ぢやないでせうね」太郎が反對するのが母には一番つらい事であつて、若しいじけた太郎が反對すると、このうれしい話も無駄にせねばならない不安があつた。それだから母としては太郎の賛否を求めたのだ。

「え、いゝですとも。僕はお母さんのために大變うれしく思ひますよ。今迄僕のためにどんなに淋しい思ひをなされたか。耐えられない苦しさに耐えて来たか、僕には分つて居るんですから」

「ありがとう。お前がそう云つて呉れると、何だか涙が滲んで来そうな氣がします」

「僕がいゝも悪いも無いんです。僕はもうこれ以上お母さんの淋しいお姿を見たくないんです」

實際母の瞳には美しい涙の玉が滲み出て居た。その姿は太郎には今迄にない美しい姿に見えた。それで固く抱き直して背中を愛撫しながら耳元で

「いつ式をお上げになるの」

と問うた。

母は一度太郎を離して

「式の日どりなんかは叔父さんにまかせてあるの」

太郎の肩をゆすぶつて答えた。

太郎はうれしかった。母が何事によらず内地風に控へ目にする性質を知つて居たから、素晴らしい花嫁が出来ると思つた。母の美しい花嫁姿……

「それからね、今日あの方がお出になつて、お前に合ひたいんですつて、だからお出になつたらお前のお室に御案内をしても好いでせうね」

「えゝ、好いですとも。僕、ぢや起きて室を一寸かたづけませうね」

「そうしてお呉れ、それから—お前には言ひにくいんだけれと、今着てある内地人の着物をこの臺灣服と變へて呉れませぬの…」

太郎の表情はさっと變つた。それを目ざとく見つけて、母は辨解する様に小聲になつて「あの人が臺灣の人だし、お前だつて本居地は臺灣に有るのだから、殊更に内地の着物を着なくても好いぢやないの」

太郎は答えなかつた。何と云はれぬ不決な氣持ちだつた。母の結婚を喜んで居た朗らかな氣分が、その一言で微塵に壊されてしまつたのだ。太郎にして見れば例へ本居地は臺灣であり、母が臺灣の女であっても、父の方を餘分に受けて生れて居る自分は明らかに内地人の子供だ。内地人を父として此の世に出て来た人間なんだ。そう思ふと母が内地に對する關心の少ない様に思はれて、怒らずには居られなかつた。

母は母で、又太郎の感情を害した事を後悔した。然し子供が出来るとすぐ自分を見捨て故國に歸つた不人情な、假令どんな事情がその間にあつたとしても、子供まで出来た自分の元に歸つて来なかつた内地人の事は、その人に幾分かの感情が残つて居るとは云へ、今となつて内地の事を思ひ出すのは、心の古傷を再び痛める事であつた。

太郎が内地人の着物を着る毎に、その古傷を痛めて居ったのだ。又今度の夫にしたって、妻の子が殊更に内地に感情を走らせて居る姿を見せるのは、好い事とは思はれなかった。だからこの機会に取り除けて置きたかったのだ。

「ねえ、願ひだからそうしてお呉れ」

母は再び太郎に願った。まるで罪人が裁きを持つ様な態度だった。

「嫌です」予は怒鳴る様に答えた。

たった一言だった。行っまった感情が言葉に爆発したのだ。母はがっかりした様にうなだれて立ち盡して居た。母と子の異った感情がちぐはぐに交錯して居るのだった。

沈黙が続いた。先刻迄愉快だった反動が来たのだ。母はこの場の陰悪な空気に耐え切れなくなって、黙っハンカチを眼に當てゝ涙をふいて出て行きかけた。

太郎は母の泣いて居る姿が何だか空々しく思はれた。自分の主張が通されなかったから泣いて胡麻化して居るのだとも思った。そしてこのあはれな母に後一言、出来るだけ内臺人の児として生んで呉れたお禮を云ってやりたかった。

「お母さん。僕は誰がなんと云っても内地人の子なんですよ」

大きな声で出て行く母にあびせ掛けた。母は後を振向かなかった。小走りにドアも閉めず出て行ってしまった。

太郎の室には急に寂寞が襲って来た。息つまる様な空気が急にシンとした静けさと變ったのだ。インコが籠の中で渡木をコツく飛び廻って居る音が耳につく程静かだった。

確かに自分は内地人の子だ。然し母にまで殊更に内地と云事を強要するだけの権利があるだらか。母の気持が段々分って来る様な気がした、太郎は再び横になって毛布をかぶると、不意に張り切って居た感情が融けて来て、感傷的な涙が出て来た。

附錄二、〈感情〉中文版：葉石濤，《葉石濤全集 22，翻譯卷二》，高雄市：高市文化局；台南市：國立台灣文學館，2006-。）

太郎這種名字，唯有內地人（日本人）才會取的名字這個事實，從母親嘴裡聽見了以後，太郎才開始明白，他是內台人結合才會生下來的事情，這多少傷了他的自尊心。在學校裡唯有他才會講內地話（日本人）和台灣話。因此，被同學排擠，時常獨自一個人在某個角落裡躲著。

本島人獨特的毫無表情的相貌，使太郎顯得比實際上更畏縮的小孩。

南國的春天早就來臨，梔子花盛開在街鎮郊外和鄉下部落旁，散放著高雅、柔軟的芳香。

太郎房間外也有一株梔子花，美麗的齊放，給房間送來甜美的香氣。

窗邊的鸚哥叫了一聲早安啊！春天柔和的風從窗吹進來，搖晃著掛在太郎床上的日之丸旗。

由於太郎的父親是日本人的緣故，強要母親掛的小日本國旗，在這家具缺乏的房間裡，是最華麗的存在。

太郎平常所掛念的唯一願望是想要跟內地人的父親見一次面。這出自於他要逃避只要是本島人就叫「リイヤ（你呀）」而當作劣等人種的周遭的人的念頭，以及對內地生活模式完全不同的陌生國度的好奇心。

太郎的母親，在他幼年時，在床上，給難以入睡的他常常溫柔的講尚未看到的父祖之國的故事。她用感傷的話談到榻榻米這奇異的東西，不用磚瓦，只用木材蓋造的，只有在童話故事裡才出現的小小房屋以及溪水清澈、盛開著美麗的鄉村的故事。每當這時候，太即便興奮得更加難以入眠。

雖然母親常講內地的故事，其實母親不太瞭解內地的事。

母親本身也從沒到過內地，雖然和來視察的內地人父親有了親密的關係而失下了太郎，但那內地人父親卻找了個藉口返回內地，再也沒有回到母親的身旁。

因此，太郎幼少時母親常給他講內地的故事，其實是從父親所聽來的美麗內地的故事一字不變地重複一遍罷了。一心一意地等待父親回來的那時候的母親，整個身心充滿著對父親的愛。

「太郎，你醒來了？」

母親邊說邊推開門進來。母親平常都穿著符合內地人父親嗜好的不合年齡的質樸的衣衫，不過今天卻穿著華麗而合身的長衫（旗袍）。

母親微笑著，凝視著還在溫暖的床中不欲起身的太郎。

「媽！早哇！」

太郎眨了眨眼向母親請安，從床上挺起半身，重新問起母親來。

「媽！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好像頂高興似的。」

他想起母親昨夜特別有年輕的心情，高興地去過叔叔家。

「是啊！有特別高興的事啊！你，猜猜看！」

母親這樣說，似乎高興極了，強力地抱住了太郎。

「是什麼呢？媽那麼高興……我明白了。」

「你明白了？說說看。」

「媽，不說也罷，我很明白。」

母親給他這麼一說，忽地漲紅了臉。

直到太郎長到十七歲以前，為了一度嫁給內地人養下孩子而且被拋棄的對世間的羞愧，以及為了一心一意養育內台人之間養下的孩子太郎，一直過著單身生活的母親，越來越不耐孤獨感，答應了叔叔勸告的婚事。

「所以我真的決心跟那人結婚了。也許對你不好，不過對方說要把你一起帶過去照顧，所以我就……你

不會反對吧？」

以母親而言，太郎反對是一樁最痛苦的事。假若年輕而畏縮的太郎反對，就有把這快樂的事情取消的不安在。因此，母親也就徵求太郎的同意。

「嗯，好哇！我為了媽而非常高興，為了我，媽不知忍耐了多少寂寞呢！我充分明白嗎忍受了無法忍受的痛苦。」

「謝謝！你這樣說，似乎眼淚快要滴下來了。」

「以我來說沒有所謂的好和壞，我再也不想看到媽寂寞的樣子。」

實際上母親的眼眶已經孕育著美麗的淚水。這是太郎從來沒有見到母親漂亮的姿容。因此，緊緊地抱住，撫摸了脊背，在耳畔問道。「什麼時候舉行婚禮？」

母親有一度放開太郎，搖動著太郎的肩膀回答。「婚禮地日子拜託你叔叔安排。」

太郎高興極了，他知道母親任何事都像內地人一般保守的性質。料想有漂亮的新娘子會出現了。母親漂亮的新娘模樣……。

「還有，今天他會來，想要跟你見面，所以他來了，我會帶他到你的房間來，可以嗎？」

「好，那麼我就起床收拾一下。」

「好。那麼這樣做好了。不過……很難向你開口，你要把現在穿的內地人衣服換上台灣衣衫……」

太郎的表情突然變了，母親敏銳地看到，用辯解一般的心聲說：「那人是台灣人，你也是生在台灣，並不需要特地穿著內地的衣服吧？」母親雖然如此說，但是語尾低而微弱沒勁的聲音。

太郎並不回答。有不可形容的不愉快的心情。高興母親節的明朗的心情，由於這一句話而粉碎。以太郎而言，縱令生在台灣，母親是台灣女性，可是有著父親血統關係的自己分明是內地人孩子，以內地人為父親誕生的人。這樣想來，母親似乎對內地缺乏關心而不得不生氣。

母親也後悔傷了太郎的感情，可是剛懷了孩子就拋棄她而返回故鄉的沒人情味的人，縱令有些事情牽扯在內，有了孩子也不回到自己懷抱的內地人，對他即令還存有幾分感情。但如今想起內地，只是使舊傷痕加深痛苦罷了。

每當太郎穿了內地人的衣服就因舊傷痕傷心起來，而給這一次的新丈夫故意表現對嚮往內地的樣子，不是樁好事，所以趁這機會想排除它。

「喏，我拜託你這樣做好嗎？」母親再一次懇求太郎；好似罪人接受審判一樣的態度。

「我不要！」

孩子像嘍也似地回答，走頭無路的感情爆發在話語裡。母親失望而垂頭喪氣地站著。母親與孩子不同感情的齟齬交錯在一起。

沉默繼續著。剛才的愉悅的反動來了。母親耐不住這場面的險惡氣氛，默默地把手帕貼住眼睛，拭了淚，走了出去。

附錄三、(因葉石濤先生未翻譯黃寶桃〈感情〉原文的最後段落，為此附上筆者自行翻譯的全文版本，僅供參考。)

從母親那兒聽來後，開始瞭解「太郎」是屬於內地人所取的姓名。

自己是身為內台人所結合生下的小孩，這或多或少傷及他的自尊心。連在學校內也只有他兼具會說日語與台語。因而被同學們排擠，當作多餘的人物，總是一人被孤立於角落。再加上本島人特有的無表情面容使太郎看起來比實際上更加畏懼退縮的小孩。

南國的春天早已經來臨，空氣瀰漫著郊外與鄉街的房舍旁所開滿的梔子花所飄散的清香。太郎的臥房也因窗外綻放著一株美麗的梔子花而充滿著甜甜的氣味。

窗邊鸚鵡的一聲「お早う!(早安!)」啼叫後，吹來的一陣柔和春風搖動了太郎床台牆上所掛著的日本國旗。那是得知父親是內地人後太郎硬要母親所掛上的。小小日本旗幟是擺設單調的房內最顯眼的存在。

太郎平常掛念著的唯一心願是與內地人父親重逢。不僅僅是想要遠離只要見到本島人就用「リイヤ!(你啊!)」這種像似稱呼劣等人種字眼的周遭人們，另一方面也是對於內地那塊生活模式完全陌生的國度有著強烈的好奇。

在太郎極其年幼時，母親為了哄難以進入夢鄉的他，常常於床邊輕語著未知那方祖國的故事。母親總用感傷的語調說著如同童話裡走出般坐落清澈的河邊，四周滿山遍野美麗花海裡有著只用木頭非磚瓦、石頭建造而成的不可思議夕夕ミ(榻榻米)鄉間小屋之景象。睡前的這番故事總反倒讓太郎越發興奮得無法入眠。雖然母親老是談起內地的事情但實際上她並不太清楚。與因公視察而來的內地人父親陷入熱戀發生關係下有了太郎，這位父親不知用何原因當作藉口回到內地，之後就再也沒回到母親身邊。因此太郎從小接收的美麗內地畫面皆是母親從父親那聽取來的。那時用盡氣力等待父親歸來的母親全身散發著對父親的愛意。

「太郎，該起床了」母親進門說道。不同於平常迎合內地父親喜好所穿不符合年齡的老土服飾，今天反而穿起了貼身華麗的旗袍。

母親洋溢著微笑，凝視著於溫暖被窩中不願起身的太郎。

「媽~早安!」床上坐起身的太郎睡眼惺忪地眨著眼回應母親，並且問道「媽~到底怎麼了?!妳似乎有甚麼很愉快的事」

他回想昨夜母親出門去叔叔家的那種充滿活力朝氣的心情

母親忍不住興奮地緊抱太郎說道「恩，是有很開心的事情發生，你能想到是甚麼事嗎?!」

「恩……到底是什麼能讓母親如此開心……我知道了!」

「知道了?!是什?!說說看!」

「媽~你不用說反正我也清楚了啦!」

母親聽太郎這樣一講反倒臉脹紅了起來。

直到太郎十七歲前的這段歲月裡，因背負著曾經結識內地人丈夫卻於生下小孩後被拋棄的陰霾，羞愧面對世人，加上一心一意養育內台人結合所生下的小孩太郎長大，一直孤身一人的母親，漸漸感到孤寂難耐才接受了叔叔的建言答應婚事。

「恩，我下定決心想跟那人結婚了。我不知道這樣對你是好還不好，我跟他說要帶你一起過去照顧，這樣我也……你不會反對吧?!」對於母親來說太郎的否決是令她最痛苦的事情，假使性格畏縮的太郎反對的話這美好的事情也只是徒增煩惱罷了。為此母親求問太郎的應允。

「恩，沒問題啊!我其實為母親感到非常開心。一直以來為了我不知道煎熬多少寂寞的日子，我非常了解

這種苦澀的日子是不能再繼續下去了。」

「謝謝!你這麼說,害我好想哭。」

「我怎樣都無所謂,我已經不想再看到母親寂寞的樣子。」

母親的瞳孔滲出美麗的淚珠,這是太郎從未見過的美麗姿容。於是緊緊擁抱母親並撫摸著她的背時於耳畔問道「什麼時候舉行婚禮?!」

母親一度鬆開太郎並搖晃著太郎的肩膀說「日子全交由你叔叔安排~」

太郎好高興。他了解即將有一位完美的新娘誕生,因為母親有著宛如內地人般對於任何事情都有著高標準的特性。母親的美麗新娘姿態……

「還有阿,今天那位先生會來,想見見你,所以如果他來了可否讓他進來你房間參觀一下?!」

「恩,可以啊。我等下起床後就整理一下」

「那就拜託了~對了還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現在穿的內地人服飾是否可以換成台灣服飾?!」

太郎的表情忽然間轉變。很快查覺到太郎臉色的母親轉為低微的聲音辯解著說

「那個人是台灣人,你也是在台灣出生的應該不需要特別穿著內地的衣物吧…」

太郎默不作聲。只是說不上來的不悅。原本母親結婚的喜氣就因為一句話煙消雲散。對於太郎而言即使自己出生於台灣,母親也是台灣女子,但父親的緣故自己是內地人的小孩為不爭的事實。因內地人父親才誕生於這世上的自己。一想到這裡,對於母親莫不關心內地的態度就不由得生氣。

作為太郎的母親後悔著又傷害到太郎的情感。但是孩子出生後馬上冷血地拋棄自己回到祖國,即便假使真有甚麼事情,但連孩子都生下來了還不願回來自己身邊的那內地人,對於他其實多少還殘留著情感,即使到現在想起內地的事情心裡舊傷仍然揮之不去。

每當太郎穿著內地服飾時,心就會隱隱作痛。讓新任丈夫看見妻子對於內地還有著感情也不好。因此,藉由這次機會想要戒掉。

「拜託好嗎?!為了我……」母親再次懇求太郎。宛如罪人被審判的態度。

「不要!」他咆嘯地回答。

只是一句話,變調的情感於言語裡展露無遺。母親失望地一動也不動的呆站著。母親和兒子的不同的情感無法交融地交錯開來。沉默席捲而來,抑止了前刻愉快的氣氛。母親逐漸忍受不住處於瀰漫著低氣壓的氛圍裡,默默地用手帕擦拭著臉上的淚水走了出去。

太郎不知為何地認為母親流淚的姿態很虛偽。覺得那只是自己的主張不被接受而以哭泣騙取同情罷了。對這樣哀傷的母親盡可能想傳達的一句話是感謝把身為內台人的兒子的自己給生下。

「媽!不論誰說什麼,我都是內地人的孩子啊!」如此宏亮的聲音傳到母親的耳中,但母親並未回頭。小步快走地連門也沒關上。

太郎的房間瞬間襲來冷清與寂寥。令人窒息的氣氛讓空氣瞬間凝固靜止。安靜到鸚鵡於籠中盤旋的聲音宛如於耳邊環繞。

自己的確是內地人的孩子啊…但是,自己真的有權利對母親格外地強求內地的事情嗎?漸漸的太郎開始感受到母親的心情,他再次躺回臥床蓋上毛毯的瞬間,不經意地一股難以言喻的交雜情感湧了上來,感傷的眼淚默默地從眼角滑落。